



共产主义者

月刊第6期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 2025.10

时事

印尼人民的愤怒
——黑暗印尼必
须被改变！

理论

逝世49周年
——毛泽东思
想评析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我们是谁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世界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国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双手开拓的更美好的世界！



《共产主义者》

官方YOUTUBE中文播客

○ 总结历史

○ 学习理论

○ 时事评析

○ 文艺评论

○ 组织建设

○ 政治/生活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时事

I	海河之滨的团结幻象：评天津上合组织峰会	05
II	九三阅兵：一场转移视线的“认知战”	07
III	印尼人民的愤怒——黑暗印尼必须被改变！	14
IV	华南城被清盘：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必然结局	18
V	尼泊尔革命向哪里去？	21
VI	乌克兰难民遇害 - 战争、嫌疑犯、司法部门谁是罪魁祸首	24
VII	西贝风波——食品安全与信任危机	28
VIII	器官移植：一条白色事业的黑色产业链	32

35	论中国国家性质	IX
65	逝世 49 周年——毛泽东思想评析	X
79	对“粉红”诡辩术的揭露：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	XI
84	现代犬儒主义批判	XII
88	新疆问题及当代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历史	XIII
91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看：“人性贪婪论”站得住脚吗？	XIV

理论

海河之滨的团结幻象：评天津上合组织峰会

2025年8月30日至9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SCO）峰会在天津召开。此次会议被官方称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上合峰会，共有20余国元首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会场布置在海河之滨，红毯、夜宴、文艺表演齐备，媒体渲染为“全球南方团结盛会”。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上合组织要承担所谓“更大责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普京呼吁深化安全与能源合作；莫迪则在与习近平的双边会晤中强调中印要“妥善处理边界分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在会中将中国称为“多边主义的支柱”。

会议通过了多份合作草案，其中包括所谓《天津宣言》以及“未来十年战略”蓝图。对外宣传的关键词是“团结、合作、多极化”。

一方面，天津峰会规模浩大，看似中国在多边舞台上的又一次外交加冕；另一方面，会议实质性成果寥寥，几乎没有触及任何真正的核心问题——印巴冲突、巴以冲突、南亚混乱、东南亚局势、中亚民族矛盾等触及中国统治阶级在这些地区势力圈扩展的核心议题全部没有提及，全部官方文件也仅仅是一遍又一遍地复读所谓经济发展的宗旨。

印度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经济投资、势力圈划分等议题上与中国立场不同，却仍然与会“畅谈”。普京连续几日同习近平谈“安全合作”，但俄乌战争使得俄罗斯本身陷入长期困境，而中国政府也不愿把自己拖入一个无底洞般的战争泥潭。至于与会的各个中亚国家，它们大多依赖中俄投资与贸易，难言真正的独立自主，出场也不过是为了左右逢源、求取外部力量支持。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矛盾：舞台上的“团结”，与现实中的分歧，形成鲜明落差。天津峰会表演的，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合影。上合组织的本质，是所谓“非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俱乐部”。它一年一年地试图举起一面反对西方建制、反对大西洋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所谓“正义大旗”。然而，上合所依靠的金字招牌“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在俄罗斯语被用以为车臣与中亚的军事行动背书；在印度，则是借口扩展对克什米尔的统治。经济合作也是如此。中国强调“一带一路”，俄罗斯推销能源，中亚国家希望获取贷款，印度则更多是在权衡——马克思所批判的法式高利贷帝国主义改头换面出现在遥远的亚细亚。到头来，上合组

织的统治阶级头头们用替换了美元霸权的人民币贷款、卢布石油、卢比结算粉饰在看似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西方霸权的面具下更加变本加厉地压榨全亚洲的劳苦大众。

天津峰会的宣传口径，将其包装为“全球南方的团结”。但“全球南方”的无产阶级究竟得到了什么？山河四省的工人并不会因为“天津宣言”而涨工资，克什米尔和费尔干纳的农民也不会因上合的新能源合作恢复被无尽的工业过度生产破坏而几近崩溃的土地资源。各国统治阶级在海河边缘举杯碰撞的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格局——新的贸易合同、新的军事合作、新的利益输送。



无论是所谓“正道世界”还是所谓“多边主义”都是各国资产阶级合谋瓜分世界市场；上合组织所支持的“反霸权”，是另一套霸权的翻版。帝国主义国家的峰会，从华盛顿的北约到天津的上合，本质上毫无区别：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绝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是为了自己口袋里的金币和殖民地。

今天的天津峰会，被包装为“东方的多边盛典”——但正如百年前的巴黎和会、雅尔塔会议，这些峰会不会给工人带来解放，而只会加剧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压迫。

我们不屑于在天津峰会的宣言字句中寻找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曙光——无论是美国霸权还是中国主导的上合组织都只是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不同面具。

真正的国际主义，不是“上海精神”，而是《国际歌》所唱的：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我们要的不是海河畔的红毯与灯光，而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团结与解放；不是二十余国元首的握手，而是数十亿劳动者推翻剥削的自由联合。只有当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只有当全世界工人阶级自由地联合、奋进，而不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扼死在战车下，我们才谈得上真正的“多极化”与“和平”。

九三阅兵：一场转移视线的“认知战”

今年是抗战胜利 80 周年。2025 年 9 月 3 日，中国政府将在在天安门举行阅兵，解放军受阅部队沿长安街列阵，按照空中护旗编队、徒步方队、战旗方队、装备方队、空中梯队的顺序依次通过。从规模和投入上看，这绝对是当代绝无仅有的一场“盛宴”。

但这场“肌肉秀”绝非单单一场军事游行那样简单。就像学校的跑操、企业的“企业文化”一样，形式的表演不只是艺术，更服务于**潜在地塑造认知**。

大张旗鼓的“认知战”

阅兵的宣发在近半年铺满了各种媒体的头版，无孔不入地被传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官方巴不得中国全十四亿人口皆如同过年一样盼望着它；地方财政吃紧，也一点不影响撒上无数钱去不断升级宣发的力度、活动的规模，用各种手段去向中国人民证明它的严肃性和正当性。比如，北京将有 7 个行政区、4 天，禁止任何飞行器升空，天安门广场也将于 9 月 1 日至 3 日暂停开放，长安街沿线众多单位被撤离、建筑被清空。不说是阅兵，还以为是戒严令！

显而易见，这场阅兵的本质不是军事性或技术性的展览，而是传达政治性和外交性的信息。它并不被设立以供军事专家“检验军队”，或向军队的领导、负责人展示实力，而是被用为一种政治宣传武器和外交手段。中国政府对于“**认知战**”非常用心，习近平上台之后 10 年 6 次阅兵，更深层的用意是想在经济状况和地缘条件不稳定的时候，提供一种即视的掌控感：“看，队形没乱、节奏没乱，国家就没乱。”在装备展示上，像“模块化、体系化、信息化”这类专业词，本来是技术讨论所用的一些定义，放到转播里，就变成了**情绪动员的词汇**：观众不必懂含义，只要接收“先进强大”的感觉。好看、整齐、同步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向外界展示技术成功，于是我们可能也会看到尚在试装 / 小批量或是验证型武器进入队列。

此种认知战在 2019 年香港返送中运动期间被中共大肆使用。2019 年的香港，在国庆同一天和大陆被剪辑成两种世界：北京，坦克碾过天安门前，肃杀的军队在习近平的注视下整齐通过，镜头牢牢对准军人—坦克—战旗—导弹，反复强调“59 个方 / 梯队、160 余架机群”等数字，把整齐与庞大等同于“国家稳定”。香港的街头则在化学武器与怒吼中撕扯，同日爆发了当年最为激烈的冲突之一，警方首次对示威者开实弹、18 岁青年中弹。这一幕在中国的网络中被阅兵的盛况和晚间的庆典活动迅速稀释。结果也就水到渠成——“**国家没乱**”。这正是阅兵也就是认知

战可怕的地方：它要让反抗者和中立者自己相信中共真的政权稳定牢不可破，以队形的稳定让人相信制度稳定，以节奏的整齐让人相信社会和解，用短时的情绪激昂掩盖长期的经济低迷。

中国共产党险恶地利用了人们喜欢看热闹的心理，就像他们在各种恶心的“现代样板剧”（比如春晚）中夹带自己的私货一样，把这场活动武器化用以转移群众的注意力并为自己的“维稳大业”提供帮助。共产主义者此刻切不可浮躁，我们无意争论这场阅兵的“技术性”内容，去嘲讽或者赞扬中国军队的实力，必须清楚这场阅兵在舆论和心理上对群众造成的影响，努力用自己的声音把注意力从“震撼”拉回“现实”，从“镜头”拉回“制度”。

从阅兵谈中日矛盾

除非人们在独裁的军政府治下早已对街上横行的大头兵习以为常，不然频繁的典礼必然会逐渐带来负面的影响，闹得人心惶惶。中国政府为正当化自己长期以来劳民伤财的行为而发起本次阅兵，彰显“人民政府”的正义，**再一次剥削了历史上的伤疤、人民曾遭遇的苦难：抗日战争**。央视持续几月来就在趁火打劫讲述先烈的牺牲，然后滑稽地做出“因此今日你应该无条件支持我”的结论。他们希望中国人民在忽悠下满腔热血地去仇恨此生未从谋面的日本人，而对眼前剥削、压迫自己的中国统治阶级沉默不语。

他们宣传的“民族仇恨”只能是历史的无解题。他们不憎恨军国主义，不憎恨帝国主义，不憎恨极端民族主义，更不回避暴行、杀戮和侵略——他们只恨自己“不够强”，不是施害者而是受害者。阅兵传达的信号不是中国强起来了再也不会被帝国主义者虐杀——虽然官方口头“叠甲”会如此掩饰——而是中国强起来了要报仇了——从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人群的反应中这点毋庸置疑。今天的中国政府，不过是日本侵略者的傲慢，换到了海的对面。

他们不想以此“警告”日本，因为日本政府很清楚自己的几斤几两，他们也无意告诉中国人民“我们终于能打败日本”，因为这也路人皆知。他们想要通过阅兵把“党指挥枪”的政治关系翻译成镜头语言，通过高度整齐编排的队列与口号把忠诚—纪律—服从可视化，这样可以在政治上完成一次军队忠诚度表演。简单说，就是通过阅兵让中共统治阶级系统内外的人一起看见“中国到底是谁说了算”，并且反复看见。

阅兵还会以超常规的城市动员把军营逻辑外溢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净空、封控、交通改道），令北京在短时段内近乎停摆。对外，则以把外宾在观礼台与习近平同框的镜头作为向外界发出万国来朝的政治信号。对内，则以“大国复兴、中华崛起”等叙事给群众制造安全与繁荣的幻觉，借此在经济与地缘压力背景下稳定情绪巩固权威。

日本政府对阅兵的谴责也是虚伪且可笑的。昨日的帝国主义者并不是真正反思了自己的错误——如果有，也只是恨自己没打赢——不过在实力悬殊后收起了不合现实的妄想。在国内他们生怕日本人民知道历史上日本民族主义犯下的暴行，生怕日

本工人阶级对隔海的阶级同胞产生半点同情或者好感。对国外，还不要脸地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嘴脸，将核爆地称为“和平纪念馆”：那为什么被核爆呢？解释是我们什么都没干，敌人太狠了。任何帝国主义者都无法对战争作出实际反思，最“友善”的也不过是狡猾地做些表面功夫。

日本政界战后从未对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彻底的清理，其卓越代表昭和天皇转而被塑造为了被迫扛锅的无罪者，以服务于美帝国主义所构建的世界格局，后者以此创造出一个稳定、有用的盟友扩大自己的世界霸权和市场优势。他们指责中国政府的阅兵是仇外且有损世界稳定的一一我们无意为中国政府辩护，是的。但这句话不该从日本政府口中说出，**贼喊捉贼**的样貌实在是可笑。**中日劳动者之间的共同比分歧多得多，两国劳动者和自己上层权贵之间的分歧比共同多得多。**

“解放”军的昨日与今日

军阀的匪军杀入北京城后，哪样宣传也不会有群众开窗相迎，但解放军毋庸置疑现在仍然是受到广大群众爱戴的。对书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书说军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资产者镇压无产者起义的枪炮——那乍一看不得不得出的两个结论，要不解放军不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要不中国人民实在是蠢。事实上，造成现在现象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所营造的一套历史叙事：他们**借助前辈光辉的革命遗产，包装自己最为反动的野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立之时名如其军，是一支反抗暴政、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军队。它拥有革命的目标，严格的军纪，是武装起的工人农民推翻国民政府的利剑。随着新中国一步步变得和旧中国如出一辙，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像自己的老对头中国国民党，**解放军也随着国家的资本主义化变为了维护不平等的暴力机构。**解放军不再讲自己是工农红军，不再说阶级斗争，只懂得打击“外敌”，懂得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放到任何其他国家除了立场不同外思路毫无区别。“人民子弟兵”原先指服务人民如同子弟的战士，今天只能用来形容士兵的来源——普通家庭的孩子，被动员起来服务于自己阶级的敌人。

没有必要因此指责任何解放军战士，军队的性质和战士个人不能混为一谈。**士兵个人在军队中被迫泯灭了个性和良知，“纪律高于一切”的逻辑下是阶级秩序罪赤裸裸的体现。**他们被贬低为不能自己思考的奴隶兵，在上级的霸凌下，无条件执行下达的命令。一个出身基层的解放军战士如果在镇压中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面前的群众所进行的事业、自己所效忠的政府的本质，自然这份纪律不再能束缚住他找回自己。历史上革命的兵变和起义，就是群众浪潮下军队和军人之间身份冲突的结果。

但这不是说军队的问题全出在制度，**从基层的构成中也能看出军队性质的转变。**今日很多入伍的解放军士兵不是出于爱国还是靠着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忠诚加入——有的话也只是少数人并且很快被磨平棱角，和老的解放军战士不同，大多都是**彻底的仕途主义者**：没有和前辈一样跨雪山过草地的勇气，没有对劳动群众的忠诚。他们在经济不景气的今天冲着稳定的工作去，和国军一样是**用钱收买的**：这样的军队，在实际遭受了战斗损员后，士气的瓦解可想而知。

有人说，你这样批判解放军，那他们在洪灾中救人的时候你可不要找！这种诡辩毫无讨论的价值，我们相信，参与镇压江油群众的警察中平日也进行着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也会帮助群众履行自己的职责，但这不足以为自己街头所犯下的罪行辩护。军队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不只是被用来镇压，除了对外的军事行动外对内也可以起到其他因素——当然，大小事件动不动就动员解放军执行救灾，本身也是一种滥用和政治宣传、认知塑造。统治阶级不只是用恶脸维持秩序，笑脸同样是必要的。



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映射

综合人民日报与新华社的报道，出席阅兵的 26 国及其领导人 / 政府首脑具体包括：俄罗斯（普京）、朝鲜（金正恩）、柬埔寨（西哈莫尼）、越南（梁强）、老挝（通伦）、印尼（普拉博沃，因为国内革命刚宣布无法出席）、马来西亚（安瓦尔）、蒙古（呼日勒苏赫）、巴基斯坦（夏巴兹）、尼泊尔（奥利）、马尔代夫（穆伊兹）、哈萨克斯坦（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白俄罗斯（卢卡申科）、阿塞拜疆（阿利耶夫）、亚美尼亚（帕什尼扬）、伊朗（佩泽希齐扬）、刚果（布）（萨苏）、津巴布韦（姆南加古瓦）、塞尔维亚（武契奇）、斯洛伐克（菲佐）、古巴（迪亚斯—卡内尔）、缅甸（敏昂莱以“代总统 / 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身份）——这份名单出自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及官媒英文稿，基本能代表中国的势力范围。

中国地缘政治影响的中心，是与俄罗斯的高频协作和熟知的“上合组织”，这是把

成员国捆在同一议程里的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盟国。它的第二层，所谓“近海”也就是**东南亚经济圈**，由 RCEP 和中国与东盟贸易捆绑市场提供控制力。这些国家多是通过向中国出口能源以及工业原料、粮食等低附加值商品来换取中国的工业品；第三圈则是**“全球南方”**，具体政策是以金砖扩容后的能源—基建—融资打包项目维系中国在南美、非洲、中亚、中东的投资企业运转。

如果把这三圈叠到本次来京的外宾名单上，轮廓几乎一一对上：核心支点是俄朝——克里姆林宫已明确普京此行是国事访问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加阅兵，而金正恩更是罕见地确认赴华与普京、习近平公开同框。

紧贴核心的白俄罗斯、伊朗，以及外高加索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地缘政治上可以显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政策在俄罗斯周边都维持着可见的政治入口。再往外是一整条中亚—蒙古—南亚—东南亚的区域：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五国本次阅兵全部到齐；蒙古的地缘和对华舆论非常尴尬，因为 2017 年内蒙的蒙古语教育风波导致蒙古人普遍对华极度敌视，所以蒙古在此次阅兵中出现显得很奇怪；南亚的巴基斯坦、尼泊尔、马尔代夫，除去尼泊尔这个缓冲国，中国在印度洋的政治投射显然也在扩张，中国通过给予斯里兰卡大量贷款和马尔代夫的大量投资建设以及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港项目，其影响力在印度洋增长极快；而印度虽然出席天津上合峰会但并不在阅兵来宾名单中，也是因为中印一直以来的领土争端；东南亚这边，柬埔寨、越南、老挝、印尼、马来西亚与缅甸（以代总统名义）到场，这些国家均是有与中国高度互嵌的市场，虽然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有海上领土争议，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市场与融资依赖度非常高，其中最甚者就是柬埔寨。

最外圈被嘲讽为“大撒币”的影响范围则是非洲的刚果（布）、津巴布韦，拉美的古巴，欧洲的塞尔维亚与斯洛伐克——这些国家要么与中国在金融、产能、治安合作上有很深的勾连，要么在欧盟—北约体系内扮演“搅屎棍”，给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留出窗口。而谁没来同样也很容易注意到，G7 及欧盟主流成员国集体缺席，这非常能够说明现今世界正在逐步形成两大阵营，而与冷战时期单纯的地缘对抗不同，21 世纪我们面临的“冷战”更趋于两大集团争夺国际市场的控制权。**当帝国主义者忙于站队、划分团体时，往往都是社会最为动荡、国际局势岌岌可危的年代。**

检阅装备反应的中俄关系

国际关系中中俄的来往十分值得深入分析。很多自由派媒体很爱说“俄爹”或诸如此类的话语，因为中国确实在与俄罗斯的外交事务当中往往都是妥协退让的那一方，所以有些人认为俄罗斯在中俄关系中占据主动。相反的，也有很多人认为俄罗斯在侵乌战争中元气大伤，在失去了非洲和叙利亚的情况下，俄罗斯就是个病怏怏快死了的残废，中国在中俄关系中是绝对的老大哥。但是这两种说法其实都不准确，**中俄现在更像是双方因为对抗美西方有共同的地缘政治诉求，且商品市场上有互补，所以选择“合作”。**

俄罗斯需要中国的生产力 / 劳动力以及廉价消费品和庞大的金融市场贷款来供给战争经济，中国则需要俄国的能源、军事技术以及这方面的人才顾问来准备战争。两

国不存在谁主动谁被动，其市场在互补而不是角力。俄罗斯因为侵乌战争失利导致其在 2023-2024 年间急需中国的财政援助来稳定经济，而中国明显也在同时期遇到了军工发展的小瓶颈期，所以在那个时候中俄可能暗地里建立了秘密的技术转让和贷款。从这次阅兵的装备中也可以看出有很多武器都有苏 / 俄早期概念设计的影子，例如此次登场的大型潜航器和新款鹰击系列高超音速导弹，大型潜航器极有可能是师从苏联的波塞冬核鱼雷，而且中国这款潜航器的长径比很夸张所以大概率无法安装声纳或其他传感探测设备，再加上表面除了上方两个吊环之外没有回收装置，所以很有可能也是核鱼雷。高超音速导弹其弹头构型与俄国的“匕首”以及“锆石”非常相似，很大可能就是俄国把高超音速武器的相关技术交易给了中国。在阅兵场外，中国最新亮相的倾转旋翼直升机的设计对比美国 V22 和 v280 来说，更像苏联的倾转旋翼设计方案——米 30。综上所述，中俄的军事合作从中国近年的军事研发成果来看，相当之密集。

在地缘政治上把“中俄同盟”理解成**无条约但密切运作的准同盟**更贴切：文本上，双方在 2022 年 2 月 4 日联合声明里把双边关系定义为“友好无上限、合作无禁区”，明确要在国际秩序议题上彼此呼应。这不是纸面口号，而是随后三年的一整套协同实践：经贸金融上，2024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以人民币 / 卢布结算为主，人民币在莫斯科交易所的成交占比超越美元成为最活跃外汇，能源端中国对俄原油进口在 2024 年再破纪录，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一线（PoS-1）输气量持续上升，即便 PoS-2 也就是西伯利亚力量 2 号线谈判屡次谈崩、但中俄双方仍在讨论通过既有通道加码供气。军事上，联巡联演已成常态：仅 2024 年就有第九次中俄战略轰炸机联合巡航穿越日本海 / 东海上空，2025 年再接续海上联合巡逻与演训（含反潜、对空防御等科目），配合多轮北部 / 海上联合系列演习把空海协同做成每年一次。而且在外交场合两国也保持投票与议题设置的默契。

当然，利益对抗并未消失：中亚地区中俄的影响力竞争、军火价格、能源长期合同都存在博弈——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线迟迟未签，而且 2025 年双边贸易一度回落，这就是现实摩擦的写照。但把这些“价码之争”与“小波动”扣回全局，两国在政治协调—市场互嵌—军事协作—话语联动这四项最关键的要素上已形成了实质上的盟友关系，并且中俄通过大型仪式与军演把这种关系公开常态化。因此，在没有集体防务义务的前提下，**一个以对冲美国 / 西方主导市场秩序为目标、在战略上彼此绑定的同盟集团确实已经成形**。中俄的分歧更多体现在价格与市场份额，而不是基本国策方向。

两国出于利益在各方面进行的高度合作，在扩大双方在国际帝国主义秩序中的分量上都起到了帮助，但也不可避免地加强了民间交流并缩小了信息差。这将是为未来埋下的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地雷：两国的社会矛盾和内部动荡，将难以控制地如同仓库里的两垛茅草一样唇亡齿寒。不管是中国政府最亲近的盟友还是最痛恨的敌人，在阶级的横切面上，都为**国际工人团结和统一行动**提供了潜力。

裁军与军改

结尾时，我们想讨论中国军事发展在盛宴背后发生的过程。还记得曾经大肆裁军向

世界宣告中国要“和平发展”的他们吗？这和今天耀武扬威的阅兵的冲突不能再明显了。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裁军30万”后，新中国历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改拉开了序幕。**以裁军30万为借口，军中开始大量清洗胡温时代的指战员**，解放军从而在之后进入一轮以指挥链重组为轴心的军改启动。2015—2016年撤并总参、总政、总后、总装，改为中央军委直接统辖的15个职能机构，把过去集中在“四总部”的权能拆散、前移并垂直化，同时单列常设的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配合五大战区运转。

2016年2月将原7大军区改为东、南、西、北、中5个战区，确立“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分工，保障了任何涉军职务都不能彻底掌管军队，常设了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加强了中央军委也就是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同一时期设立陆军领导机关、将第二炮兵升格为火箭军、组建战略支援部队，军队力量结构大改，**由“陆军占比高”转向倚重海空军**，并且提高远程打击、太空/网络/电子等比重。一方面这可以被理解为军队的更新迭代，另一方面反映了对内为主要工作、防御性质的武器被转型成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利刃**。

受周永康政变影响，与军队并行的武警/海警体系在2018年统一纳入军委领导，指挥更集中。同年新设退役军人事务部，把退役军人安置、优抚、就业与维权并入一条链，兵员政策也更偏向职业化与高校征集，军兵种服役门槛升高。这样**中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军队的人员来源**，尽可能在非战时将武器排除在大多中国底层出身者的控制之外。而信息与支援部队则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2024年挂牌信息支援部队，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在原战略支援部队基础上的结构调整，把数据链、指挥信息与抗干扰等能力前置到联合作战流程中。同期的军队反腐力度也大幅增加，尤其牵涉火箭军与相关企业。

总体看，这十年的变化集中在：**指挥权自上而下更垂直**、作战指挥联合实战化、地面部队编制瘦身（参考俄军，从作战指挥效率上来讲不见得是好事）、部队信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后勤跨战区一体化、武警/海警归军委并且更加军队化、兵役与退役管理更系统，退伍兵大规模维权几乎在军改之后几乎就没出现过了。

今年的9.3阅兵可以说是上述调整的可视化呈现，但这些改革本身**只能说明组织架构与编制的变化，其主要是为了习近平和其代表的利益集团控制军队所进行的**。真正的战备水平从与俄国的联演联训、海峡雷霆/联合利剑等对台系列军演以及装备可用性来看，没有明显的进步（起码不是所谓跨越性的）。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出于政治考量，中国政府现在像一只生气的河豚，**伪装出不符合实力的强大外表**。这种玩火，必然会使其在面对内外劲敌时吃尽苦头。

印尼人民的愤怒——黑暗印尼 必须被改变！

最近，一段警用车辆强行碾压外卖员的视频在印尼网络广泛传播，毫不意外地在印尼社会引发了轩然大波，并将自今年二月便已酝酿的抗议浪潮迅速推向了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爆发抗议示威，学生和工人走上街头，一座议会大楼遭到纵火。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用最“唯物主义”的手段还击将印尼拖入黑暗的资产阶级统治者。

疫情以来，印尼经济持续低迷。2024年，印尼盾贬值约5%，出口额下降10%，通胀率攀升至3.2%，粮食和燃料价格上涨使底层民众不堪重负。根据印尼统计局数据，2025年全国失业率高达5.5%（约730万人），青年失业率更是达到15%。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冲击下，外国资本（尤其是中国企业在电子和汽车行业的投资）加剧了本地工人被裁员的困境，工人的剩余价值被变本加厉地残酷榨取，无产阶级正在加速滑入无以复加的贫困境地。

普拉博沃·苏比安托政府上台后，承诺通过削减财政预算来重振经济，却适得其反。取消教育和医疗补贴等“微薄福利”不仅未能缓解财政赤字，反而进一步剥夺了底层民众的生存保障。更为讽刺的是，与被削减的社会公共服务开支相对地，2025年8月印尼政府却为议员发放了巨额的消费补贴——如此一来，单论议员增加的津贴就几乎来到了首都雅加达最低工资的10倍之多。这一举动赤裸裸地暴露了印尼资产阶级政府所谓重振经济的政策“劫贫济富”的本质，也使原本即已尖锐的阶级矛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化。

普拉博沃的黑历史同样加剧了民众对他的不信任。他曾在苏哈托时代主导东帝汶大屠杀和1998年的黑色五月暴动。作为这一切惨剧的主要幕后主使之一，他被揭露为煽动暴力，企图制造混乱，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平定暴动”，借此跻身更高的位置的血腥的投机者。没有任何新意地，**普拉博沃如今仍在继续推行极右翼政策：一方面削减财政预算（类似特朗普），另一方面引入更多军人进入文官政府，以越发军事化的手段巩固自己的统治。**

早在二月，全印尼学生联合会就发起了“Indonesia Gelap（黑暗印尼）”运动，抗议政府削减教育经费，呼吁建立免费、科学、民主的教育制度。印尼近年来青年失业率高企，使学生成为了这场运动的先行者，正如一百年前中国的五四运动一样，进步的青年学生站在了反抗压迫的最前线。

2025年3月，《印尼国家武装部队法》修订草案更为军方干预政治大开方便之门，依据修订后的法律，现役军官如今无需先行退役或辞职，便可担任关键的文职岗位，修正案还将现役军人可在政府中担任的文职机构，从原先的10个增加到14个。该修正案的通过自然被视作对印尼民主体制的严重威胁。民众焚烧轮胎，大学生在国会大楼前扎营，他们愤怒地冲入国会，表达对民主倒退的抗议。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印尼政府却出动了五千余人的警察和军事人员，另有水炮和数十辆战术车。



8月28日，库尔尼亚万在雅加达的一场抗议低工资与官员开销的示威中，被警车碾压致死。雅加达、万隆、梭罗等地的民众通过投掷汽油弹和鞭炮，焚烧警车、警察局和政府大楼来表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警方则动用催泪瓦斯和水炮，残酷镇压群众运动。

在暴力镇压之外，印尼政府也使出了资产阶级政府面对群众运动时最常用的招数：通过无数无关痛痒的小恩小惠试图平息反政府抗议。8月31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表示，各政党已同意撤回部分由国家资助的国会议员津贴作为安抚民众的尝试，即使这个津贴本身就极度不合理，他还“毅然”取消了出席中国九三阅兵的计划以“应对国内局势”。国家人权委员会也羞答答地指出在25日与28日的行动中，警方存在过度使用武力的行为。

然而一切为时已晚。随着八月的补贴丑闻的曝光，即使此前对政治冷感的工人也被这直观感受的巨大的贫富差距而激怒。终于，当视觉冲击最强烈的警车碾压事件出现后，人民的愤怒全面爆发。印尼最大学生组织全印尼学生执行委员会主席尖锐指

出这些举措“远远不够”；8月25日，雅加达的摩托车司机们挥舞着《海贼王》草帽海贼团的旗帜，象征反抗压迫。

在该作品中的草帽海贼团反抗统治世界的专制独裁的世界政府及其军事机构海军，而有意思的是《海贼王》中的特权阶级“天龙人”一词也在中文互联网上被广泛使用，用来代指享有特权的中共政商权贵后代，也因此这个词被中共官方强制禁止在互联网上讨论、使用，但是屡禁不止，这种文化符号的相呼应，一定程度上也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激荡起了对统治阶层不满的回音。

在中文互联网上，许多网民对印尼人民的英勇抗争行为表示了支持，但是也有人担忧这场暴动是否会最终变成1998年悲剧的重演。当然，中国人民也不会支持普拉博沃政权，也只有中共政权才会把手上沾满华人鲜血的普拉博沃·苏比安托视为座上宾，邀请他参观中共的大阅兵，就像二十多年前的中共江泽民政府会对印尼政府的屠杀行为熟视无睹，以不承认双重国籍为借口搬出“不干涉内政”的冷漠话术！毕竟大屠杀或许会唤醒人民对八九年的北京大屠杀的不好回忆，在中国刚刚重建的资本主义与印尼密切的双边经济往来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因素。所以中共政权一如既往选择沉默甚至抹黑，不仅因为与普拉博沃的合作利益，更因惧怕印尼的抗议唤起中国人民对自身特权阶级丑闻的联想，如澳洲的杨兰兰，协和医院的董小姐。

在其中必须指出并澄清的是，当年的屠杀是苏哈托政权为了转移金融危机压力、缓和印尼国内的民怨，而刻意煽动起法西斯主义暴行用以疏解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的罪行，并非源于普通民众的族群矛盾。相比之下，2025年的抗议更集中于现实的印尼国内的阶级矛盾，反华情绪虽因中国企业裁员有所抬头，但只是次要因素。相反，印尼学生和工人对政府特权阶层腐败与压迫的反抗成为了整场暴动的最大特征。毫无疑问，即使没有自觉，群众的反抗也已触及了生产关系的核心范畴，并作为一场反对最赤裸裸的形态的资本统治本身的雇佣奴隶的起义得以表现。

然而，在群众最直白、最热烈的战斗行为的背后，我们却只能看到一撮若隐若现的身影：印尼工党和印尼全国工会联合会发起了据称有数万人参加的街头示威，而他们的诉求主要聚焦在轻飘飘的“改善劳工待遇”，这意味着上调工资，上调征税起征点和一一订立新的劳动法。

类似的事情我们已经见得太多了！是的，工党由数个工会组成，向来积极为工人权益发声；是的，工党未加入总统普拉博沃的执政联盟；是的，工党组织了一些示威游行，然而一一工党却表示支持普拉博沃政府。不仅仅是印度尼西亚，远一些的我们看得到西班牙内战，近一些的我们看得到英法工人大罢工。即使是数百万人规模的罢工和示威，即使群众是这样地“激动起来，挺起腰来”，“反革命脚下的大地”是这样地在群众的运动中“震颤”，但是他们的领袖，实现他们意志的执行机关有这样的水平吗？本该敏锐地把握时势、提出坚强的运动路线乃至革命目标的所谓“工人的党”“工人的工会”，“他们的行动能力和坚定性在这一期间也增长了吗？他们的行动能力跟得上群众的日益增长的干劲的步伐吗？”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惨败”后是遭到了如此的抹黑和曲解，

以至于没有人敢于提出甚至尝试准备提出唯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这导致了无数学生、工人、革命者的血泪遭到空流。

因此，作为中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我们坚定支持印尼人民的抗争。我们呼吁印尼的无产阶级不分族群，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拒绝再被无能妥协的工会官僚或右翼分子作为政治筹码操纵，向资产阶级专制统治展开彻底的斗争，应当写在印尼无产阶级打出的红旗上的东西恰如工人阶级和先进的青年走上阶级斗争和革命的道路时，总会在无数次“过早”而“不成熟”的尝试中重拾起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所必然呼吁的那样——一个先进的、一个将懦弱的改良主义分子抛在脑后的、一个得以代表无产阶级运动中最先锋部分的新的革命共产党。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群众才能在迷茫的斗争中尽快把握住自己的现实的斗争所本应得出的全部结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焰才能将一切反动势力的垂死挣扎彻底扫净。

华南城被清盘：中国 房地产泡沫的必然结局

华南城于 2002 年在香港注册成立，在经济上升时期，也就是直到 2019 年以前，华南城在资本市场的风光受人瞩目。但短短两年后便爆发债务兑付危机，届时持有国资背景的深圳特区建发集团下场搭救投资，以 19.09 亿港元认购其 29.28% 的股份，成为华南城单一最大股东，后续还通过接盘其资产输血或者帮助其向银行借贷等方式提供救助，然后最后还是没能挽救房地产泡沫的必然走向。

2024 年 6 月，特区建发收到了花旗国际通过香港高等法院对其索赔 14.07 亿美的一份传讯令状。因为华南城未能偿付美元债款，花旗国际在 2025 年 1 月 27 日提出对华南城清盘。在此起彼伏的危机中，于 2025 年 08 月 11 日，华南城被香港高等法院下令清盘。

为什么说**清盘与破产是必然的**呢？许多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学家会从其专业角度来阐释各种原因，如从宏观、微观的层面，但道理其实最终都要回归到一个根本问题：房地产服务于增值资本还是满足社会的需求？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深刻的土地改革加上社会主义时期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轻重工业的发展、大量人口进城潮，乃至如今所谓的现代化等等，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础：工厂不能建在空中，人们不能睡在天上，土地是工业产能的根本。

自经济市场化以来，1992 年到 1994 年酝酿并推广的分税制配合中国土地财政模式，抬高了土地价格与房价。此时房地产作为中国最主要的经济支柱，在历史中承担了重要角色，但**踏在房地产这些风口上的既得利益者们，似乎仅仅认为这是属于自己的机遇和能力的实现，毫不承认他们只是站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肩膀上跳舞**，并且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将工人国家原本并不属于资本家们的丰厚“遗产”——它本来不是作为任何人的财产，而是应当被公有化的生产资料——用作投机、盈利的资本挥霍一空。如同《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华南城并非孤例。在被清盘的地产商里，华南城的资产与规模仅次于恒大集团。后者相信中国房地产可以一直繁荣下去，不加节制的加杠杆向银

行和其他债权人借钱。最后哪怕是 2020 年提出的“三条红线、四档管理”这一意图降低资产负债率和有息负债规模的改良主义政策也无法遏制以虚高的金融游戏带来的危机，难以在不破坏市场环境的情况下填补房地产所留下的一个个深不见底的窟窿，所以最终该**政策形同虚设**，房价并没有因此便宜多少。

从恒大到华南城，我们看见了历史的必然发展结果和资本主义的无脑重复的垂死挣扎，**无论国家是否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救场，甚或整改房地产开发商公司，皆为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有的辩护者们甚至说是政府拿走了房地产商的利润，导致债务危机，货币回流亏空还不上钱以至于破产，但这无非说明了资本家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赃矛盾，还不足以掩盖真正的罪恶事实——他们一并的连同工业链、银行、政府、各类企业以及投机客对建筑工人的工资、各类企业员工的工资的拖欠与真正需要在钢铁森林中寻得一份容身之所的人口的不加节制的榨取。**劳动者建立了城市，城市中却没有他们的家**，想安静住在不用缴纳租金的地方，就要付出成百上千万去购买一份几十年的产权。至于农村，根本不能容纳他们必要需求日益增长的生活。



也就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为一批掠夺了时代遗产的宠儿，通过白手套的方式从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里一部分用来支付工资甚或干脆一并拿走选择不支付且拒绝对讨薪负责，一部分用来杠杆谋利，收购土地、收买官僚（如贵州前省委书记孙志刚、辽宁前省长司法部部长唐一军、国家前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深圳前市长陈如桂。）、伙同银行（如前中行行长刘连舸、光大银行前行长李晓鹏、中信银行前行长孙德顺、招商银行前行长田惠宇）、交好其他企业、分销于有大量资金储备的投机客，最终服务于自己的私立。然后一边通过炒房价，一边得益于统治阶级掐断农村公共医疗、教育等因素，让老百姓纷纷掏出积蓄购买房产，胃口大者甚至预售一波割韭菜再烂尾，堂而皇之的欺骗人民。

地方政府大量开支和收入（税收）不成正比，便默许房地产举债无度，终于他们还是会把一切的矛盾和苦难推脱到老百姓身上去买单。 欺骗预购款、生产过剩、金

融泡沫催生的供需关系失调和产生的烂尾楼（如恒大留下的大批烂尾楼盘）的例子比比皆是，经综合国家统计局数据与各类房产裁判文件，2023 年全中国已经存在 348 个烂尾楼盘，涉及 900 万套房产。

房地产行业的破产，怎么不是一种历史必然呢？就算是再出色的管理和经营方式，也阻挡不了最终的结果。私有制背叛了公有制，房地产商背叛了土地革命——虽然有的人说如今耕者有其田，正是土地革命的实现，殊不知在这样的小农经济而非集体化农业下，农民依然受到商品世界的垄断，他们没有议价权，商人会伙同政府的默许进行土地兼并收购，美其名曰搞经济开发，搞 GDP——并且以这种方式**造就了一批暴发户，这批人也成为了新的既得利益者，反过来欺压百姓**——更加奠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且生产由少数人裁定的市场原则，以取代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生产由集体调节的计划经济纪律。

所以，早有恒大在前，华南城不是这场危机的开端，也不是结束，因为根本制度没有得到改变。只因目前还不是危机到达绝对高潮的时期，所以让一些人产生了“抗过这几年就好了”的幻觉。

房地产经济的式微同中国近几十年来遇到的国际争端不同，它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越来越暴露其问题的集中体现。以往的许多生产过剩问题都通过地方举债化解掉了，**这些债务负担被转移到中国居民身上，必然造成国内消费不振**，加之房地产背后所牵连的各生产环节受到的影响（比如土木、商场及相关联的第三产业），这必然也实际上造成今天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同于往日，这或许在提醒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距离其“摔跟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中共也一定要在国际资本输出、军事 / 国安建设等等方面发力来竭力避免自己摔跟头，可这都不过会让那个“跟头”更加严重罢了。

真正能够解决住房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其引入的计划经济制度，不是中国住房公积金这类资本主义社会内的保障政策。真正的改革不会从青天大老爷“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嘴炮里得到落实，只有彻底根除利润之上的资本主义体制才能解决。社会主义要求住房在计划经济下进行规划而不是基于什么市场规律，让高质量的住房条件等一系列生活资料的供给成为无产阶级最基本且普遍的保障之一。

尼泊尔革命向哪里去？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和今日尼泊尔革命的血腥与无组织状态脱不了干系：事实上，正是他们对劳动群众的背叛和对统治阶级的投降，导致了近十年来尼泊尔社会种种苦难得以继续存在。这群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改良主义者，恐慌地看到青年不再默默忍受，而是将自己同样纳入了需要被彻底推翻的“腐朽政权”的一员！

他们打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号，**不将自己视为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者，而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左派”**。他们以尼泊尔的“落后性”为由从上往下抑制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使这个落后性被无数历史经验证明不能在落后国家由“民主政府”改善，只能由劳苦大众建立的人民政权通过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终结。尼共毛在内战结束后彻底**沦为了俄国革命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角色**，如同我们此前分析指出：

“仅仅在语言上延续着社会主义传统，但其执政实践和经济逻辑，决定了它们在事实上就是议会型、改良型的资本主义政党。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它们充当的是管理依附型经济的本土政治代理，而非推动社会根本变革的工人阶级革命党。”

对这场运动尼共毛不可能有真正积极的回应，因为他们的软弱使得自己无意借助群众运动的高潮夺取政权。在议会里作为执政党的尼共毛“心甘情愿”地担任资本主义卫士的职位，如果“独揽大权”——趁革命的机会将问题甩锅到其他政党上——那他们一切存在的合法性都丧失了：迟迟无力推进革命的他们会被识破，自己并非没有机会，而是有了机会也仍然屈服于资本主义的限制。他们加入联合政府，从来不是为了在合法斗争中争取群众继而推翻联合政府建立工农政府。**他们是统治阶级用于迷惑群众、为自己政权增加虚幻的“革命色彩”的工具**，是被用来修饰联合政府继而为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续命的。

这次**革命的重担都放在了街头的青年和群众肩上**。我们看到了各种激进行动的出现，警方和政府遭受了严重打击。但革命的前景仍不容乐观：现在，夺取了枪支的群众正在将自己的武器“交还”给军队。尼共毛曾在内战结束后“自废武功”解散人民解放军，今日革命极有可能重蹈覆辙。当时在尼共毛看来，缴械是“争取军队”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投降。但列宁曾揭露过：

“起义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的主要准则就是要万分勇敢，一往直前地坚决进攻……我们应该鼓吹的不是消极情绪，不是单纯的“等待”军队“倒戈”；不，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必须拿起武器，大胆地进攻和出击，同时必须消灭敌方的长官，为争取动摇的军队进行最果敢的斗争。”

军队的主体——被制服束缚着的平民子弟——不可能被用如政客间谈判的方式争取。革命运动如果没有军队的倒戈、军纪的瓦解和士兵个人意识的觉醒，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纯粹的空谈。如何争取军队，在列宁看来，不是用降低运动规模和程度来“安抚”士兵，而是通过更进一步的进攻、更全面的群众运动唤醒军队摇摆的良知。战术十分重要：如果革命不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造成了诸多不必要的屠杀和社会治安的崩溃，那肯定会损害军队对群众运动的印象。统治阶级不止一次——在今日尼泊尔革命中也将沿用——让自己的走狗伪装成革命者趁火打劫，再反过来呈现给军队一个合理的镇压理由。尼泊尔的同志们，**对军队的争取关乎存亡！**



警察已经几乎被彻底击溃，军队仍然采取观望的立场。底层士兵被约束不进行判断和思考，上层军官在等待运动的结果，找合适的时机介入。议会大楼的防线已经被群众攻破。革命下一步需要什么？

下一步需要的是**更长远的计划和严密的组织**。统治阶级现在已经无力通过单纯的武力消灭革命，他们中必然会有人伪装成革命的支持者，和袁世凯、克伦斯基等人一样扮演“**窃国者**”、“**摘桃者**”的角色。统治阶级不再用反对革命镇压革命，而是用“支持”革命镇压革命。旧日的高官将会重新组建起一个光鲜亮丽的临时政府“接管”（实则窃取）群众在街头上夺来的权力，一步步在革命的退潮中恢复旧秩序。在肯尼亚、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地，我们看到的实在是太多了！

尼泊尔群众和青年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自下而上，如同苏维埃一样，将街头的力量组织起来，拒绝旧制度复辟。群众必须组建属于自己的新政府。真正的共产

党人需要在紧要的任务面前把次要的分歧放到一边，**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共产党**。群众们不能信任那些撒谎成性、混淆视听的政党，**需要真正的革命党进行领导**。

更重要的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动派必然会警惕地盯着运动不让它超出自己限定的范畴。尼泊尔革命需要**将自己的精神传出国门**，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援。尼泊尔自身的体量无法建立一个稳定、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它隔壁是充满革命潜力的中印两国。**国际主义的方法**将是解开困境的钥匙。

乌克兰难民遇害 - 战争、嫌疑犯、司法部门谁是罪魁祸首

为了活命她离开了硝烟纷飞的战争前线，千里迢迢来到异国他乡寻求庇护。可是在我们的年代，哪里还有“一方净土”？那天，她看着手机，突然感觉颈处有刺感，没过多久车内发现有人死在了座位上，最开始甚至都没人在意。她有机会逃离枪炮，却没能力逃离尖刀。

9月5日，美国警方公布了一名乌克兰难民伊琳娜在轻轨车厢内遭男子持刀杀害的监控录像。8月22日在夏洛特市，23岁的乌克兰女子上车后后座的34岁无家可归者迪卡罗斯·布朗掏出折叠刀，朝其颈部刺了3次，女子的喉咙至少被刺中一刀，倒地身亡。两者互不相识，没有纠葛。

视频发出后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面对外界压力夏洛特地区交通系统公司在9月2日宣布已聘任新任安全主管，并将安全预算增加三倍，着手升级监控设备。同月22日，市议会讨论扩大警力巡逻列车与公交车的计划。9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被记者问及此事时说，他不知情。记者告知后，特朗普说“太可怕了”，并表示会去了解详情。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难不成这个在花龄夭折的姑娘会因为这些后知后觉的补救措施起死回生吗？用来息事宁人的几个新监控不会保护下一个受害者的生命。

种族割裂的社会

犯罪嫌疑人的背景非常值得讨论：在谋杀事件前，这位34岁的嫌疑犯布朗已经14次犯罪被释放（其中有法官被人揭露出缺乏合规的学历，为同性恋黑人女性），其律师曾于7月提交动议，声称他精神不健全，无法接受审判。于是再次被释放……根据视频和警察调查显示，布朗在杀人后冷静地擦拭手上的血，并脱下上衣，在车门旁等待，自言自语“我杀了那个白女”。列车停站后，他将刀具扔在了站台附近。这样屡教不改的犯人竟还能够活跃在日常生活中，肆无忌惮地对他人的生命造成威胁，整个美国的司法机构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他们空谈“人性化”“民主”“自由”，却不考虑这样的人是否有能力担当这份自由。

这个事件直接加剧了美国社会本就日益严重的种族矛盾：保守派、种族主义者趁机将犯罪嫌疑人的屡次释放归咎于民主党人的“种族多元”政策，指责法官存在舞弊，并将布朗作为论证黑人群体“劣根性”的证据。在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恐怖主义

的死亡威胁，例如“今晚就会有几个黑人因此而死”的标语。

清楚的是，民主党为削减预算、降低监狱人数而不对危险犯人妥当处理，是布朗得以行凶的政策前提。但我们共产主义者却要问：为什么美国的司法系统不仅关不住犯人，也无法阻止新的犯罪的不断产生？布朗一事出现的社会前提是什么？保守派以偏概全的煽动是可鄙的。黑人群体存在相对高的犯罪率和暴力倾向，问题的根源不在黑人的基因，处理的方法更不是退回到“文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削减黑人的权利。

正是极端不平等、经济不景气、你死我活的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了这样一批批“疯子”，正是系统性的一套种族分化方法，使得很多黑人在社会地位上不断陷入无尽的泥潭、被迫地堕落。不同的种族指责对方更加低劣，现实则是整套制度使得任何一个种族中的底层任何一人都无法逃避道德上的“败坏”，被迫着成为资本主义抚养出的恶魔。

所以对此事必须走出种族叙事，才能求得真正的理解。核心问题在于：什么催生了布朗这样凶神恶煞的反社会疯子？什么导致了布朗得以成功行凶？



“美国梦”的终结和近日难民的处境

由于持续三年的俄乌战争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明显的停战信号，乌克兰人作为在国力为较弱的一方，战争开始就有大量的公民开始逃亡境外寻求庇护。根据联合国难民署 2025 年 2 月发布的权威数据，全球范围内的乌克兰难民数量已突破 690 万，而乌克兰战前的总人口不过 4300 万，其中欧洲境内登记在册的难民超过 510 万。主要接收国包括：波兰：接收超过 200 万难民，提供居留权和工作许可；德国：

约 105 万人；捷克：48 万人。进入 21 世纪以来，自 2011 阿拉伯之春动乱开始，有数以万计的民众受战乱影响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数据，仅 2015 年就有超过 100 万难民和移民抵达欧洲，引发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

许多人由于正规渠道的庇护受挫或者时间、手续过于繁琐，于是索性偷渡，这些发达的西欧国家并非出于对自由的、平等、博爱的追求才大发慈悲接收这些居无定所的外来之客——对于西欧国家而已，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系统得益于远自工业革命就开始的逐步完善，使这些国家的公民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办公室工作的机会远远高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基层体力劳动工人就欠缺了，西欧的发达国家需要这些劳动力完成最基础的工作，而来自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民众自小就没有什么机会接受什么良好的教育，能出卖的只有体力。某些寄宿国会为他们提供学习的机会，主要是一些手艺类的，到最后能够靠着一份实际的工作就会令他们算是稳定在了一个国家。这些难民来到某个国家以后同样带来的是源源不断的滋事、冲突，一些想趁此机会宣扬民族主义的右翼媒体或者自发的社会舆论在一些国家有越来越多的声援者，“威胁论”似乎又被一些野心家拿出来了。

我想这个女孩就像很多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主导下的叙事下被影响的人一样，相信西欧和北美是更民主的、更自由的，生活条件也看起来是更好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这样——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发展胜于东欧，但是这并不妨碍暴力和罪犯在这些国家继续滋生，私有制和其产生的财富差距一天存在，就会不断有人铤而走险并且伤害别人，本就遭受精神病残害的人也会因为管理的不恰当而去杀害别人。在这种社会下，不伤害别人、不压榨别人似乎就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富有。



谁的责任？

伊琳娜逃离了乌克兰，逃离了战火纷飞的前线，但是没能逃出整个社会病态的框架，没能逃出资本主义。

有人说伊琳娜的悲剧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责任——假如他们不为了利益和领土而开动战争机器，伊琳娜没有必要去到美国。可是去到了美国也没能避免身亡的结局，这种新闻对于那些仍心想去美国避难的乌克兰人、中东人来说，是“美国梦”的破碎，这个国家曾经代表了自由和民主，被很多人看作灯塔，如今这层面纱已经在慢慢的揭去。

有人说是美国司法的责任——假如司法能更好降低犯罪率，或者至少让犯人罪有应得，那这个姑娘就不会突遭横祸。网友甚至说：审判他的法官应

该和布朗一样进监狱。法官特蕾莎·斯托克斯是一名黑人女性，与一名同性恋女性结婚，斯托克斯在早在 8 月 22 日夏洛特列车上那起可怕的持刀袭击事件发生的七个月前，以无现金保释的方式释放了扎鲁茨卡的被指控凶手德卡洛斯·布朗。这次案件同样也被美国的右翼媒体拿去做文章，首先布朗本身就是黑人，而审判他的女法官也是 buff 叠的比较高，在右翼媒体那里成了有意无意宣传种族、性取向仇恨的物料。

有人说公交车上那么多人竟然过了几分钟才有人反应去帮忙，简直比罪犯还可恶——伊琳娜没有尖叫只是惶恐地捂住嘴倒在了地上。就像中国社会早些年比较热门的话题：扶不扶？在我们从中共官方的道德说教当中接受到的是“助人为乐”“诚信友善”，而社会的现实却是，扶了反被诈。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同样看到了美国民众在遇到这些事情时的冷漠和旁观者心态，整个社会对此类现象越来越多呈现出的麻木的心态，所有人都在冷眼旁观，过了几分钟，当伊琳娜停止呼吸趴在那里一段时间后才有去看。而对这些流浪汉而言，美国人早已习以为常，毒品、暴力、色情和流浪汉是贫民窟里的标配。

这样乍一看，好像所有的罪恶都是个人的罪恶，好像所有的善举都是个人的善意，这就是在这样一种叙事的框架之下，社会的问题永远被归咎为了某个国家、个人、民族所导致的，这是唯心的。实际上假如我们采取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剖析审查这个事件，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视角：

这个事件只是这个社会悲剧的个中案例，而每一特别案列都会透露出社会的普遍问题——资本主义造成的“人为的贫穷”不断催生出社会矛盾和不幸的事故，不断创造出“疯子”并让屋檐之下的任何一人都无路可逃。它是一个让人们互相残杀还没有出路的死局，是不可容忍的“无止境的恐怖”。司法系统的不公正、社会有效教育和管理的缺乏、一次又一次的难民潮，都是它为我们带来的恶果。

这个制度，必须被彻底推翻。

西贝风波——食品安全与信任危机

西贝莜面村，最早起家于内蒙古，主打莜面和牛羊肉等西北菜。西贝凭借“味道正宗、分量充足、价格亲民”，让其在上世纪90年代末进入北京后迅速走红，当时不少消费者称其“菜量大、实惠又好吃”，甚至被媒体报道为“在北京打工族的口碑食堂”。2000年代，西贝不断扩张，靠着坚持“好吃战略”和对食材的严格把控，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中式连锁餐饮品牌，并在2013年代表中国美食走进联合国总部，展示莜面制作技艺。

然而，随着品牌规模化和门店进入各大商场“盒子”模式，西贝的消费水平逐渐走高。如今，个别分店的豆腐汤要价69元，馒头21元，儿童餐售价也在46-69元之间，并且长期以“**100% 没有预制菜**”为招牌。9月10日，前锤子科技执行董事罗永浩在微博公开吐槽西贝莜面村，称与同事用餐时发现“几乎全是预制菜，价格昂贵”，其消费的是785元的13道菜套餐，并呼吁国家立法强制餐饮企业明示预制菜使用情况。

11日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发布声明，否认使用预制菜，称将起诉罗永浩“损害商誉”，并曝光点餐小票以佐证罗永浩用餐后曾反馈“挺好”且结账累积会员积分。西贝同时宣布全国370多家门店开放后厨参观，并上线“罗永浩菜单”，表示：“一定会，我们一定会起诉他，一定一定会起诉他！”。而后罗永浩连发26条微博逐条驳斥西贝，悬赏10万元征集西贝使用预制菜的“真凭实据”，并呼吁西贝员工私信联系。并在接下来几天继续对西贝进行揭露，9月12日直播称“不反对预制菜，推动预制菜透明化，维护消费者知情权”。指出西贝预制菜占比超80%。多家媒体实地探访西贝线下门店并进行直播。直播当中，后厨曾出现袋装冷冻鱼、袋装鸡汤等。贾国龙再次强调“西贝无预制菜”，并透露日营业额骤降200万-300万元。9月15日中午，西贝餐饮集团就近期预制菜争议道歉。西贝表示深刻意识到生产工艺与顾客的期望有较大差异，没有满足广大顾客的需求与期待，对给顾客带来的困扰和担忧致以歉意。同时承诺进行一系列调整，如在2025年10月1日前，将中央厨房前置加工工艺调整到门店现场加工，包括调整部分菜品的食用油、将部分儿童餐和其他菜品改为门店现做等。不过这则道歉信在发布后又被删除，原因是信中“顾客虐我千百遍”的表述受到不少网友质疑，不久后重新发出时“虐”字加了引号。西贝使用预制菜但却不明示，反而欺骗消费者为高价又冒牌的“现炒现做”买单，“高质量”、“营养健康”的标签，也造成了消费者的心理落差与不信任。



“预制菜”

消防救援行业标准“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管理规则”，对什么情况下餐厅不能使用明火，和餐厅使用明火需要满足什么条件进行了规定。比如，餐饮场所使用天然气作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设置在地下且建筑面积大于150平方米或座位数大于75座的餐饮场所不准许使用燃气。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商场内的餐饮都不具备现炒现做的条件，而商场内的辛迪加餐厅在全国范围内也会在“盒子”里才能见到，所以几乎所有的这些辛迪加餐厅都或多或少有预制。早在2024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就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了预制菜的定义。

“预制菜也称预制菜肴，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如搅拌、腌制、滚揉、成型、炒、炸、烤、煮、蒸等）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符合产品标签标明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条件，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仅经清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菜类食品；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治、披萨等主食类产品；不经加热或者熟制就可食用的即食食品，以及可直接食用的蔬菜（水果）沙拉等凉拌菜；连锁餐饮企业广泛应用中央厨房模式，自行制作并向自有门店配送的净菜、半成品、成品菜肴，均不属于预制菜。”

而对于防腐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表示

“非必要不添加”

“在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的使用量”

“不在菜肴烹饪过程中添加防腐剂，更加符合消费者期待。”

按照这个定义，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并不纳入“预制菜”范围，像速冻面米食等主食类食品，也不属于“预制菜”。然而，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西贝有些半成品的保质期竟然达到两年。虽说在不额外添加防腐剂的情况下，确实存在一些肉制品能够保存如此之久，例如真空包装并经高温灭菌的午餐肉罐头、火腿肠或牛肉干，它们依靠脱水、加盐/加糖、真空密封和高温杀菌等工艺，可以在常温下保存一至两年甚至更久。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类产品通常属于深度加工的罐头类或干制肉制品，而西贝所宣传的“现做现卖”的牛羊肉、丸子、饺子馅等半成品显然并不属于这一类。如果这些产品也能达到两年的保质期，就很难不让人怀疑它们是否经过了类似预制菜的工业化处理。后面又有人表示，“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不纳入预制菜范围”。这是不是会让人有些迷糊呢？而且，如果厂家明明是从工厂制作，但却打上中央厨房的标签，是不是就能蒙混过关呢？但无论是工厂制作还是中央厨房加工，后续都是只需要简单加热就能食用。对普通顾客而言，所谓“预制菜”往往是指那些已经在工厂或中央厨房完成主要加工，只需简单加热或拼装就能端上餐桌的菜品。在这种日常语境下，凡是“事先做好、现场不再经过完整烹饪”的餐品，都会被视为预制菜。但从行业角度看，预制菜的范围更宽，既包括速冻水饺、调理肉制品，也包括经过标准化处理、可长期保存的半成品。正因为存在这种认知差异，才会导致消费者在餐厅遇到“加热即食”的菜肴时，直觉上认为那就是预制菜。

群众的信任危机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句话体现了中国人的一个观念：吃永远是最重要的。当今的食品安全条件远远胜过几十年之前，可是在资本的裹挟之下，食品安全空有条件却没有实践，或者说只有足够的钱去“定制”才能买得到食品安全。

从襁褓到课堂再到社会，无处不在的偷工减料和糊弄依旧不让人放心。2008年的三鹿让30万婴儿喝下添加化工原料的“毒奶粉”；调查记者李翔揭露地沟油的制造和销售过程中的不法行为，让平民认识了地沟油的危害，却在不久之后在家属院门口被人杀害。22年315晚会曝光的土坑腌制老坛酸菜牛肉面；江西工职院2023年6月1日有学生晒出吃出鼠头，初步判定为鸭脖；24年7月的食用油罐车混运；24年11月的良品铺子配料造假；2025年新京报记者调查的剩菜回收再加工售卖、隔夜发黑的牛肉加色素后冒充新鲜牛肉的杨铭宇黄焖鸡米饭加盟店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每次爆出来这类信息、新闻，在第一时间群众也更多是默认相信，**这一个个的丑闻已经让人们对于官方措辞、资本的回复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一次次的揭露令人们一次次的失望，而这只是被报道的。在果蔬种植和采摘行业，笔者曾经和一些从业者交流，他们就提到香蕉是催熟的，西瓜是喷了避孕药了。在市场和利润的驱动之下，鲜有人能做“实在买卖”。在餐饮行业，提高利润的途径无非就是偷工减料，用预制菜，用劣质调料，依靠一些虚假宣传噱头比如“绝无预制菜”“无添加”“营养健康”吸引顾客来消费。

官商勾结

作为西贝餐饮的创始人和现任董事长，不仅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担任副会长一职，还曾兼任中国烹饪协会的副会长。这些职位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餐饮行业大老板们在中发挥的影响，以及与当局千丝万缕的关系。每次被爆出来食品安全相关问题，当局似乎总是站在消费者这一边，假如说官老爷能够提前做好“监督”的工作，那肯定是不不会出现类似问题的，但实际情况却是**他们助长了这一类问题的频发**，为这些丑闻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因为他们也是既得利益者，只要生意一直做下去，没有太大舆论，那总会有源源不断的钱送上门，而万一真掀起波澜，官老爷大可以以一副和事佬的姿态出面协调，相比于那些个别的资本家给的红包，还是自己的地位和资本家阶级的整体利益更重要。官僚们也清楚资本家们根本不敢透露官方的黑料，因为如果资本家离开了官僚便会“一无所有”。

不只是在餐饮行业，**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官僚都和资本勾结在了一起**。在教育方面，每个学校的不管是校服、学习材料的购买还是餐食的订购都是学校领导和相关厂商的老板们进行沟通谈妥的，学生们没有选择的权利，甚至有时候家长提意见都会被当作“问题”来处理。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但不耽误挣钱。在**医疗**方面更为突出，医药行业本就是暴利，成本低廉价格昂贵，普通人为了治病又不得不买，而想要更好的医治疾病只能投入更多的钱，现在所谓的珍贵的医疗资源完全只能被最少人使用。2013年，新闻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曾披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以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此前有媒体称，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名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500亿元，引起争议。2013年有媒体报道，新华社调查领导干部职务消费时发现，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高达300万元。而山西某三甲医院副院长表示，“公费医疗造成的浪费不亚于餐桌上的浪费”。不仅如此，上到医院采购、下到医生推荐药品已经在很多地方被复杂的利益网覆盖了。医院是救人的地方，但不耽误挣钱，没钱是治不了病的。

我们要知道官僚们不会让自己的钱袋子不翼而飞，把希望寄托在他们帮助消费者建立一个协会，或者来发声维护底层消费者的利益是不切实际的，即使可能也仅仅是为了防止舆论进一步扩大化。我们只能靠自己推翻整个私有制社会以及它在方方面面留下的痕迹，才能真正做到少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依。

器官移植：一条白色事业的黑色产业链

九三阅兵上，习近平在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直播下公开讨论人能否活到 150 岁与器官移植的问题。这段通话在外网迅速传播，随后新华社就要求海外各大媒体撤销这段谈话。但普京却在随后的俄国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这段谈话，证实了习近平不仅有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愿望，还妄想与此同时维持一个“好名声”。

统治阶级进行器官移植的原因

习近平现在是中国最高的领导人，是“行走在人间的神”，中共所有的官僚，无论支持他还是暗中反对他，明面上都要说一声坚持习近平同志的领导。只要维持稳定还是中共奉行的准则，那么只要它再活一天，中共就要再遵奉他一天。但是，他已经 72 岁了，即将步入耄耋之年。如果不是器官移植给了他异想天开的幻想，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他剩下的阳寿大概也就十几年了。掌权 13 年的历程，与他 72 年的生命相比，还是太短太短；即使修改了宪法，他的位置可以坐到最终去世，他也不过是在风烛残年中渡过剩余的时光。好在，器官移植给了他“一线生机”；如果他真的活到 150 岁，那就相当于他的生命延长了一倍。活到 150 岁的领导人，统治一个世界级强国将近一个世纪的独裁者——这几乎是每个独裁者的梦想。他们梦想自己的生命长存，当然，长存的不仅是身体，更是这副身体所代表的权力体系。

纵观历史，许多独裁者都妄想着长生不老，妄图通过长生来使自己“永久”地掌握权力。可这真的能够长久么？人体对器官的接受能力总有耗尽的一天，即使不断地进行器官移植，血液的更换，不可避免的死亡终究会有一天夺走他们的生命。“长久”地掌握权力不过是独裁者们做的美梦。他们就算在表面上光鲜亮丽地活着，在背地里也会遭人唾弃，遗臭万年。

独裁者们为什么要倾尽所有来将权力牢牢地握住不放？一方面他们得罪的人太多，人民对他们的愤怒就像高压锅的蒸汽一样。只要他们失去特权，就会被踏上一万只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靠踩着政敌尸体上台，靠榨取着人民的血来享受特权，靠窃取他人的器官而存活，总有一天，这些独裁者们也会接受人民的审判，被自己的权力反噬。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权力也在独裁者们掌权的过程中渐渐被给异化。权力一开始是作为公共管理事务而存在的，而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分化开始，权力成为了统治

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利用权力的人不再用权力为公共事业服务，转而用权力为自己所处的阶级服务。独裁者们不得不维护权力，因为没有这份权力，阶级的统治就要陷入混乱，他们自己的地位也难保。但是，这份权力能够发挥作用，根本上还是因为统治阶级不断地压制着被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行使着权力。独裁者的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权力的一个代表而已。一旦被统治阶级起来革命，打破了统治阶级的专政，那么独裁者的权力就会消散得无影无踪。



医疗市场化结果

生命是无价的。医术是用来维护生命活动的一项技术，因此从一开始，它就带有那种高尚的道德规范。它原先就是为普罗大众而服务的，是面向所有人。可是伴随着资本的到来，自由市场的建立，让这个本来充满崇高道德的职业被异化得越来越深。当医院和诊所不以治好病人，而是以营利为目的时，所谓的仁义道德也被他们抛之脑后。

器官移植产业就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应对移植后的人体的免疫排斥反应的技术、血管缝合技术等等到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它已经是一种可行的、可复制的技术，从而是可以稳定地用来盈利的技术。当然，由于器官移植手术的高成本，往往是资产阶级才有这种财力支撑器官的出售。那么器官究竟该从哪儿来呢？国际上，器官有两大来源，一个是利用细胞增殖技术，让细胞慢慢长成一个合格的器官。但是这样形成的器官往往会有未知的风险。另一个来源是人们主动捐献自己的器官，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的器官类型与贡献的器官类型往往很难匹配成功。需要器官的

人可没有耐心慢慢等人把他需要的器官给捐赠过来。那么一条黑色的产业链就应运而生——专门“抓”人去活摘器官。

被“抓”的人一般有哪些呢？笔者所知的人有来自研究法轮功的人，信仰宗教的人甚至是需要急救的病人。陈佩明作为一名法轮功信徒，曾经目睹过其它法轮功信徒被活摘器官，他自己也被活摘过肺部器官。法轮功是邪教，对社会造成了破坏，这个不假。可是中共自己所宣扬的“依法治国”“保护人权”都去哪里了？活摘后的器官去了哪儿？是给了高级官员们让他们苟延残喘，亦或是去做了相关的器官实验？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活摘器官本身就是残忍的，灭绝人性的。中共也知道，这样的信息泄露出去，会引起多么剧烈的轩然大波，因此他们一开始还只是在被社会抛弃的法轮功信徒身上摘取器官。但是，法轮功信徒的人数终究是有限的，但是对器官的需求却是持续的，并且是极其有利可图的。

这条黑色产业链在国内已经秘密进行了近十年了。近十年来，中共一面宣传严打“拐卖”即贩卖人口现象；可是另一方面在我国失踪的人口数量一直在增长。他们失踪去了哪儿？现代这么高级的DNA检测技术都查不出他们的踪迹么？要么是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无能，不愿去费劲心思调查失踪的人口。要么。就很可能就是因为被“抓”去做了活体器官摘除手术，神不知鬼不觉地蒸发于人间，只留下他们的亲人在苦苦寻找着他们的蛛丝马迹。

而这次谈话也是习近平在向国外宣传中国的器官移植技术有多么成熟。一方面靠这种技术来吸引其它国家的独裁者，甚至借此拉拢同盟，另一方面靠这种方式来幻想自己会牢牢地掌控中国的政权。但这种成熟的技术不是靠上帝赐予下来的，而是靠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同胞用自己的器官，自己的性命换来的，是用血淋淋的器官换来的。

无产者们和全体人民早应当认清现实，认清中共的目的。我们的命不是他们用来延续他们的命的，我们的命，我们的器官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没有这个极其不透明、极其专制、极其独裁的制度，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也就不可能发生。我们应当团结起来，取革命，去战斗，去推翻这个不公平的制度。纵使革命会流血牺牲，那也是我们朝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而前进的必经之路。

论中国国家性质

在过去 40 余年中，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腾飞与社会转型。中国从人民的基本温饱都无法满足的农业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封闭自守到深度参与全球化，这一进程无疑改变了数亿人的生活轨迹。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社会形态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历史运动中会不断调整自身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与阶级关系格局。**中国自开放以来的发展背后蕴含着一条值得深思的主线——国家在维持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同时，其阶级结构与权力运作逻辑已发生了深刻变化。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长期战乱与外来侵略，为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感与社会地位的提升。中国逐步确立了以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工业化带来了物质生活水平方面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掌握行政、经济与政治资源的专职干部群体逐渐形成，并在制度安排与物质利益上与普通群众拉开了距离。这一阶层**虽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执政，却在实际运作中拥有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与决策逻辑。**

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极为落后，经济基础薄弱，长期战争造成的破坏尚未完全恢复；同时，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与经济封锁迫使国家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优先保障国防与重工业建设。在这种内外压力下，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渠道逐渐收窄，这一干部阶层在政治上相对封闭，在经济上掌握资源分配权并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特权。这种结构性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激烈冲击，但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进入 1970 年代末，面对经济停滞与政权合法性压力，执政的官僚集团推动了以“改革开放”为名的制度调整。最初，这些改革被界定为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效率、改善民生。然而在实践中，改革不仅释放了生产力，也为官僚群体与新兴企业家阶层的利益结合创造了条件。通过价格双轨制、承包经营、对外开放等措施，资本积累的空间迅速扩大，市场逻辑逐步渗透到经济与社会的核心领域。

1980 年代末的社会抗议，尤其是 1989 年的政治风波，暴露了群众对腐败、通胀和社会不平等的不满。事件之后，执政集团在政治上收紧控制，在经济上加快市场化步伐，以巩固统治基础。1992 年的“南方谈话”标志着市场化方向的不可逆转，国家正式将市场机制提升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此后，大规模的国企改革、福利体系的瓦解、土地与住房市场化，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在经济基础上**

全面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这一进程并非简单的“引入市场”或“发展生产力”，而是在**国家机器高度集中的条件下，由一个相对独立的专职干部阶层主导，并与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形成利益同盟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重建**。国家在政治上保持对社会的强力控制，在经济上却为资本扩张提供制度保障。这种双重角色，使得当代中国呈现出一种类似历史上波拿巴主义的特征：国家权力表面上超越阶级对立，以“全民利益”自居，实则^在维护特定阶层利益的同时，依赖经济增长来维系合法性。

中国政府引入市场机制并非出于自觉“复辟资本主义”的意识，而是为缓解经济停滞与合法性危机，采取**“走一步看一步”、“摸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手段**。因此他们与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结成利益同盟，限制其他社会力量进入资产阶级阵营以及国家机器，形成内部利益分化严重、但在对外代表性上高度集中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结构。这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大陆的资产阶级唯一合法代言人的地位。

因此，要理解2001年以后中国的国家性质，必须从这样一个现实出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相对独立于群众的官僚阶层始终掌握着国家机器，在不愿意放弃自身特权和利益的前提下为缓解社会矛盾稳固统治，在世纪之交完成了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整合。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面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已无半点关系：更合适的形容，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1) 什么是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

所谓波拿巴主义，代表着国家实行赤裸的军警专政，成了一个举着剑的“仲裁者”。这种政权表明，社会内部的敌对关系已经变得如此之严重，以至于需要一个替财产所有者“调节”和“命令”这些对抗的国家机器，它**从所有阶级中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当“社会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国家权力可能“*暂时凌驾于社会之上*”。这是一个“全国法官”，用一个阶级制衡另一个阶级，同时却仍保持为资产阶级的工具。波拿巴主义政权一般会宣称自己代表“全民”，并以“拯救国家”为名，通过个人权威和部分社会改革争取底层支持，同时依靠军队、警察成为统治的直接支柱。

同时，我们也将如下的情况定位为波拿巴主义：当一个政权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方的基本阶级力量保持大致的互相平衡（一般来说是资产阶级本身的阶级力量太弱小，只能依靠一个专制政府维持统治），而使得国家力量得以操纵、平衡相互斗争的各阵营，而又再一次给了国家权力相较于社会的某种独立。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独立是“相对”的，波拿巴主义国家的官僚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资产阶级国家官僚阶层。

波拿巴主义的土壤既然是“社会矛盾的尖锐之时”，而各阶级又无“完胜者”而是此消彼长，就代表它与“动荡”脱不开关系。换言之，它与制度的推翻或确立脱不开关系，也就是存在于社会制度的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出生和死亡之际。

资本主义崛起阶段的波拿巴主义凌驾于社会之上，压制和“仲裁”社会内部的公开冲突，调节阶级对立，它是强大而自信的。这个时候的波拿巴主义源于封建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平衡，在资本主义可以让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它表面可以维持相当程度的稳定（生产力发展支撑），却不可能改变其内在的脆弱，易被旧的、反动的统治阶级颠覆（如波旁王朝复辟）。

资本主义衰落时期的波拿巴主义受到了衰老的影响。它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中崛起，却无法解决它所面临的任何问题。社会的主要危机，即生产力和私有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已经变得如此巨大，它所引发的阶级对立如此紧张，使它变得在实际上软弱无力（哪怕它表现地再强硬，实际上也是外强中干），以至于它的整个结构摇摇欲坠，很可能在它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中被推翻。



以下是具体例子：法国二月革命的浪潮后，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在1851年政变后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通过全民公投使其权力合法化，声称自己是“人民的选择”，并承诺恢复秩序和繁荣。他推动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如兴建公共工程（如巴黎城市改造）、促进工商业发展、改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处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不过，他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警察和官僚体系，并将军队作为统治的直接支柱，甚至在1858年公开宣布“法国受军队统治”，以镇压反对派。

在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后，查韦斯以“反美斗士”和“穷人救星”自居，并以委内瑞拉民族英雄玻利瓦尔的精神、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和土著印第安人部落思想的混合思想为其意识形态基础，推行“21世纪社会主义”。查韦斯政府推行“深入贫民区计划”，提供免费医疗、教育、食品补贴和低价住房，使贫困率下降，赢得底层忠诚。同时查韦斯政府执政后将军队高层替换为亲信，并建立民兵组织（如“玻利瓦尔民兵”）作为后备力量。2002年政变后，他有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此外，查韦斯还通过“委任立法权”绕过议会，使得个人权威凌驾制度

之上。

在 2000 年代初，土耳其经历了经济与政治危机后，埃尔多安以“反精英、人民代言人”形象崛起，融合奥斯曼遗产、逊尼派伊斯兰、民族主义与反西方情绪，提出“新土耳其”的愿景。其政府扩展医疗、住房、救助等福利，并以基建和消费增长赢得下层与部分中产支持。执政初期削弱军方政治地位，2016 年政变未遂后大规模清洗军警、司法与公务员，换上亲信，并依托亲政府群众组织进行动员。2017 年公投改宪，废议会制、建总统制，集中行政与立法权于总统，使个人权威凌驾制度之上，并以民族主义外交巩固国内支持。

在阿根廷处在战后危机与阶级僵持中时，胡安·庇隆以“民族复兴、社会正义”自居，提出“第三位置 / 正义主义”，糅合民族主义、天主教社会观与工团主义。庇隆政府通过进口替代、国有化、将工会纳入国家、提高工资福利、扩张住房与医疗，动员“无衬衫者”并赢得底层忠诚。庇隆出身军方，执政后清洗异己，倚重警情机构与庇隆党 - 总工会网络；1949 年改宪强化总统权、允许连任，压制反对派与媒体、以法令治国，个人权威凌驾制度。晚期及继任时期出现亲政府准军事网络（如 AAA）镇压左翼。

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多产生于阶级力量僵持与制度危机之际**，依托“个人魅力”与民族主义话语，结合军警控制、群众动员与福利分配，凌驾议会与法治之上，以超然仲裁者姿态维系统治。**其本质是以国家机器尝试调和阶级矛盾、维持已经濒临破产的资本主义秩序。**由此可见，当统治阶级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与自主整合能力时，往往需依赖此类个人化权威，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内在软弱性，以说明中国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存在的原因。

（2）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与阶级力量的分散

在欧美、日本等的“典型”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制度等正式渠道表达其利益诉求，并形成统一的阶级政治纲领。然而，在中国，由于历史与制度的独特性，**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异常尖锐，导致其无法形成统一、自主的政治力量。**这种分裂主要体现在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和房地产资本之间的深层矛盾。

金融资本和房地产资本具有天然的“虚拟化”和“寄生性”积累倾向。它们通过信贷扩张、土地增值等方式获取超额利润，往往以剥夺实体经济（工业资本）和普通工薪阶层为代价。这种矛盾在西方国家曾引发产业资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但在中国，这种冲突的表现形式更为复杂且隐蔽。例如，房地产资本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土地财政”共生关系，地方政府通过垄断土地出让权来维持财政收入，这直接导致了商品房价格的长期畸高。例如，2009 年被调查的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案就牵涉到多名房地产商人，其中商人李亚鹤旗下的“金光华广场”项目因涉及非法转让土地行为，最终被政府没收；在 2020 年，仅兰州市一个城市，恒大集团关联公司所获取的土地金额就占到了全市土地出让金的 35.3%。这种高度依赖关系使得房地产资本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地方政府的庇护紧密相连。然而，当房地产市场疲软，如恒大集团出现债务危机时，地方政府的财政也受到严重影响。这种依赖性使得房地产资本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其对地方政

府的依附紧密相连，而非通过自主的阶级力量进行协调。

由于缺乏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人民代表大会”之外的统一的阶级政党和正式的政治渠道，**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主要通过非正式的、个人化的渠道来表达。**例如，2008年，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和单位行贿罪被调查。此案揭示了他通过行贿等方式，与官员建立起非正式的权力关系，以支持其商业扩张。他所涉及的违法行为，正是利用这种隐性关系，绕过正常商业和金融监管，来获取巨额利益。这一事件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反映出**权力与资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勾结，以及资本对权力庇护的深层需求**；2009年，时任深圳市长许宗衡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牵涉出多名房地产商人。其中，商人李亚鹤旗下的“金光华广场”项目因存在非法转让土地行为，最终被政府没收。这一案例直观地展示了房地产资本如何通过与地方政府官员的裙带关系，来非法获取稀缺的土地资源，从而实现超额利润；2013年，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查。法院认定其在2002年至2012年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多家公司及个人谋取利益。他通过其子收受了南山集团等单位的巨额贿赂。这表明，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大型私营企业不得不通过“购买”官员的权力来确保其项目的审批和发展，将腐败作为一种必要的“寻租”成本；2013年，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因深度介入企业大昌矿业的经营活动，并从中收受大量玉石作为“回报”而被调查。此案被视为典型的“雅贿”腐败案例，突显了官员与私营企业主之间建立的隐蔽而紧密的利益输送网络。

这种通过**贿赂、裙带关系**等方式建立的个人化依附，使得**资本集团的利益表达高度分散，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他们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庇护来获取稀缺资源、压制劳工、维持市场特权。这种依附性使得资本集团的整体利益服从于党和国家设定的发展框架，而非相反。

中国的资产阶级内部尖锐的内部矛盾，有时会通过国家机器的介入来解决。例如，像宝能集团这样的私营资本，在与国有资本或有官方背景的资本进行斗争时，其命运往往受制于国家权力的态度。宝能曾试图与格力争夺控制权，但最终败给了以高瓴资本为代表的，获得珠海市国资委和格力集团信任的资本方。此外，当宝能集团面临债务危机时，其资产也遭到拍卖。有评论指出，中国的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博弈，实际上是“权贵集团的矛盾”，虽然单个集团会反抗，但这种反抗是分散的，因为**一旦中共政权倒台，他们将“一无所有”**。因此，中国的资本只能依附于权力，以保住自身利益，实现自己的资本的增值。这就是为什么大资产阶级也许会不满限制他们资产流动自由和生活奢侈消费的诸多政策，却仍然“不乐意”地服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党国对他们来说就像严厉的“大家长”，虽然平日会呵斥、控制，但没了它只能饿死在街头。

此外，自200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对私有资本进行制度化控制的新模式，即“黄金股”入股私企。**通过政府或其代理人以极少的资金入股私营企业，并获得关键决策的否决权，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私人资本发展方向的掌控。**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正式提出，允许私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此举在党内引发了争议，但官方评论明确指出，这是为了将私营企业家这一重要社会力量纳入党的监管和控制之下，从而确保党对权力的垄

断。这是一种**“以吸纳促控制”**的策略，旨在将可能威胁到党权力的力量纳入体系内部，使他们服从于党的核心领导；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久，中共便正式将党的控制引入私营部门。据报道，到2017年，中国约186万家私营企业中，近70%已设立了党组织。这种做法确保了党在私营企业内部拥有直接的、正式的组织基础，**使得党和国家的意志能够直接渗透到企业运营的各个层面，从而实现了**对私有资本的**“制度化”管理**。

这种做法被一些人解读为与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然而，这根本不是的资产“国有化”，而是确保了资本的运行必须符合国家意志，同时让资本家自行承担亏损。这种对资本的支配权，恰恰是强大的官僚国家机器在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和政治弱势背景下，得以获得相对独立性的重要表征。

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导致其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这种结构性的弱点，使得**资本家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国家机器寻求庇护。这种依附性反过来强化了国家机器的“仲裁者”角色**，使其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并最终使得党国官僚系统成为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唯一有效代理人。这种因果链条构成了波拿巴主义在中国得以成立的统治基础。

(3) 中国的波拿巴主义专制政府

一个阶级的统治不可能仅仅依赖于强制力，也依赖于其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即通过思想和文化领导力让被统治阶级自愿接受其统治。然而，在中国，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个人成功和消费主义，在提供令人信服的发展愿景和解决社会矛盾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破产迹象。

最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被官方论述明确地宣判为“破产”**。中国官方的批判指出，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彻底私有化、绝对自由化和完全市场化，背离了“和谐、合作、共同发展”的时代主旋律，并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例如，在一些西方国家，0.1%的最富有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几乎与90%的人口相当。这种官方的批判，本质上是**对一种可能挑战其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先发制人”**，它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动荡、金融危机联系起来，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削弱了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号召力。这使得任何试图以纯粹资本逻辑或自由市场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论调，都在官方叙事中失去了合法性。

当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法有效整合社会时，社会中便弥漫着对现有体制的幻灭感和普遍的不信任感。这种信任危机几乎波及一切领域，从食品安全、医疗、娱乐，到对体制本身和政府官员信誉的普遍质疑。这种信任的流失，表明**资产阶级无法通过其自身的意识形态说服民众（包括部分中间阶层）接受其统治的合法性**。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通过福利政策、劳工权利谈判等妥协与让步，将工人阶级整合进其“文化霸权体系”。但在中国，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分裂和依附性，其无法进行这种有效的阶级妥协，使得阶级矛盾长期处于持续的对峙状态，从而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在阶级力量上的平衡。尽管2001年修订的《工会法》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但现实中工会的工作原则却是将“促进企业发展”置于“维护职工权益”之前。这种设计使得工会未能成为独

立的工人阶级利益代表。其结果是，自 2010 年以来，工人自发集体行动的数量进一步上升，劳资争议的对抗性增强，处理难度加大。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真空中，强大的**波拿巴主义国家机器必须承担起意识形态管理的责任**。它通过多种方式来重塑其统治的合法性，填补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破产而留下的空白。



自 2001 年以来，高强度、高压力的“反腐败”“扫黑除恶”运动成为中国政府重塑合法性的突出手段。这些运动并非仅仅是打击贪腐，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意识形态战役。它将腐败现象归咎于个人道德败坏和某些“利益集团”的勾结，而非体制本身的结构性问题。通过将腐败官员和奸商绳之以法，国家机器成功地扮演了一个“正义的”仲裁者角色，向民众证明其有能力“清理门户”，“维护社会公正”。

官方研究也表明，反腐败的正面评价能够提升公众的政治信心。这种“高压反腐”所带来的合法性，并非源于对社会深层矛盾的根本解决，而是源于对腐败这一表象的强力打击，将合法性集中于“高压反腐”这一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它使得民众在对地方官员和企业家不信任的同时，对中央政府的权威产生了依赖和信任。

中国资产阶级也会利用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作为新的社会整合工具。例如，“国潮消费”现象的兴起，将青年消费者的品牌选择与民族文化内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绑定。这表明，消费行为已不再是纯粹的经济效用选择，而是被转化为一种关于“认同忠诚”和“文化选择”的社会建构。它通过鼓励购买国货、支持民族品牌，将个人的消费行为与集体的民族情感联系起来，从而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凝聚力。

此外，在官方叙事中，中国自 2001 年以来实施的各项经济与社会政策，如扶贫、社会保障和公共住房等，被描述为“为人民服务”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体现。然

而，“贫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并非个人或集体的命运问题，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制度性贫困”**。既然如此，任何旨在消除贫困的政策，都必须放在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关系中加以考察。资本积累依赖于劳动力的持续供给，这不仅包括劳动力的数量，还包括其健康、技能与稳定性，波拿巴主义国家尤其通过在阶级间“仲裁”来维持统治，其社会政策往往兼具缓和矛盾与服务资本的双重功能。从这一逻辑出发，我们就可以正确解释中国自2001年以来的扶贫、社会保障、公共住房等政策的深层动因。

例如，中国的脱贫攻坚战的深层逻辑是，通过国家的强大力量实现社会剩余向贫困群体的有效转移。这种转移改善了劳动力的生存条件，缓和了因贫困和健康损害导致的社会矛盾，维持了社会稳定，最终保障了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例如，官方政策明确指出，实施各项政策和具体措施，旨在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培育高素质劳动者”，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劳动供给”。这**并非无阶级性的“为人民服务”，而是带有明确阶级目的的社会政策，其核心是维护劳动力的持续供给。**

同样，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的建设，也被纳入到“劳动力再生产”的逻辑框架中。因为，劳动者健康是社会正常生产的前提，所以中国将人民健康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高水平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新质劳动力”。这些政策通过保障劳动者的健康，防止因疾病、贫困等问题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从而**维护了社会稳定，并最终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长期需要**。这些政策既体现了国家对底层阶级的“家长式关怀”，又实质上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的长期需要。国家政权作为“仲裁者”，**通过有目的的社会政策来管理和控制阶级矛盾，而非真正致力于消灭阶级对立。**

思想的统治必然离不开暴力的镇压，那中国政府是如何推行自己的政策的呢？必须清楚中国强大“维稳”机器的运作并非简单地依赖于大规模的警察力量。数据显示，中国的警察人口比例远低于许多西方国家。例如，中国拥有约200万正式警察和400万辅警，正式警察占人口的千分之1.42，而法国的这一比例为千分之3.51。此外，中国的警察队伍中，用于专业化镇压的警力比例相当少，大多数辅警主要负责交通等日常事务，甚至在这些日常工作中警力也显得相当紧张。

因此，**中国维护社会秩序的核心力量，并不主要依赖于警察的棍棒，而是一个更为复杂、多层面的“维稳”机器。**这一机器的规模和开支在21世纪初急剧扩张。据清华大学学者估计，中国大陆在2010年发生了超过18万件“群体性事件”，是10年前数量的3倍。同样是2010年，中国的维稳支出金额达到5490亿元人民币，首次超越国防费用。这表明，国家资源的配置已将内部安全与稳定置于与外部防卫同等，甚至还享有更高的战略地位。沈勇平在新浪财经的“国内财经”专栏中发表的一篇文章《谁是第一大财政支出？》（2018年08月14日）里指出：

“公检法是主要的维稳部门，实际上除了公检法，其他很多部门也要承担维稳任务，尤其是在地方上，很多基层部门也要承担维稳任务。所以维稳费用，要远远超过公共安全支出，因为公共安全支出只包括供养公检法（公安、武警、法院、司法）的费用，其他部门的维稳费用并没有算在里面。也就是说，维稳费用远远超过了国防费用。”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政府用于“维稳”的费用在实际上是一年比一年多的。**这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依赖于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在内的三大武装力量。**其中，武警部队的角色尤其关键。武警部队自建立之初就承担着维护国内治安的任务，自2001年后，武警部队更是按照“**多能一体、有效维稳**”的战略要求，加强了执勤、处突、反恐、海上维权和行政执法等能力建设。**解放军也被明确赋予了“依法协助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主要承担防范恐怖活动、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等职责。

近年来，“**军事治理**”这一概念也被中国政府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习近平强调，全面加强军事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这表明，军事力量不再仅仅是外部防卫的工具，更是作为国家治理的内在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保卫国家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和社会稳定**”。这种将军事和准军事力量制度化地纳入国内治理体系的做法，恰恰是波拿巴主义国家机器权力膨胀和独立于阶级之上的最显著特征。

这一庞大的维稳体系之所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高效运转，并不仅仅依赖于武装力量的部署，还依赖于一种**制度性前提——在政治结构上彻底排除了一切阶级的独立政治活动空间（甚至包括资产阶级）**。首先，现在的**中共内部并不存在真正的党内民主**。党的最高决策权集中在书记处和少数常委手中，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在实际运作中多为橡皮图章。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统一性、由各形各色的仕途主义者组成的公务员机构，这也是不可避免的。2008年全国人大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当时为连任安排）在提交全会前已由常委会定案，全会和中央委员会只是全票通过，没有实质性修改（新华社2008年3月15日报道）。可见，中共缺乏通过广泛讨论和教育达成统一认识的机制，而是**依靠行政命令和组织手段将思想强加于党员**。

其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现实中并不掌握独立的立法权**，其职能被行政机关所吞并，行政、立法、司法权力事实上集中于同一执政集团手中，这体现在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和最终名单均受党委控制**，其差额比例极低，独立候选人几乎无法进入正式名单。2003年湖北潜江市人大换届选举中，独立候选人姚立法联络了40位自荐村民参选，结果全部落败。据《南方周末》报道，当地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选举过程，32名自荐候选人无一进入正式名单；2007年中共十七大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预选的差额比例仅为8%，且候选人名单由中央组织部事先审定。这意味着差额比例远低于形成实质竞争所需的水平，且名单控制权完全在党委手中。

更重要的是，**人民不存在针对一切官员的随时罢免权**。宪法和选举法虽规定人大有权罢免本级选出的国家机关人员，但罢免须由主席团或1/10以上代表提议，并经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普通公民无法在任期内直接发起投票。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是在其因受贿被中纪委“双规”并移送司法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党内决定程序追认罢免职务（新华社2007年7月10日报道）。2009年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罢免原副市长文强人大代表职务，同样是在其被中共重庆市委撤职并立案侦查后，由人大常委会按党内决定形式化通过（新华社2009年6月26日报道）。这类案例均显示，2001年后的罢免案例几乎全部由党内先行决定，再由人大追认，从未出现基层选民直接发起的罢免。

在社会自由方面，中国宪法第 35 条虽然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但在法律和行政实践中，除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外，**独立的政党、工会、社团均无法合法注册，任何试图建立独立政治组织的行为都可能被定性为“非法组织”而取缔。**在基层自治方面，村委会、居委会等虽名义上由居民选举产生，但候选人资格和选举过程受到上级党委的严格控制，缺乏真正的群众自主性。2010 年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并在选举中**罢工在法律上既无明确保障，也不享有刑事或民事免责。**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在城市，居委会虽在《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被称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但 201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社区党组织在居委会选举中发挥主导作用，甚至可将未参与选举的社区组织负责人推选为居民选举委员会主任。

在罢工权方面，1975 年和 1978 年宪法曾明确规定罢工自由，但 1982 年宪法删除了这一条款，导致**罢工在法律上既无明确保障，也不享有刑事或民事免责。**尽管中国在 2001 年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劳动者有权罢工，但国内立法并未落实这一权利。在表达空间方面，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等自由虽在宪法中列明，但在现实中受到《集会游行示威法》《网络安全法》等多重限制，公共表达渠道高度依赖官方许可，独立媒体和异议言论常遭封禁或惩处。2003 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叶宁因在网络发表批评性文章，被校方以“违反校规”为由开除学籍；2005 年，《冰点周刊》因刊登历史学者袁伟时批评教科书的文章而被停刊整顿；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虽然政府设立了所谓的“示威区”，但据《纽约时报》报道，77 起申请全部被拒绝，部分申请者甚至遭到拘留。2009 年新疆“7·5 事件”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封锁互联网，社交平台、独立论坛和部分境外新闻网站被长期屏蔽。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所谓“民主”只是统治阶级内部在权力分配和利益协调上的民主，而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主。**在专制政体下，这种“民主”甚至在统治阶级内部也不存在，**决策权集中于极少数核心人物之手，统治阶级其他成员只能服从执行。这不仅意味着被统治阶级完全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也意味着统治阶级内部缺乏公开辩论和制衡机制，权力运行高度封闭化。

因此，中国的这种波拿巴主义专制制度安排意味着，**中国在法律上只允许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活动，而这也导致了所有宪法和政治体制所宣布的自由都被架空。**政治活动及政党活动的自由被压缩到执政党内部的有限空间，而党内又缺乏民主机制，形成了双重封闭的政治格局。结果是，社会缺乏通过结社、基层自治、劳动集体行动和公开表达来制衡国家机器的制度性渠道，这不仅使维稳机器得以在缺乏外部监督的情况下扩张，也使得任何挑战其权威的政治或社会力量在萌芽阶段就被压制。

(4) 中国官僚的阶级性质

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及其官僚体系都并非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其赖以

生存、发展的核心支柱。**资产阶级的统治，从来不能仅仅依赖于纯粹的经济强制。**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只能以复数的、相互竞争的私人资本形式存在，这使得任何单个资本家或资本家团体都无法代表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因此，确保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实现的一般条件——例如，稳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有效的财税制度、统一的市场规则以及对劳动力的管理——必须由一个凌驾于个别资本之上、看似中立的特殊机构来执行，这个机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

国家机器通过垄断合法暴力（军队、警察、法庭），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维持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社会秩序。同时，它也通过意识形态机构（教育、媒体）向被统治阶级灌输接受现有秩序的观念。可以说，没有国家这个“理想的总资本家”，资本积累便无从谈起。



而官僚，作为国家机器的具体执行者和管理者，是这一体系的必然产物。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大型私人企业，其协调、监督和控制的内生需求，都必然催生出庞大的科层制管理机构。市场竞争非但不能消除官僚，反而会加剧其膨胀。一方面，企业内部为了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需要建立严密的监督与控制体系；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引发的社会矛盾（如劳资冲突、环境污染、金融危机）需要国家官僚机构出面调节与管理。因此，**资产阶级官僚并非某种制度的偶然缺陷，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政治和管理领域的必然体现。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资产阶级实现其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

尽管官僚集团在国家管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享有制度化的特权，但将其定义为一个独立于一切阶级（包括资产阶级）的“官僚资产阶级”是错误的。阶级的划分根本上取决于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即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能否凭此剥削他

人劳动。**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其权力来源于其在国家机器中所处的职位，而非对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官僚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核心谬误在于，它混淆了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支配权与法律上的所有权。诚然，中国的官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通过国家机构集体性地影响和支配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生产资料，制定经济政策，并从中牟取私利。然而，这种权力是职务性的、非继承性的。官僚的特权随其职位的获得而产生，也随其职位的失去而消失。他们无法像真正的资产阶级那样，将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通过产权制度合法地、排他性地传给后代。

所谓的“官僚资产阶级”通过贪腐、寻租、裙带关系等非法或灰色手段占有社会剩余价值，恰恰反证了他们并非一个成熟的、拥有稳固经济基础的统治阶级。一个真正的统治阶级，其剥削方式是制度化、合法化的，内嵌于生产关系之中（如资本家合法地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官僚的非法牟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于现有生产关系之上的权力变现，是一种“窃取”而非制度化的“剥削”。**他们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个的特权阶层，是国家机器的管理者，但并非一个拥有独立经济基础和历史使命的新阶级。他们的存在依赖于特定的国家形态，他们永远不可能创造一个由他们自己所主导的生产方式。

同时，将当代中国的官僚体系简单地定性为“封建官僚”或“法西斯官僚”同样是不准确的。

封建主义的核心是土地贵族通过超经济强制（如农奴制、地租剥削）维持统治，其经济基础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与等级制。而现代专制（如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危机下垄断资产阶级的极端统治形式。资产阶级专制尽管使用独裁手段，但其统治基础并非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服务于金融资本与工业巨头的集中化需求，即通过国家的指导性计划保障利润、镇压工人运动，这恰恰是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至于说资产阶级专制政府存在所谓“封建属性”的论断也是荒谬的。封建官僚是贵族特权的延伸，而资产阶级官僚的功能是维持资本积累（如推动军工复合体发展），这与封建采邑制下的效忠关系存在根本区别。马克思早已指出，政治形式（专制或民主）不直接等同于生产方式性质，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都可能产生专制政权，但其压迫的阶级内容由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决定。**将资产阶级专制政府的存在归为“封建复辟”，既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暴力性，也消解了工人阶级认清真正敌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机械类比的历史观谬误。**

中国也并非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尽管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表现为资产阶级专制形态，但其阶级基础、运行机制与历史使命截然不同。虽说中国在1989年之后，国家权力在阶级斗争的僵持中取得了相对独立性，这与1956至1992年间作为工人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可见中国的波拿巴主义政府和法西斯主义一样，确实是在一场失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任何一个法西斯政府上台前，必然有一场失败的社会主义革命，如德国11月革命、意大利“红色两年”、日本“大正民主”）。然而，这种转变并未让中国导向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垄断资产阶级在面临生死存亡的社会主义革命威胁时，彻底抛弃民主外衣，资助并武装一个以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为基础的群众性运动，通过“自下而上”的狂热暴力，从物理上摧毁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工会。**这是“群

众反对群众”的机制，是资产阶级借另一部分群众之手，对最具威胁的革命无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恐怖的内战。

中国的现实恰恰缺乏这一决定性特征。当代中国泛滥的**“粉红”民族主义和“主流正能量”思潮，并非法西斯主义式的群众运动**。首先，它并非一个由资产阶级资助、拥有独立组织的准军事力量，而是在国家宣传机器主导下，一种高度原子化的、主要存在于网络空间的线上动员。其功能是维护现行政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打击异见者，而非像纳粹冲锋队或意大利黑衫军那样，成为一支有组织的、专门用于进行街头战斗、捣毁工会、暗杀左翼领袖的武装力量。其次，其动员的阶级基础和目标也与法西斯不同。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虽然在部分小资产阶级中反应强烈，但它并未被塑造成一支旨在消灭工人阶级斗争的特定社会力量。**中国国家机器对工人运动的压制，主要依赖其自身的专政工具——警察、官方工会和法律体系——来进行“自上而下”的管控、分化与镇压**。中国的资产阶级无需也无力支持小资产阶级组织起独立的法西斯运动，他们选择依附于现存的、强大的国家官僚机器，由后者来扮演压制劳工、维持秩序的“仲裁者”角色。

将今日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或“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同样是错误的分析。这两个概念诞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论战的特殊历史背景，它们从一开始就承载了强烈的政治斗争色彩，而非严谨的科学分析工具。

“修正主义国家”的提法的预设是，存在一个“正确的社会主义范本”（即毛泽东时代），而后续的发展是对这一范本的“背叛”。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它**跳过了对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和客观规律的具体分析，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化为领导人的思想路线斗争**。它无法解释为何“修正”会发生，也无法为当下的社会矛盾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最终只能导向一种简单化的、怀旧式的政治口号，即**“回到过去”**。有人认为，只要今天为“修正主义国家”赋予明确和科学的含义，即便过去解释力不足或是政治斗争色彩过强，用这个被重新定义的词也能成为一种对中国国家性质的科学解释；然而，概念的解释力不仅取决于定义，还取决于它能否揭示现实的因果机制、区分不同类型的现象并生成可检验的预测。即便重新包装，“修正主义国家”这个词依旧倾向于将复杂的经济结构、阶级构成和国际关系压缩为单一的政治身份判断，难以真正解释当下的社会矛盾。

“社会帝国主义”这一标签同样存在严重缺陷。它在中苏论战中被中国共产党用来指责苏联“口头社会主义、实质帝国主义”，但这种用法更多是政治修辞，而非基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系统分析。列宁所界定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全球体系特征，包括金融资本的统治、资本输出、国际垄断同盟和世界瓜分等。今天的中国，确实已经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了，但将其简单套入“社会帝国主义”这一标签，不仅无法揭示当代中国帝国主义的具体形态，还会模糊其与“苏修”、以及典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资本结构、国家 - 资本关系、全球分工位置上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这种标签化的定性，会将对外扩张的动因简化为“背叛社会主义”，而忽视了中国国内资本积累逻辑、阶级力量对比、国家资本主义运作机制等深层因素**。它既不能解释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特殊位置，也无法为反对中帝国主义提供有效的策略指引。与其沿用带有厚重历史包袱的“社会帝国主义”一词，不

如直接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世界体系分析和当代国家资本主义研究，对中帝国主义特征进行结构化、机制化的剖析，这样才能在理论上更精确，在政治实践中更具指导意义。

所以，与其在这些充满历史包袱的标签上纠缠，不如运用更精确的分析框架（如波拿巴主义），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具体矛盾、阶级力量对比和国家性质进行科学、深入的剖析，这才是深化批判能力与探索改造现实路径的正确方向。

（5）中国的各被统治阶级的情况

现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根据官方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约为7.34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为4.73亿人，占比达64.5%。在这一庞大群体中，“农民工”扮演了关键角色，其总量在2024年达到2.9973亿人，他们是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后备军”。同时，“零工经济”的兴起创造了一个庞大且快速增长的新型工人阶级群体。人社部数据显示，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2亿人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零工经济从业者。阿里研究院预测，到2036年，零工经济从业者将达到4亿人，约占劳动力总数的一半。这些数字表明，传统的、稳定的雇佣关系正在被非正式、灵活的用工形式所取代。

所谓“零工经济”，是指以数字平台为中介，将大量临时性、任务化的劳动需求与分散的劳动者进行匹配的一种经济形态。它的典型特征是劳动关系被包装成“独立承包”或“经济契约”，劳动者通常以个体经营者的身份出现，自备生产工具，自行承担运营成本与风险，接单计酬而非领取固定工资。表面上，这种模式赋予劳动者高度的时间与任务选择自由，例如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人员、自由撰稿人、线上翻译、软件外包开发者等，都可以在平台上自主接单，似乎摆脱了传统雇佣关系的束缚。

然而，从本质上看，**零工经济并未消除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平台通过算法和数据体系对劳动过程进行精细化管理：任务分配、价格设定、绩效考核、客户评价等环节都由平台规则主导，劳动者的工作节奏、空间路线甚至劳动强度都受到隐性或显性的约束。这种“去中心化”表象下的高度集中化控制，使得劳动者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个体，在实质上却处于平台的管理与监督之下。**与传统雇佣关系相比，零工经济的核心变化在于资本规避了法律赋予雇主的义务，如社会保险、带薪休假、最低工资保障、工伤赔偿等。这些成本被转嫁给劳动者**——无论是设备损耗、交通事故，还是需求波动导致的收入不稳定。平台则通过削弱劳动者的集体谈判能力，将劳动关系碎片化、个体化，从而在法律上模糊雇佣与承包的界限。

因此，零工经济不仅是一种技术驱动的新型劳动组织方式，更是**资本在数字化条件下对劳动关系的再塑造**。它利用平台和算法，将传统雇佣关系的部分责任外包化、隐形化，在维持甚至强化剥削机制的同时，披上了灵活就业与自主创业的外衣。这种模式的扩张，对劳动法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劳动者的集体权益提出了新的挑战。

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因行业和所有制性质而异。高薪行业集中在信息传输、软件、

金融等领域，而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远高于私营单位。许多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和零工经济从业者，面临着工作不稳定、超时工作和劳动权益缺乏保障的问题。中国就业市场的突出特征是“新就业形态”的迅速发展，这与传统的劳动合同制用工模式有所不同，许多工人不再与单一雇主建立明确的劳动关系，而是通过民事合作或平台协议工作，这使得他们很难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尽管国家承认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但户籍制度等结构性障碍依然存在，使得他们的“无产阶级化”进程“遥遥无期”，他们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却为资本提供了廉价、灵活的劳动力队伍。建筑业工程的层层外包使得企业可以轻易推卸责任，不发工资都是家常便饭，这加剧了农民工讨薪的困难。零工经济从业者，如外卖骑手，面临着高强度工作和低水平保障的困境，其养老和医疗保险等劳动权益亟待解决。



以下的具体例子：2008年，重庆一建筑工地因层层外包导致工资长期被拖欠，200多名农民工多次讨薪无果，最终集体到市政府请愿，涉事总包方以“分包责任”推脱，案件经媒体曝光才部分结清；2009年，北京首批外卖配送员因与第三方外包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无法认定工伤，社保与医疗费用均需自付；2020年11月，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恒大半岛天境项目中被投诉拖欠27名农民工工资，总计43.96万元。当地人社局向该公司下达了限期整改指令书；2022年，工程承包方柴某某恶意拖欠587名农民工工资共计1015万余元，引发群体性上访。尽管当地人社局下达了整改指令书，但柴某某关闭手机、更换住处以逃避支付。最终，他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9年底，一名外卖骑手邵新银在送餐途中遭遇严重车祸，但在申请工伤待遇时却遇到了难题。因为与他相关的公司包括平台在内有多家，劳动关系难以认

定，他甚至自己都不清楚自己与这些公司的复杂关系。尽管邵新银最初在劳动仲裁中胜诉，确认了与物流公司的劳动关系，但该物流公司又在重庆提起诉讼，导致他屡屡败诉，最终只能以调解结案。这种案例表明，平台利用“合作关系”或“个体工商户”模式，有效规避了劳动法的约束，使得骑手在面临工伤等问题时，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这种由就业结构变化所塑造的庞大而分化的工人阶级，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所推动的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后者为源源不断的“农民工”供给奠定了制度基础。自2001年以来，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政策的核心转向了“三权分置”，即将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进行分离。这一制度创新为资本下乡提供了法律基础。通过土地流转，土地经营权可以集中到“种田能手”手中，发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三权分置”的实质是农村土地的资本化和商品化。尽管官方叙事将此定义为解放生产力，但其深层逻辑是让农业生产从“小农经济”彻底转型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单元。为了实现这一转型，土地制度改革不仅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方式，也重塑了农村的社会结构。这一进程必然导致农村内部的阶级分化：**一部分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成为新的农业资本家或租地的资本主义地主**，他们可以利用规模经济和现代化技术获取超额利润；**而另一部分农民则彻底沦为失地农民，他们或是通过出卖劳动力成为农村雇佣工人，或是被迫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后备军，即所谓“农民工”**。由此，城乡二元结构下原本集中在城乡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农村内部也得到了“翻版”。

然而，阶级分化的加剧并未在官方统计中直接体现。尽管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有所下降，但这种相对差距的缩小掩盖了绝对差距的持续扩大。**早在2001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8，进入“绝对不平均”区间，且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是最大的组成部分。根据数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010年进一步扩大到3.2:1。这一“城市二元结构”不仅存在于收入层面，还加剧了社会裂痕，使得弱势群体面临住房难、融入难的困境。为了缓解这种矛盾，政府颁布了“公共住房政策”，旨在通过提供基本的居住保障，将农民工这一关键劳动力群体固定在城市。这样做既确保了城市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又通过金融服务体系支持保障房建设，将一部分社会剩余转移至城市底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冲突。

不过，这种缓和并未触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事实上，“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市中的资本可以长期以低于劳动力再生产实际成本的价格获得劳动力，而农村户籍制度则确保了城市资本无须承担农民工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完全成本，这些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嫁给了农村家庭。由此可见，**中国的一系列“扶贫”和“乡村振兴”政策，并非旨在从根本上消灭城乡鸿沟，而是为了管理这一鸿沟带来的社会风险**，确保农业和农村能持续为城市资本提供“新质劳动力”和广阔市场。这再次证明，中国波拿巴主义政权“扶贫”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秩序，而不是什么“为人民服务”。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逻辑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发展路径紧密相连。

2001年入世后，大量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分工、成为“世界工厂”的核心优势。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其规模依然庞大，并在新世纪伊始呈现出显著的代际变化。新一代“农民工”，通常指80后或90后，与父辈不同，他们的家庭经济负担相对较轻，因此流动更多地是为了满足个人消费和生活需求，例如通过手机社交和娱乐来构建新的社会关系，而非仅仅为了糊口谋生。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在这一时期发生深刻变化：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农村年轻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开始减少，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通常为15—64岁）占比高、抚养比低的时期，社会生产力和储蓄率因此提升，经济增长受到推动。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正处于这一阶段，充足且廉价的年轻劳动力为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进入21世纪后，这一红利逐渐消退，新增劳动力规模缩小，人口结构开始向老龄化倾斜。这意味着，即便在劳动力总量仍显庞大的阶段，新增劳动力的来源已不如以往充足，导致了结构性短缺与代际观念转变交织在一起。这种代际变化不仅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也为后续的劳资矛盾积累了新的社会条件。

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市场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工人阶级的抗争行动愈发频繁。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的背景下，劳动力供给趋紧与资本逐利逻辑叠加，使得资本对现有劳动者的压榨强度进一步加大，以弥补劳动力供给趋紧带来的成本压力，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工人集体行动的频率和烈度。这种数据的爆发式增长，不仅驳斥了任何关于中国社会“和谐”的静态描述，也证明了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必然性。面对持续恶化的劳动条件（例如随意体罚、超时工作等）和对工人权利的侵犯，以及官方工会未能成为独立的工人利益代表的现实，导致工人不得不通过大量自发的集体行动来维护自身权益。2012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透露，每年因社会矛盾引发的集体抗争事件可能高达数万甚至十余万起。然而，该报告并未详细列出具体事件，且此后不再有类似的公开发布，这本身就进一步印证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会列举些具体例子：2004年，东莞一台资鞋厂因长期超时工作、克扣加班费引发数千人罢工，工人封锁厂门要求补发工资并改善宿舍条件，警方介入后资方同意部分诉求；2005年，深圳宝安一家电子厂女工因被管理层辱骂、拖欠工资集体停工，堵厂门抗议，最终迫使资方补发工资并承诺改善管理；2006年，佛山南海一家制衣厂因单方面降薪引发数百人罢工，工人集体上街游行，要求恢复原工资标准并支付加班费；2007年，东莞长安镇一家港资玩具厂因苛刻管理和无偿加班爆发罢工，工人占据厂区两天，资方被迫签署改善劳动条件的协议；2008年，深圳龙岗一家电子厂因工伤赔偿纠纷引发全厂停工，工人要求依法赔偿并改善安全措施，最终获得部分赔偿；2010年，佛山本田零部件厂爆发大规模罢工，年轻工人要求加薪并改善晋升制度，罢工持续两周，最终加薪约35%；2014年，广东省东莞裕元鞋厂爆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大概4万工人因社保与公积金被少缴集体罢工两周，最终迫使资方补缴并提高待遇；2016年，沃尔玛中国推行“综合工时制”削减加班费，引发全国多地门店员工集体请愿、罢工，并利用社交媒体协调行动，部分门店暂停新制度；2020年，广州一外卖骑手因平台压低单价、延迟结算，组织数百骑手罢工停接单，要求提高单价并改善配送算法，部分诉求获回应；2023年，恒大、碧桂园等房企资金链断裂，建筑业欠薪事件激增，

945 起农民工讨薪抗争遍及全国，多地工地停工工人堵路维权；2025 年 2 月，江苏张家港东洋轮胎数百工人罢工，抗议公司股权转让逃避赔偿责任，要求在转让同时支付合理补偿，行动持续多日。

显而易见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人阶级就可以通过大规模罢工、示威、骚乱甚至局部起义，展示了其足以瘫痪资产阶级正常统治秩序、威胁其根本利益的力量。被统治阶级的不断的斗争能够持续严重冲击经济、动摇政治稳定，这也显著提高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成本，损害其利润和投资环境。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机器的角色显得尤为关键。面对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家既不能完全站在资本一边，因为那将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也不能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因为那将挑战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它选择了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通过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行政法规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工具，国家试图将工人的自发反抗纳入其管理框架内，以实现“维稳”这一核心政治任务。这种做法并非真正的阶级妥协，而是一种“高压调控”，其核心目的是在不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管理和压制阶级矛盾。这一行为与波拿巴主义政权“用一个阶级制衡另一个阶级”的特征完全吻合，它将合法性建立在对社会冲突的强力管理之上，而非对矛盾的根本解决。

与此同时，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全球化与国内市场化改革的双重推动下迅速壮大。他们集中于教育、科研、传媒、金融、IT、设计、法律、医疗等领域，是**经济改革和增长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然而，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心态并非偶然，而是由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双重地位所决定：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房产、股票、小企业等资本的潜在或现实所有者。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在经济与政治立场上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特征。

一方面，小资产阶级享受着较高的收入与生活水平，能够在消费、教育、旅游等方面获得比工人阶级更大的自由度；另一方面，他们又面临着经济下行、失业风险、房产贬值、股市波动以及生活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尤其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2015 年股灾、2020 年疫情冲击、2021 年房地产调控与恒大危机等节点，这种脆弱性被反复暴露。大量“中产”家庭的财富高度依赖单一住房资产，一旦房价下跌或流动性枯竭，其“财产所有者”的身份便瞬间失色，**焦虑感与不安全感急剧上升**。

这种经济结构上的脆弱性，决定了他们的政治诉求更多是防御性的——**保护既有生活方式与财产安全——而非进攻性的社会改造**。他们对贫富差距、官员腐败、行政垄断等现象有明显不满，对政府信任度较低，并倾向于追求“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但这种自由主义倾向并非源于系统的民主革命纲领，而是出于对个人“私域”的保护。正因如此，他们的政治行动往往是零散的、个体化的，而非有组织的集体斗争。

历史经验表明，这种阶级结构与心态决定了他们无法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导力量，更不可能承担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角色。在 19 世纪的法国，类似的城市小业主、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群体在 1848 年革命中曾短暂与工人阶级并肩反对王

权与贵族，但在波拿巴主义崛起后迅速转向依附拿破仑政府，以换取秩序与市场稳定。20 世纪的拉美国家（如智利 1973 年、阿根廷 1976 年）同样证明，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中，往往宁可支持军政府或威权政权，也不愿冒险推动彻底的民主化与社会化改革。



在中国，自由派寄希望于这一阶层推动“和平演变”或“渐进民主化”，但这种设想忽视了两个根本条件：第一，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与中国资本主义体制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他们的职业晋升、资产保值乃至子女教育机会，都依赖于现有体制的资源分配与秩序维持；第二，中国的国家机器在经济、舆论、治安、军队等方面的集中控制力，远超 19 世纪欧洲的任何波拿巴主义政权。这意味着，即便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也极易被分化、收编或镇压。

1989 年“六四”运动中，自由派以学生与知识分子为核心，提出反腐与政治改革诉求，但其目标多停留在体制内“分权”——限制最高权力、扩大言论空间——而非推翻中国官僚专制的制度，更无相应的民主纲领。工人阶级虽有自发参与，却未被纳入统一的政治计划；小资产阶级因经济脆弱与政治分散，在危机中倾向秩序而非革命。自由派在镇压中失去体制内外支点，大批骨干被捕、流亡，部分温和派则被国家收编，进入学界、媒体、智库等体系，在有限空间内为官方改革话语背书，丧失独立政治性。与此同时，经济高速增长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绑定，使潜在支持者趋向保守。进入 21 世纪，互联网审查与维稳体系切断了全国性动员的可能，自由派被迫退入分散的小圈子、读书会、公益团体或线上匿名社群，形成原子化反抗格局。这些小组虽持续批评政府，但缺乏跨地区、跨阶层的组织能力，政治纲领多停留在宪政或“分权”诉求，**难以撼动波拿巴主义政权**。由此，其失败不仅源于阶级结构的制约，更在于被收编与分化后的长期弱化。

因此，**中国不可能沿着西方式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前进**。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充其量是零星的“小吵小闹”，最终会在对稳定与秩序的依赖中回归沉默，从而进一步巩固波拿巴主义国家机器的统治。**真正能够打破这一格局的，只能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以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目标的有组织革命力量**，而这恰恰是自由派所无法也不愿承担的历史任务。

(6) 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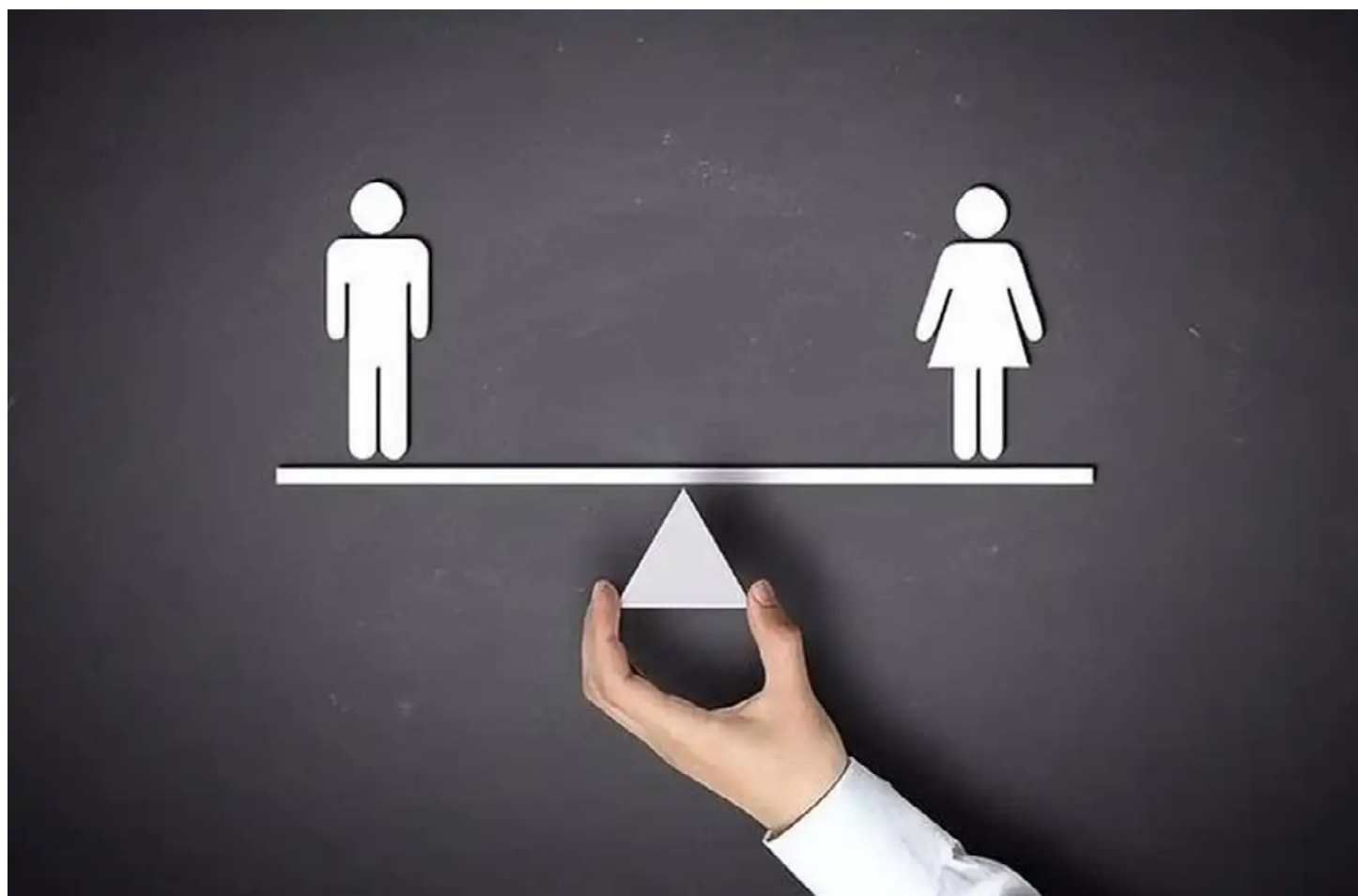
中国的社会矛盾，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复杂，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矛盾是通过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体现的。中国的波拿巴主义政权，正是为了在这一根本矛盾之间，寻求一种不稳定的、高压的平衡。所有其他的社会矛盾，包括民族矛盾、性别矛盾和环境危机等，都是这一**根本矛盾在不同社会领域内的具体体现**。

中国的民族矛盾并非如官方叙事所言，仅仅是发展不平衡或历史遗留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民族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固有产物**，国家机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扶持”，本质上是资本扩张的需要——获取资源、稳定边境、整合劳动力市场。中国国家在民族问题上扮演的“仲裁者”角色，既能压制民族分离主义，又能通过经济整合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从而维系其统治的稳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其导火索是广东省韶关市一家工厂内维吾尔族工人与汉族工人因谣言引发的群体斗殴，导致两名维吾尔族工人死亡。这一事件最终在乌鲁木齐演变为大规模的骚乱。这表明，民族矛盾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跨区域的劳务流动、资本的逐利本能以及地方政府在处理劳资和族群矛盾时的无能或偏袒紧密相连。

此外，自2001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然而，这一进程并未带来普遍的共同繁荣，反而加剧了阶级和民族分化。大量涌入的汉族移民主要从事现代工商业和高薪职位，而本地藏族居民则被边缘化，其传统手工业和商业被挤垮。研究显示，虽然地区经济增速提高，但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按族群划分的。在当地人看来，经济增长只惠及了汉族，而他们成为了被剥削的牺牲品。这种因资本主义下的地区发展不均衡而产生的经济剥夺感，为达赖集团等分离主义势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他们将这种阶级矛盾包装成民族冲突和宗教对抗，从而尝试维护其旧有的统治和特权。这种将经济剥削引向民族主义的叙事，正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体现。

在台湾，其“台独”思潮的兴起也与社会内部的经济矛盾息息相关。进入21世纪，台湾经济转型困难，发展缓慢，贫富分化加剧，青年世代的失业率升高，导致他们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这种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焦虑，成为了他们参与社会运动和支持独立思潮的内在动力。**台独势力，正是利用了这种因资本主义发展停滞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将民众的愤怒引向“去中国化”、“大陆共产极权威胁台湾”的民族主义叙事，以掩盖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阶级矛盾**。此外，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台湾当局推行的“民主化”并未带来真正的社会公平，反而伴生了“黑金政治”等大量弊端，这进一步证明了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所谓的“民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可能加剧权钱交易，使得民众对体制更加失望。

自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职场性别歧视加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0年中国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为73%，但到2018年已降至61%左右。女性平均花在家庭照顾上的时间是男性的三倍，且法定退休年龄不平等。这种现象并非文化观念的倒退，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性别领域内的具体体现。**资本需要一个灵活、低成本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如育儿、家务）转移到家庭和女性身上，从而实现了“无偿”的劳动力再生产。**例如，许多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在招聘时明确表示不想雇佣女性，而国家在此过程中，并未提供足够的社会福利，客观上巩固了这种不平等的性别分工，从而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长期需要。



中国所谓的“妈妈岗”正是这一逻辑的现实化表现。它以“照顾母亲就业”为名，面向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女性提供弹性、低薪、低保障岗位（多集中在家政、客服、缝纫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女性的就业困境，但同时固化了“育儿 = 母亲责任”的刻板印象，并为企业规避正式雇佣与福利责任提供了制度化通道。以湖北为例，2025年人社厅等部门面向抚养12岁以下子女女性，提供所谓“弹性”岗位，时薪普遍低于常规岗位且多无社保。这种模式在“照顾母亲”的名义下，将女性锁定于低薪、低保障的就业区间。实质上，它既为企业提供廉价、灵活劳动力，又使国家在不增加公共化育儿投入的情况下，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继续转嫁给家庭与女性，从而再生产资本主义性别压迫的制度基础。

在网络空间，上述矛盾常被极端化的女权主义话语所利用，将这些资本主义的固有

问题简化为“男性压迫女性”的叙事，煽动性别对立。据共青团中央微博报道，部分所谓“女权”账号通过夸张渲染、攻击男性群体获取流量，甚至与境外团体的舆论操作相呼应，制造社会撕裂。这类思潮与经典女权追求的性别平等的初衷不同，它更接近一种**网络亚文化的极端化变种，其结果是污名化平权议题、压缩理性讨论空间，并在婚恋、生育等领域加剧恐婚恐育情绪**。中国国家与资本在此过程中，并不打算未根治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根源，因为实际上他们可借助舆论场的性别对立转移阶级矛盾，实现社会控制与稳定预期，从而使性别矛盾成为治理工具而非平等契机，**利用这种情绪分化工人阶级，削弱跨性别的阶级联合**。此外，我们需要意识到，多数中国女性，尤其是处于制造业、服务业等基层岗位的劳动女性，并没有条件在公共舆论场上持续、系统地表达自身的真实诉求。根据《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与麦肯锡中国职场性别平等报告的数据，女性在高层管理岗位的比例不足20%，在媒体、政策咨询等具有舆论影响力的领域更是显著缺席，这意味着她们的声音在社会议题中被结构性边缘化。**网络上流行的极端女权言论，往往来自少数活跃于社交媒体的群体，并不能代表广大劳动女性的立场与需求。**

中国现实中存在大量男性工人与女性工人并肩对抗资本剥削的案例。例如，2010年本田南海零部件厂罢工中，男女工人共同停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女性工人在谈判代表和罢工组织中占据重要席位；2018年深圳佳士科技建会事件中，男女工人联合发起成立工会的诉求，反对企业长期超时加班、低薪和打压工人代表的行为，女性工人不仅参与罢工、集会，还承担了对外发声、记录现场、联系声援团体等重要工作。这些斗争表明，**在中国工人运动中，性别并不是工人阶级团结的障碍，反而在共同的阶级利益驱动下，男女工人能够形成稳固的合作关系，共同对抗资产阶级的剥削。**

另外，在现实性别矛盾中，还存在部分女性利用法律漏洞诬告男性强奸的现象，这不仅伤害个体，更被舆论操弄为挑动性别对立的素材。近年来多起案件显示，诬告往往出于情感报复、经济纠纷等动机，例如浙江云和县兰某某为分手构陷男友强奸，幸遇检察官介入才得以昭雪；也有案件中，虚假指控几乎仅凭口供就让男性长期羁押，最终证据不足撤案。由于我国诬告陷害罪举证门槛高、量刑轻，诬告成本远低于男性一旦定罪的刑罚，这种不对称加剧了男性群体的不安全感。在网络空间，极端女权话语往往将此类个案与真实性侵混为一谈，既掩盖了制度漏洞，又借机煽动“男女天然对立”的情绪，从而转移公众对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性压迫的关注。

性别议题中另一个被网络极端化话语频繁利用的领域是高价彩礼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高价彩礼在全国范围内并非普遍现象。根据民政部《2025年全国婚俗改革进展报告》及多地婚俗改革试点数据，2001年至2007年，全国彩礼中位数长期维持在1万至2万元之间，主要发挥礼仪与家庭经济能力识别等传统功能，并未出现大规模异化现象。2008年以后，受出生性别比失衡与县域城镇化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部分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如福建莆田、江西赣州、河南商丘等）彩礼价格快速攀升，中位数可达20万至65万元，但在长三角核心城市、珠三角、成渝等地，低彩礼甚至零彩礼的比例持续上升。彩礼议题真正进入全国舆论高热是在2015年前后，彼时多起“天价彩礼”新闻集中曝光，叠加短视频与社交媒体的传播效应，使公众形成了彩礼高额化的“全国性印象”，但这一印象忽略了其明显的**区域性与结构性特征**，高价彩礼主要集中在部分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并非全国普遍现象。

例如，江西赣北部分乡村彩礼达 28.8 万元，福建个别县甚至超过百万元，而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及部分沿海发达农村，仍然普遍存在低彩礼甚至零彩礼的婚俗，如江苏昆山、浙江温州部分家庭仅象征性收取 1 万元以内礼金。

因此，从共产主义者的立场看，**彩礼无论金额高低，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和财产转移基础上的旧婚姻遗存，本质上将婚姻关系物化为经济交换。高价彩礼的存在不仅与婚姻自由和平等原则相冲突，还在客观上加重了青年群体的经济负担，延缓甚至阻碍了婚姻与生育意愿的实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高价彩礼还可能被利用为资本积累和地方经济利益的间接工具，通过婚姻市场的商品化加剧城乡、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共产主义者主张应提供扩大公共住房、教育、医疗等廉价乃至免费的社会保障供给，削弱婚姻的经济依附功能，从而为彻底废除彩礼制度创造物质条件与社会基础。

在此前对性别矛盾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性别压迫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阶级结构、制度逻辑深度交织。**女性在家庭与职场中所承受的双重负担，既是父权制的延续，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体现。同样的逻辑也贯穿于教育制度之中——它不仅塑造性别角色、再生产性别不平等，还通过制度化的竞争与筛选机制，将这种不平等固化为代际传递的社会结构。

教育方面，中国的义务教育本应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但在中国的应试体制下，它逐渐异化为一条“分数生产线”。据《中国青年报》2023 年报道，部分重点中学将升学率作为唯一考核指标，教师绩效与学生成绩直接挂钩，课堂教学围绕考试技巧展开，而批判性思维、创造力等能力被忽视。这种异化源于教育资源分配与社会阶级再生产的紧密绑定——高分意味着进入优质高中、名牌大学，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资本。**教育不再是全面发展人的过程，而是被量化、排名、交易的人力资本。**

在这种制度压力下，家庭成为教育竞争的前线阵地。父母往往以“为你好”为名，将制度性的焦虑转化为对子女的高压管理。据《澎湃新闻》2024 年调查，超过六成中小学生每天课外作业时间超过两小时，部分家庭还额外安排多门校外培训。家长在作业、考试、兴趣选择上拥有绝对话语权，甚至限制孩子的社交与休闲时间。这种家庭专制并非单纯的文化传统，而是制度压力的家庭化表现。教育的异化将成绩变为家庭荣誉与未来保障的唯一指标，家长在这种逻辑下成为制度的执行者与放大器。

学生身份本应是阶段性的学习角色，但在中国，它往往外溢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长期的标签。在校期间，成绩排名、奖惩记录会影响奖学金、推优入党等机会；毕业后，名校背景仍是招聘、晋升的重要门槛。2023 年 BOSS 直聘数据显示，超过七成企业在招聘应届生时明确要求“985/211”背景。这种外溢效应意味着教育评价体系的影响远超校园，学生身份被固化为社会分层的依据，延续了教育异化的逻辑——人被简化为可比较的分数与文凭。

在应试与家庭压力之外，针对青少年网络游戏的社会反应也折射出教育与管教方式的极端化。在应试与家庭压力之外，出现了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现象。研究表明，

这是一种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当社会化方式的转型滞后于社会变迁时，青少年更可能转向虚拟世界寻求心理满足；游戏的即时反馈与变比率奖励机制带来快速成就感，线上社交团体提供归属与认同，在学业与人际压力无法短期缓解时，游戏成为可即刻获得的替代性满足。**对于处于身份建构期、渴望控制感与认可的青少年来说，这些机制叠加显著提升了使用时长与复归动机。家庭层面的专制养育与网络成瘾呈显著相关：当家长强调服从与控制、忽视情感沟通与自主性需求时，青少年更倾向在虚拟环境中获得情绪调节与自我效能的替代路径，这与教育压力下的家庭专制相互强化，形成从现实退避到线上投入的通道。

200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所谓“戒网瘾学校”，以军事化管理、封闭训练为主要手段，部分机构甚至被媒体曝光存在体罚、禁闭、剥夺睡眠等行为。2017年《新京报》报道的山东临沂杨永信案例中，电击疗法曾被用于“治疗”网瘾，引发广泛争议。尽管教育部和民政部多次整顿，这类机构仍在部分地区以“特训学校”或“心理辅导中心”的名义存在，其背后是家长在制度与舆论压力下，将孩子送入高压环境以“矫正”的无奈选择。

与此同时，一些家长自发组织了“反游戏同盟”或“反网游联盟”，试图通过集体行动推动政策限制网络游戏。据腾讯新闻2023年报道，一个由上百名家长组成的“中华反毒游爱国群”活跃在短视频平台和线下街头，成员身穿红色T恤、手持标语，在二十多个城市高喊“网络游戏，祸国殃民，精神鸦片”。他们的行动缘于对孩子沉迷游戏的恐惧与无力感，但这种运动也引发了青少年“护游联盟”的反击——由13至16岁的玩家组成，指责家长混淆游戏类型、污名化整个媒介。这种围绕游戏的社会冲突，实质上反映了**教育体系、家庭权威与青少年文化之间的矛盾**。

除此之外，中国的义务教育还存在大量**隐性收费**，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据《新华每日电讯》2024年报道，部分地区学校要求家长在指定商店购买校服、课本、文具，价格普遍高于市场价；有的学校收取“资料费”“活动费”，名义上自愿，实则强制。在义务教育普及前，家庭教育支出主要集中在学费和基本教材费；如今虽然学费免除，但额外收费总额反而更高。2023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调研显示，部分城市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年均教育支出超过一万元，其中超过一半为学校或相关渠道指定的购买项目。这种收费机制与教育异化、家庭专制、学生身份外溢以及围绕游戏的社会冲突形成闭环——学校通过隐性收费**将教育商品化，家庭在竞争与焦虑中被迫接受，学生则在制度、市场与文化斗争的多重逻辑下被塑造成“投资回报”的载体。**

这种结构性循环将教育从公共事业转化为竞争性投资，将家庭变为制度压力的中转站，**将学生身份固化为社会分层的工具，并在文化冲突中不断再生产。**如果不同时改革教育评价体系、限制隐性收费、规范戒网瘾机构、并在社会层面削弱学历与分数的决定性作用，所谓“义务教育”将继续在形式上免费、实质上昂贵。

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市场的萎缩，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的加剧，中国社会正面临新的结构性危机。**大规模的环境破坏、污染以及官僚的不负责任并非偶然，而是资本无限积累的必然结果。资本的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和对环境的破坏。**资本主义下以竞争为核心、以量化指

标为唯一标准的思维方式，同样支配着经济增长、资源利用和城市扩张。在这种模式下，自然环境被当作可无限开采的“资本”。例如，2005年的吉林石化公司爆炸，导致大量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引发哈尔滨市大规模停水。2007年，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使得无锡市民的饮用水受到严重威胁，其根源是沿岸工业污染和水产养殖造成的富营养化。在这些事件中，虽然波拿巴主义政权在口头上强调环保，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在实际运作中，其核心任务仍然是维护经济增长，从而维系其合法性。这种内在的矛盾，使得解决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例如，当民众因环境问题走上街头，政府的应对策略往往是紧急停止项目，如2007年厦门的PX项目和2012年什邡的钼铜项目，但这种“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模式，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资本逐利的生产方式，只是将矛盾转移或暂时压制。

所有这些矛盾，无论是民族的、性别的、教育的、还是生态环境的，都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根本矛盾在不同社会领域内的具体表现。**波拿巴主义政权试图通过其强大的国家机器来“仲裁”和管理这些矛盾，但它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矛盾，因为它的合法性恰恰依赖于这种充满了矛盾的经济体系。**因此，这种不稳定的平衡注定是暂时的，它终将被这些日益激化且无法解决的矛盾所打破。

(7) 我们能用市场经济过渡进入共产主义吗？

中国共产党以为，市场经济就像一把工具，谁拿在手里都能用——资本家用它赚钱，工人阶级也可以用它发展生产力，然后再慢慢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想法听起来很灵活，但问题在于，**市场并不是一把中性的扳手，而是一整套特定的生产关系。**

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形式上分离，要求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存在，要求生产单位之间通过竞争和价格信号来调节生产，要求一切劳动成果都必须先变成商品才能进入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这意味着，**只要市场是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价值规律和利润驱动就会继续支配生产，劳动依然是被抽象化、被量化的“价值生产”，而不是直接的社会化劳动。**计划经济的前提则是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即多数生产资料不能以商品的形式存在，其调节机制不是价格的涨落，而是对社会总劳动的有意识分配与协调。**市场和计划的差别，不是“用哪种方法分配资源”的技术问题，而是“社会是按什么关系来组织生产”的根本问题。**换句话说，市场的存在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计划的存在则是这种关系的否定与超越。

在现代大工业条件下，这种差别不仅是理论上的，而是直接体现在生产的物质要求中。今天的生产早已不是几个手工业者各干各的，而是全球范围内的精密协作网络。纺织厂的化纤原料必须在准确的时间送到，汽车装配线需要上千种零部件按节拍进入工位，智能手机的芯片供应一旦延误，就可能让整个产业链停摆。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就像一支交响乐团——每个演奏者再厉害，如果各自按不同的乐谱和节奏演奏，结果只能是混乱。市场的价格信号在这种条件下，就像用烟雾传递战场指令——在简单的手工业时代或许还能凑合，但在今天这种复杂度下，它的反应速度和精确度都远远不够。计划性的协调，不是什么“幻想”，而是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或“混合经济”试图在市场逻辑和社会主义目标之间找到

平衡，但这在结构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市场的逻辑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满足社会需要**；它要求生产单位之间相互竞争，而不是协作；它通过价格信号调节生产，而不是通过社会整体的有意识协调。当这种逻辑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计划性的部分会被边缘化，最终沦为市场的附庸。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这种情况：一开始保留市场是为了“灵活”，但随着市场领域的扩大，利润指标逐渐取代社会指标，国有企业被迫像私企一样追逐利润，社会福利和公共投资被压缩，最终整个经济结构重新向资本主义倾斜。（是不是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很像？）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也是一个典型例子。表面上，企业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工人可以参与决策；实际上，由于企业必须在市场上竞争、以利润为目标，工人越来越依赖那些能帮助企业盈利的专家和经理。这种依赖逐渐**削弱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实际权力**——因为在利润驱动下，决策的核心变成了如何在市场中取胜，而不是如何满足社会需要。只要价值规律依然起作用，亏损的工厂就会被迫关闭，工人在经济范畴上就没有真正的决策权。另一方面，如果工人真的能有效防止就业波动、保障所有人的工作，那么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通过竞争淘汰落后企业——就无法运转，这时所谓的“市场”也就不复存在。南斯拉夫的经验表明，**在市场逻辑下，“工人自治”很容易沦为空壳，工人名义上是主人，实际上却受制于利润和市场的无形压力。**

这种现象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早就揭示过：在古代的等级制社会，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这是一种与个人身份不可分割的品质（即等级）。而**到了资产阶级社会，个人的社会地位似乎变得偶然了**——人们可以通过竞争改变自己的处境，看起来更自由了。但实际上，他们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市场经济下的“自由”，正是这种被物化的力量所塑造的假象：你可以选择竞争的方式，却不能选择是否参与竞争；你可以决定如何追逐利润，却不能决定生产的目的是否是利润本身。

这种现象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分配机制，它会塑造社会的阶级关系**。只要商品生产存在，就必然存在价值规律的支配，必然存在按货币收入差异化的社会分层。即便生产资料形式上是公有的，如果它们在经济运行中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价值，就会在实际操作中形成“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分裂，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会重新出现，甚至演变成新的剥削关系。这种趋势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压力下会被放大——国际市场会用价格、投资、技术依赖等手段，把

“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吸附到资本主义的全球价值链中，使它在竞争中不得不优先考虑利润和出口创汇，而不是国内的社会需要。

即便是所谓能够实现“让市场和计划并存”“互相补充”的“混合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种并存状态本身是不稳定的。市场和计划的调节机制是互相排斥的：市场要求分散决策、利润驱动，计划要求集中协调、社会目标优先。它们在同一经济体内长期共存，就像一辆车同时踩油门和刹车——短期内可能还能前进，但长期必然导致系统性扭曲：要么市场逻辑吞噬计划逻辑，要么计划逻辑压制市场逻辑。历史经验表明，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包围下，前一种结果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市场逻辑更容易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接轨从而复辟资本主义，而计划逻辑需要以世界革命的国际生产协作才能稳固。

很多人把过去一些工人国家的失败，简单归结为“计划经济不行”“单一公有制不行”，但事实远比这复杂。那些失败发生在极端不利的国际环境和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工人国家为了生存，不得不在某些领域依赖市场，这才为资本主义复辟留下了通道。所谓计划“不灵活”，其实是官僚集团在孤立和物质匮乏中，用专制方式把自己的偏好强加给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必然专制低效——在生产力足够、国际革命推进、工人民主健全的条件下，计划完全可以以民主形式运行，把社会化生产的潜力发挥到极致。

严重的比例失调和浪费，并不是计划逻辑本身的必然产物。按比例发展经济的原则，本质上与这些问题格格不入。苏联的计划虽然片面，但它的合理内核毋庸置疑——否则无法解释一个原本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如何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跃升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并留下大量至今仍被美日工厂使用的专利。把这一切简单说成“浪费”，显然站不住脚。

是的，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经济计算永远不可能完全精准，因为消费者行为、技术更替、生产剩余、经济形势、阶级斗争、信贷条件等因素都在不断变化。然而，哈耶克也承认，大规模生产的社会必然需要计划。和“不灵活的计划经济”区别在于，**工人民主制国家下的计划不是由少数人拍脑袋决定**，而是由银行、企业职员联合会、工人联合会和工人政府自下而上制定。现代技术可以让工人国家实时监测需求变化，比如交通客流、教育选择等，并据此调整投入产出，优先发展应对气候灾难的生态产业或社会化家务劳动等关键领域。

这样的计划体系**不是单一中心的命令，而是多个计划中心协作形成统一方向，所有企业联合成一个整体**。成千上万劳动者参与各层级的计划制定，选择最合适的计划类型。技术革新时，工人通过培训转岗而不是被抛入失业大军，并可按意愿调换岗位。不同产业的集中化程度也会因特性而异——公共交通、钢铁、矿业可以高度集中，食品、衣物等消费品则更分散。没有生产者与使用者的持续反馈，再先进的大数据算法也无效；而一些因公共服务属性需维持的低效企业，将获得无条件补贴以保障运作和低价。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市场机制仍会存在。工人民主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稳定的货币和消费品价格体系（不含免费提供的产品），在供求规律的校正下尽量准确计算成本。这与普遍化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重大稀缺资源的配置——假如某种资源占总量的50%甚至75%，它的用途将由广

大群众民主决定，而不是交给市场的任意波动。这才是计划经济在民主条件下的真正力量，也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现实道路。

(8) 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结合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软弱、碎片化，而且缺乏独立的阶级政党和政治纲领。他们早已通过与官僚集团的利益结合，成为实际上的统治阶级。这一阶级并非被压迫者，而是依附于波拿巴主义专制政府的统治阶级。他们依赖国家机器来获取稀缺资源、压制工人、化解内部矛盾。这种依附性决定了他们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领导一场推翻现有国家政权的革命。他们的根本利益与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存续高度绑定，一旦政权崩溃，他们将“一无所有”。

同样，中国的自由派力量同样软弱无力，缺乏独立的社会基础与组织能力。他们既无法建立稳定的资产阶级统治，更不可能构建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换言之，**中国不存在一个能够长期维持资本主义民主秩序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因此，中国革命的目标不可能是简单更换统治集团、调整分配比例或引入“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和国家机器的阶级属性。**中国革命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长线。**

从一开始，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显示出与西欧早期工运不同的特征。它并未长期停留在单纯争取工资增长的经济主义阶段，而是很早就将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劳动条件、乃至干预劳动过程本身纳入斗争目标。这些诉求直接触及资本对生产过程的专制权力，客观上削弱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础。波拿巴主义国家机器的运作依赖于资本积累的持续性，而工人阶级在生产领域的反抗不仅阻断了剩余价值的榨取链条，也在主观上促使工人认识到自身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并非抽象理念，而是在一次次罢工、抗议、谈判、冲突中被具体化的社会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缺乏类似西欧那样的强大工会体系和改良主义政党**。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组织上存在不足，但另一方面也使他们不受改良主义官僚层的长期束缚，更有可能在政治危机中放开手脚，直接打击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随着斗争的积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成熟——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并非孤立的个体劳动者，而是一个在生产关系中占据共同位置、拥有共同利益的阶级整体。这种意识的形成，使他们能够超越零散的经济斗争，转向有组织、有战略的政治斗争。

社会性质的改变必须依赖于阶级力量对比的根本转变，而这种转变离不开群众运动的高级形式与更高水平的阶级意识的结合。群众的自发斗争固然能够撼动局部秩序，但只有当这种斗争与政治组织、战略目标相结合时，才能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构成直接挑战。因此，**建设一个先锋队式的、属于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是工人阶级走向自我解放的基本条件**。这样的政党不是外在于群众的行政机构，而是从工人运动内部生长出来的政治组织。它的领导作用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而是通过在思想文化斗争、经济改良斗争与必要的武装斗争中提供战略方向，将这些斗争统一于一条长期的革命道路之中。所谓“持久战”，不只是军事策略，更是建党策略。

在这一战略中，工人阶级先锋队应当坚定不移地支持并参与所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抗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罢工斗争和政治动员（如争回拖欠的工资、提高工资水平、缩短工作时长、男女同工同酬、政治权利在法律上的保障、社保体系的完善、取消就业歧视的法律条文等），同时主动引导这些行动发展为具有明确革命纲领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在此过程中，应着力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工会、工人联合阵线以及由工人政党领导的劳工组织体系，通过多层次的组织网络广泛动员各领域劳动者参与建党工作，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积蓄力量。对于遭受大资产阶级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剥削的自耕农、个体工商户、小资产阶级及自雇劳动者等非剥削阶级群体，先锋队应积极支持其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抗争活动。先锋队应该通过系统的政治教育，帮助这些群体认清其虽表面独立但实质上仍受资产阶级支配的阶级本质，引导其摆脱政治立场的摇摆性，让他们自觉加入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在此过程中，必须建立广泛的、工人阶级占绝对领导地位的革命统一战线，同时深入研究不同社会阶层的特殊诉求，制定针对性策略以争取革命前后可团结的进步力量。同时，先锋队要全力声援学生群体反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压迫的各类抗争行动，通过理论宣传和实践引导将其转化为革命新生力量。有时，先锋队应当建立专门的青年工作机构，并将具有革命觉悟的学生骨干吸纳为正式成员，其余进步学生则纳入外围组织体系，形成多层次、梯队化的青年革命力量培养机制，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持续输送新鲜血液。

由于中国波拿巴主义国家的镇压能力极强，革命政党必须在现代条件下注重城市与乡村的联动，培育群众的政治觉悟与自我组织能力。这不仅是为了在高潮时刻发动总罢工或起义，更是为了在长期的政治拉锯中保持阶级力量的积累与扩张。毛泽东所说的“持久战”，在这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广义的革命策略——它不仅适用于武装斗争的军事层面，也适用于革命党的建设与群众基础的培育。在现代条件下，武装斗争不应被等同于单一路线的农村游击夺权。工人阶级完全可以在城市罢工、总罢工中，通过争取士兵、警察等国家雇员倒戈，或直接袭击警察局、夺取武器，来武装罢工纠察队，乃至建立工人民兵组织。

争取国家职员的可能性在于，他们虽然在形式上属于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但在经济关系上依然是出卖劳动力的受薪劳动者。他们的家庭成员也往往是产业工人和农民，这种社会联系为政治争取提供了可能性。历史经验对此有充分证明：1917年俄国彼得格勒驻军在总罢工与苏维埃影响下倒戈，直接促成了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1980年韩国光州起义中，市民夺取警察局和军械库，短期内建立了自治力量，虽然最终被镇压，但其经验表明，当群众运动与武装力量结合时，即便在短时间内也能打破国家机器的局部控制。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通过渐进的改良来实现根本转变。波拿巴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相互支撑，任何不触动生产关系的改革最终都会被体制吸收或反转。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不仅是推翻现存的统治阶级，更是要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以工人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新国家。这一过程需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长期准备，而不是寄希望于一次偶然的政治危机。**

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斗争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资本主义

的全球化与技术变革使劳动过程更加分散和隐蔽，传统的工厂集中制被打破，工人组织的难度增加；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工人之间的联系、信息传播和舆论动员提供了新的工具。这要求革命政党探索适应新条件的组织形式与斗争策略。例如，在大型国企和跨国公司内部建立秘密的工人网络，在服务业和平台经济中培育跨行业的工人联盟，在城乡结合部推动工人和农民工的共同组织。这些努力的目标，都是为了在未来的政治危机中，使工人阶级能够迅速集中力量，形成对国家机器的实质性挑战。

当然，工人阶级要想在未来的政治危机中集中力量、形成对国家机器的实质性挑战，就不能只把目光局限在国内，因为资本主义早已是全球体系，跨国资本的力量远远超出任何单一国家的范围。**如果工人阶级的斗争只停留在各自为战，就很难对抗这种全球性的对手，而这正是国际主义不可或缺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强调，任何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只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事件。**全球工人阶级必须跨越国界、协同行动**，才能形成足够的力量去推动资本主义的整体瓦解。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类似“共产国际”的工人国际组织，把各国的革命政党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形成统一的政治行动中心。没有这样的国际组织，工人阶级的力量就会被分散，面对跨国资本的进攻时只能被动挨打。

有人担心，不同国家的情况差异很大，如果有一个国际组织，会不会强行套用统一模式，导致教条主义？其实，这种担心混淆了方法论和具体策略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不是提供一套固定的革命步骤，而是提供分析社会矛盾的工具——像显微镜一样帮助我们看清剥削结构和革命主体。真正的本土化，不是抛弃国际联系，而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全球资本主义的规律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健康的工人国际组织并不是输出“标准化革命模板”，而是像一个跨国知识网络：各地根据本地条件独立行动，同时把经验、教训和分析成果共享出来，让其他地方可以参考和改进。这就像分布式计算——每个节点处理本地数据，但共享算法升级，从而提升整体的运算能力。这样的国际协调和地方自主并不冲突。国际组织提供的是“坐标系”，帮助各地革命力量在理解全球资本运动规律的基础上，自主绘制符合本土条件的路线图。这样既能防止外部生搬硬套不适用的模式，也能避免本土斗争陷入零散、短视的经验主义。

至于教条主义，它的根源不是国际组织本身，而是理论僵化、丧失分析资本变化的能力。即便没有国际组织，本土化的斗争也可能变成教条。相反，一个真正活跃的工人国际组织，应该像科学共同体一样，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成败案例，不断检验和修正理论工具，从而保持理论的生命力。所谓“强加完美范式”的指控，其实就像说数学界推广微积分是在强迫所有工程问题用同一种解法一样——完全是误解。

因此，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仅源于对国家性质的理论分析，也源于工人阶级在现实斗争中的历史经验。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只有通过这种长期的、广泛的、综合性的战略，才能完成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权力夺取的飞跃，才能在工人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开辟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不仅改变中国的国家性质，也将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新的经验与启示。**

逝世 49 周年——毛泽东思想评析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49 年前的今天，1976 年 9 月 9 日 0 时 10 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结束了自己辉煌又遗憾的一生。从任何意义上讲，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长达几十年的卓绝斗争和 1949 年中国革命都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留下了仅次于十月革命的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位人物身后的评价当中，有褒有贬，但除了最宗派主义的仇视者外，人们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在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在落后的中国他组织并领导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农民为主力的民主革命，结束了军阀割据，推动土地改革、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为社会进一步变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国有制计划经济创造了决定性的政治前提。此后，革命超出了自己计划的范围，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持续前进，中国工业化大规模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毛泽东和我们曾分析的葛兰西、托洛茨基一样，**有自身的局限性**，这是他在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农业国进行革命时遇到的各种历史上形成的特殊性所导致的，这些问题最终也导致了革命的流产。但哪怕是面对日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列宁在批判普列汉诺夫的路线错误时，对他在理论上的功绩一直肯定，予以保护，并且认为普列汉诺夫的一部名著曾经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著作（主要是批判民粹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仍然是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牢固的成果。这点上我们要学习列宁**就事论事**的批判方法，客观对待历史上每位革命者的遗产。

这一天各个所谓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们又会重复自己每年一次（有时两次，诞辰一次忌日一次）的表演。他们会发出毛泽东同志的大头照“沉重哀悼”，企图用他的光辉来照耀自己羸弱的思想获取认可。哭了不知多少次，也只能是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发泄，个人崇拜的人从被崇拜者身上寻找自己想要的部分，但从来不去真的了解自己的偶像！

我们的言语会十分尖锐，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先有了去**面对现实的勇气**，才有改变自己的可能。对这类同志，我们想引用毛泽东所做的发言：

“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如果只是看，站在那里不动，看你怎么样，你搞得好那也好，你搞得不好该你遭殃。这种态度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不是积极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不但要看，还应该帮。”

这就是我们希望的这篇文章能起到的作用。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重新讨论这位革命者遗产的指导性意义以及局限，他的思想的历史地位以及现实意义。

“毛派不等于毛泽东”

在中共的“走资派”上台以后，仍然对毛泽东时期存有欣赏和仰慕、并以“恢复毛时代”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者们被统称为毛派。他们崇敬毛泽东个人，有时候会把他当作不可质疑的绝对权威，一切革命行动的普遍标准。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有很多这样的声称自己发扬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每天在做的只是重复毛泽东本人在很多时候都被搞得无可奈何的愚昧风气**。他们明显不是用唯物主义的思考方式看待世界和个人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者明白历史进程的推动力是来自阶级力量，而不是一个领袖取代另一个领袖。有不少毛派自称自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分析，却在分析中国为什么会复辟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采取了“英雄史观”。

在很多毛派群体当中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他们把一切与毛泽东思想有异的理论扣上“异端”的帽子，不允许自由讨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做着实际上反对共产主义的行为，“扛着红旗反红旗”。想要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思想，首先就要先打破这些金像树立者对他的扭曲。必须明白：**“毛左”和毛泽东思想并无真正的理论和实践继承，其“最大公约数”只是都口头上承认、崇拜毛泽东**。一个毛左可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可能是乐子人，可能是日子人，可能是机会主义者，可能是恐怖主义者，也可能是改良主义者……篇幅限制，我们就举最普遍的一个例子：所谓“融工”派别们。

他们在发动工人、走向群众方面有相当大的问题。十分普遍的是，这些“行动”不但没有提出清晰的纲领，而只是通过慈善和娱乐休闲活动“拉拢”工人，在非政治化的基础上进行连结。他们沉浸于做向工人派饭等“工益活动”或者在工作场所强行进行古怪的“政治灌输”。这种活动并不是和工人共同向资本家争取待遇上的改良，甚至连改良主义也谈不上，而只是摆姿态向工人表示友好，或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工人之上——反对我，那工人就是反革命分子。在中国极端镇压的环境下，部分左翼误信这是可行的道路。

毛泽东曾提到：

“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他们把“知识分子到劳苦大众里去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片面解读成了“知识分子和底层交朋友就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完全无视其他方面的工作，比如党的建

设、理论的学习、外围群众组织的接触等等，沦为拙劣的模仿。不少毛左青年进行融工，走进血汗工厂期望可以革命化工人甚至发起斗争，要么因为家庭方面生活费的断供、假期的结束，要么就因为自己职业方面的诉求最终潦草结束。

融工往往只是青年个人调研式地走进工厂，沦为一种**穷人生活的体验游戏**，在独裁条件下更难以发起任何政治教育工人的工作，更遑论发起工人斗争。更多的是被血汗工厂虚耗精力，很可能变得意志消沉，有些人就会因为悲观的革命形势而退出政治生活。而对于我们来说，发展学校 / 工厂工作的前提是“组织化”，只有在完善的组织结构的建立和领导之下，才能够应对工作期间的个中需求（财力 / 人力），这一点，在我们的文章 [《革命者如何“走向人民”》](#) 当中，系统地阐释了我们组织的群众工作路线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旧民主主义革命通常指资产阶级领导的针对旧有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与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在中国，它开始于 1840 年鸦片战争，在 1918 年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与 1919 年“五四运动”后结束，这一期间的革命斗争主要以资产阶级建立政权为主，也包含其他阶级寻求改革、抵御侵略而引发的事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在落后国家发现模仿先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无路可走后，以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思想带领的争取民主权利的革命。它的革命性在于号召从阵地上把“建立民主国家”的任务交给了劳苦大众而不是上层的买办精英，并把反帝国主义从“在与各个帝国主义列强的斡旋和妥协”延伸到了“彻底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

但它也存在公式化、僵化的潜在风险。毛泽东曾说：

但它也存在公式化、僵化的潜在风险。毛泽东曾说：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在这里，不以连贯方法看待革命而是**先入为主划分阶段**并“按规章办事”是不足的（也在后日被“继续革命论”的出现修正）。毛泽东指出了革命的阶段性是正确的，

形式千变万化，不同阶段革命者自然有不同的侧重方向。但这不代表革命者因此在不同阶段就有不同的纲领，事实上，共产主义者不是波拿巴表里不一的欺骗群众，而是**用持之以恒的立场在运动的检验下让群众信服**。共产党领导的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其中不可能不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矛盾不是互斥而是统一的，革命不是计算机程序而是有机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再好不过的证明了这点：原先蓝图里的“新民主主义”的一切都被证实是不切实际的，小生产者没有因为共产党人的友好态度而被改造，帝国主义者也照常将中国“排挤在世界民族之林之外”。为了巩固群众的政权，工人阶级就必须进行领导，工人国家也随之诞生，尽管这不符合领导人们事前所想的“几十年后再搞社会主义，现在说不切实际”。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一个立足点就是中国的“国情”。与其说是中国，不如说是所有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现实。毛泽东这样认为：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但可惜，抗战许久了，除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外，大部分地区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最根本的弱点，大踏步地打了进来；再不变计，民族的命运是非常危险的。”

“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所以，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毛泽东说：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它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可见，毛泽东强调中国必须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主张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等反帝阶级联合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国营经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但允许不危害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这种构想以经济落后为理由，**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严格区隔**，认为前者完成后方才可过渡到后者，可能导致极其歪曲的**机械的阶段论思路**，即在制度设计与经济政策上人为划出两段，而非强调二者的连续性与相互渗透。在俄国，最彻底的阶段革命论的代表就是孟什维克，他们以“俄国的落

后”为理由，主张现在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因此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并主持政权。

考虑到时代背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会主张暂时性联合资产阶级、或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自鸦片战争后对于中国是长达百年的被侵略、殖民的历史，有20年代革命失败的背景，当时又在经历抗日战争，再加上“三三制”的政治实践与国民党的蓄意打压，这一切都对当时的中共造成极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共产党的生存，为了应付国内的旧社会的势力、买办资产阶级、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更为了日后更好地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才提出这些主张。这不只是毛泽东判断的问题，而是**极端严峻的压力所带来的后果**，长期按照最小阻力前进的经验导致了那一代共产党人的这种思想。

那时共产党员最经典的一项工作，就是在工人阶级自下而上决定夺去政权时，以过时的理论**“踩刹车”**以强行维护“新民主主义阶段”。李立三在《关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的几点说明》（人民日报 1949年5月1日）中表示：

“有些工友们这样想：过去我们受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很厉害，简直无法生活，现在解放了，我们应当向资本家斗争，叫资本家多拿出一些钱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才合道理，为什么还要照顾他们的利益呢？抱这样想法的工人，首先是不知今天中国人民解放最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只有把这三个敌人彻底打倒了，中国人民才能获得真正解放，开始建设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有爱国心的民族资本家也是长期受着这三个敌人压迫的，所以他们在今天有可能和我们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革命胜利后，在建设时期，也需要发扬民族资本家们的积极经营的企业心，和我们工人一块来共同发展工业。所以，我们不应当把民族资产阶级当做敌人，而应当把他们当作朋友来团结他。……中国不仅不能像当时俄国一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不能像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一样，在革命胜利几年后就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在取得全国胜利后，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来发展中国的工业，使中国经济能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使工业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改变，并且使工业的比重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没有这种改变，没有工业的大大发展，不仅谈不上实行社会主义，并且谈不上中国民族在经济上对帝国主义的真正彻底的独立自主。……”

当然，某些毛派肯定会否认李立三的这篇文章，理由是他是“走资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因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批判和迫害，因而认定他自始至终都是错误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正是当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直接转述，与毛泽东自1940年以来的公开立场高度一致，并在1949-1952年间被制度化执行。毛当时确实是这样认识中国革命阶段任务的，根本不存在所谓为了“不得罪国民党”“揪出走资派”而“伪装”的说法。反过来说，**如果真有这种“伪装”，且能多年保持政策一致性与制度化落实，那只能说明毛泽东成了一个“神仙”，一句话即可令全党立场瞬间转变，而过去的路线仿佛从未存在。**这种结构意味着群众被排除在政治判断之外，革命家自认为可以完全替代群众作决定，群众既不被鼓励追问“为什么”，也不被培养批判性思维，只需无条件服从。这恰恰暴露了“伪装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否定。

另外，新民主主义要求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在表面上似乎能汇聚更广泛的力量，缩短革命的道路，减少孤立无援的风险。然而，历史的经验一次次提醒我们：**这种“联**

合”并非没有代价，它在理论上埋下了深刻的矛盾，在实践中更是反复暴露出致命的后果。

首先，从阶级本性出发，**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加上了“民族”两个字，但是仍是资产阶级，其存在依赖于对无产阶级的持续剥削。**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可变资本，即工人的劳动创造的超额价值，没有廉价劳动力和被压榨的工人阶级，就不存在利润与资本增殖的可能。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任何形式的“联合”都只能是权宜之计，而非战略同盟。一旦条件允许，资产阶级必然会利用其经济与社会影响力，争夺甚至篡夺领导权，阻碍社会主义化的进程。光明日报所社辑的文集——《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的三个典型事件》（1952年4月版）的前言很好的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

“本书所编辑的是，在伟大的反贪污、反盗窃运动中所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阴谋篡夺领导权的三个典型事件：（一）江门市事件。这是资产阶级的不法分子打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窃据民主党派组织作为进攻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掩护和跳板，篡夺江门市领导权，因而使江门市人民政权根本变质，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损失的事件。（二）重庆‘星四聚餐会’事件。这是资产阶级的不法分子有组织、有计划地组成庞大的垄断和盗窃集团，集中力量向国家大举进攻，企图在经济上要把国营经济置于私人资本的控制之下，在政治上要使人民政府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同时，使出毒辣手段，排挤和吞并中小工厂，企图取得独占的经济利益，严重地损害了国计民生的罪恶事件。（三）蛟河县事件。这是资产阶级的大盗窃集团，‘分兵一路’，进攻我们的县政权的一个严重事件。

在伟大的反贪污、反盗窃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与此相类似的事件是不少的。但只就这三个事件，已经有力地说明了，资产阶级三年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对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权的猖狂进攻，到了怎样惊人的严重程度。”

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报纸都这么说，我想我们也无需再多说什么了。理论上民族资产阶级是“盟友”，但当他们实践中显露出本性时，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了新民主主义预设的错误。

其次，在帝国主义时代，边缘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深陷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结构之中。资本逐利的天性决定了他们的投资必然流向利润率最高的部门——通常是原料出口产业。这种模式不仅无法推动本国工业化，反而加深了对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依赖，形成畸形的经济结构。要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必须主动扭曲价值规律，将投资引向短期利润率较低的基础工业部门，**这与买办化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直接冲突。**即便有韩国式的“国家主导”工业化案例，其成功也依赖于特定的国际政治格局（如美国出于地缘战略需要给予市场与关税优惠），并非普遍可行的自主发展路径。更多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的保护主义政策只是依附性工业化的变种，无法摆脱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利润攫取机制。

再次，从国际主义立场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往往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在国际舞台上的妥协甚至背叛**（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与教训》第七部分）。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政策中多次为了维护与某些资产阶级政权的关系，而**牺牲本地共产党与工农运动的利益**：在缅甸、印尼、越南等地劝阻或限制共产党与工农的革命斗争；在巴基斯坦、菲律宾、安哥拉、智利等地与反动政权建立合作关系，甚至在反革命屠杀发生时保持沉默或拒绝援助。这种“民主革命优先，因而不能为

了革命的‘短期利益’而断了与资产阶级的联合”的逻辑，本质上是以民族主义的外交取代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果是削弱了全球工人运动的力量，助长了反革命势力。

当然，辩证地看，民族资产阶级并非在一切历史阶段、所有具体斗争中都完全没有利用价值。**在特定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资源、社会影响力和部分反帝倾向，确实可能在短期内为革命阵营提供物质与政治支持。拒绝联合他们，可能会使革命力量在初期更加孤立，可能延长革命进程，甚至在某些阶段遭遇挫折。**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希望尽可能保障中国革命更容易地完成，减少牺牲与阻力；另一方面，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又会带来大量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因为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这种联合必然是暂时的、充满风险的，并且会在革命胜利后形成对工人国家的潜在威胁。因此，是否联合，不是一个单纯的“战术便利”问题，而是关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与革命方向的战略抉择。

因此新民主主义论的缺陷在于：它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可以长期依靠的革命同盟，而忽视了其阶级本性与帝国主义体系的深度捆绑。这不仅在国内为资本主义复辟留下了制度与经济基础，也在国际上导致了对工人阶级革命的背叛。它对于革命领导层是“劳苦大众”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各阶级、“人民”的同盟中有一个不存在的“革命资产阶级”。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李济深的例子就是赤裸裸的证明：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批判停留在口头，合作发生在实际。

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不是在民主革命阶段与资产阶级“分工合作”，而是直接以社会主义手段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依靠工人阶级领导，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等劳动群众，打击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建立工人国家，并从一开始就明确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使民主革命不间断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统一战线”的名义下被资产阶级牵制，确保革命的独立性与彻底性，实现国内外无产阶级解放的统一进程。

“人民战争”

中共取得对国民党的胜利，离不开“人民战争”理念的贯彻：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它同样也是毛泽东最主要的军事思想。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

“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战争胜负是由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理和主观指导能力等诸因素决定的。而这种决定作用归根结底要通过人民群众来体现。从政治因素看，战争性质的作用，要通过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态度来体现战争的政治因素正是通过人民群众的人心向背长期发挥作用，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从经济因素看，战争依赖于经济，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但经济条件、物质基础是靠广大人民群众去生产、创造、并运往前线的。战争的经济因素正是通过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长期发挥作用，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从军事因素看，人民群众从根本上决定着军事力量的强弱……由于人民群众在影响战争的诸多因素中，都处于主体地位，因此，他们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

正是在这些理念的影响之下，解放军有效地将广大的受压迫群众组织起来，并且发

扬他们自身的组织和建设能力，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和这种整体力量优势，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前提条件。劳动群众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实现中国大陆的解放。



“人民战争”理念影响下的军队在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阶段能够保有较为民主的制度，不无故克扣粮饷，不随意体罚士兵，更平等地对待普通士兵与工农阶级的成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国民党方面军队一直以等级森严、军官腐败、纪律堪忧闻名；国民党在对待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时也向来采取强硬态度，对比中共的土地政策完全没有任何吸引力，这使国民党脱离了群众，也让这他们失去了赢得一场战争的全部要素。解放军的队伍越打越多，国军越打越少。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主要立足于农村包围城市、依托游击战逐步夺取政权，这与近代中国社会复杂的结构密切相关。我们也得明白，**毛泽东本人从未否认城市工人运动在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毛泽东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最后胜利必须在敌人主要力量所在的城市解决问题”，并强调农村根据地的作用在于“积蓄力量，包围与牵制敌人，为城市的总起义创造条件”；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在《城市工作手册》中写道：“城市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地，是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们必须在城市建立秘密的工人组织，发动罢工和群众斗争，同时利用农村武装斗争牵制和削弱敌人的力量。”印共毛还在《印度革命的战略与战术》中指出：“农村游击区的发展必须与城市的革命运动相结合，最终在城市发动总起义。”；土耳其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土耳其与北库尔德斯坦）在公开材料 and 实践中，不仅在农村地区领导游击战，还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地组织工人罢工和学生运动，将

城市斗争与山区游击战结合。例如，2005年该党支持并参与了土耳其公共部门工人的罢工行动，并在政治声明中强调：“城市的工人阶级斗争与农村的人民战争是一个整体”。

因此，**必须避免将农村武装斗争机械化、绝对化的错误理解**——正如秘鲁贡萨罗所犯的那样，把农村武装斗争等同于整个革命，忽视乃至轻视城市工人运动的战略地位，陷入唯军事论的偏狭路线。他的路线恰好是对毛泽东“人民战争”去除了“人民”的部分，沦为恐怖主义的徒劳。在光辉道路的官方文件和总结中，党的军事路线被概括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核心是农村是主体、城市是补充”，并且被称为“贡萨罗主席创立的党的军事路线”。这种将城市斗争降为附庸的路线，实际上在秘鲁高城市化率的条件下造成了严重后果。单凭传统的、机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是不可行的，这种偏差不仅割裂了工农联盟的整体战略，而且在现代社会结构中会导致革命力量与城市群众的脱节。

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人民战争”，不是字面意义上子弹、炮弹的战争，是**将思想文化斗争、经济改良斗争与必要时的武装斗争统一于一套长期战略之中，着重在现代条件下通过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的城市与乡村联动，培育群众的政治觉悟与自我组织能力。毛泽东喜欢说的“持久战”，不只是武装斗争的策略，更是建设革命党的策略**。这里的武装斗争，不必等同于单一路线的“农村游击夺权”，而是在工人罢工，乃至总罢工中，通过争取士兵、警察等国家雇员倒戈，或直接袭击警察局夺取武器，武装罢工纠察队，乃至建立工人民兵组织，让无产阶级能够用“武器”推翻资本主义。我们共产主义者之所以强调争取国家职员，是因为他们以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本质仍属受薪劳动者，只是特殊的雇佣关系。历史上，1917年俄国彼得格勒驻军在总罢工与苏维埃影响下倒戈，直接促成十月武装起义；1980年韩国光州起义中，市民夺取警察局和军械库，短期内建立了自治力量。这种人民战争观既保留了毛泽东强调的群众主体性与战略耐心，又避免了将其固化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农村包围城市模式，从而使其能在当代社会结构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认为：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种革命最重要的方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敌对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敌对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在第四点，毛泽东提到两条道路的斗争同样会反映到党内，其深刻地意识到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下可能出现的社会不平等和工人阶级官僚化，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且付诸实践，去干涉这种趋势。但是中共党内久已不存在的民主集中制不再允许以公开、透明的途径解决这些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在形式上动

动员了群众去挑战既有的官僚体系，提出了“造反有理”、冲击权力机构等口号，这些表面上似乎接近于工人民主的实践。但如果深入考察它的组织架构与权力运行逻辑，就会发现群众运动始终是在旧有的、有官僚化痕迹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进行的，其目标是调整现有权力格局，而非建立一个制度化、可持续、由工人阶级自主运作的工人民主政权形式（仍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与教训》）。

群众既缺乏稳定的、由地方直接控制的无产阶级民兵武装，缺乏一个拥有党内民主的、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领导，也缺乏对革委会干部的有效制约机制，即针对一切干部的罢免权，最终运动被重新纳入党国体制内部消化。**无产阶级的专政最终演变成了声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的专政，最后成了“个人的专政”。**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其核心在于**将任何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视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非孤立的局部事件**。国际主义强调全球工人阶级必须协同行动，要求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积极推动全球阶级斗争，最终实现阶级的消亡。这必然包括要求建立一个“共产国际”统一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行动，以促进世界革命，因为工人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前，其真正力量在于在政治上组织起来，而不建立这么一个国际来让各国的工人阶级在国际层面上组织起来，工人阶级的力量将变得分散。面对强大的跨国资本主义势力，这种分散的行动将难以形成有效的对抗，从而削弱全球阶级斗争的整体力量。

尽管“无产阶级专政”被视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的必要过渡阶段，但其本质是临时性的，最终目标只能是推进阶级的逐步消失，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瞿秋白、毛泽东，都明确将中国革命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上世纪以及之后的任何时代，假如仅仅在局部范围内工人夺取了政权，实现了分配的平等，最终都会因为资源的匮乏、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本国资本主义复辟而落幕。我们甚至看到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会因为领土问题、利益纠葛而交恶，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取笑。**

在此过程中，文革时期兴起的那种将所有政治斗争非此即彼地划分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两大阵营的军事化提法，也有**教条化的二元论**的风险。这种过分简化的阵营划分不仅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阶级、阶层乃至政治力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动态，还为某些“本质主义”式的谬论提供了土壤。例如，有人据此声称：工人官僚阶层虽然在短期内保卫了革命，但由于专制主义手段导致计划经济长期僵化，官僚最终不得不引入市场手段进行“修正”，从而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复辟，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走资派”；又或者认为改良主义者在真正的革命到来后必然迅速倒向资产阶级阵营，所以他们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走狗。这样的推论，把历史趋势和可能性偷换成了预设的本质，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要区分社会制度的性质与政治路线的倾向，分析政治力量的阶段性与内部矛盾，而不是用结果倒推本质、抹杀中间力量的可争取性。**历史上，工人官僚集团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了反资本主义的政策以实现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例如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尽管伴随严重的官僚主义和镇压，但在经济结构上确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在二战中保卫了工人国家的基本制度；又如战后东欧新生的人民民主国家，在苏联压力和国内工人运动推动下，没收了大资本的财产，建立了计划经济体系。改良主义政党也曾在特定

条件下通过真正的阶级斗争方法推动工人福利的扩展，例如 1945-1970 年代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政府，在强大的工会压力下推行全民医疗、免费教育、住房保障和累进税制，这些改革虽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但确实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并在一定时期内增强了无产阶级的力量。

此外，即便在存在官僚化或改良主义倾向的条件下，工人群众依然可能通过自身的斗争推动政策左转，并在过程中争取更大的政治空间。苏联在二战后的某些时期，基层工厂委员会和工会曾试图扩大对生产的监督权，东欧各工人国家的工人起义也为他们争取到了经济利益和优先的政治权利；西欧的工会运动也多次迫使改良主义政府在福利削减问题上让步。**这些斗争虽然未能根本改变制度性质，但为工人民主化提供了现实的契机——通过扩大基层组织的决策权、强化党内外的民主监督机制、推动国际工人团结，工人阶级有可能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削弱官僚权力、积累自我管理的经验，从而为更深刻的社会变革创造条件。**显然，这些都无法用简单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提法来解释。



迫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局势，也为捍卫自己流汗流血得到的革命果实，毛泽东必须同党内的“走资派”进行斗争，但是这个斗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因为党内本身缺乏民主，因为本身中共对国际革命的诉求有限。如果再叠加“两个司令部”式的标签化斗争方式，甚至混淆《国家与革命》中反复讨论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和“共产主义的第一”两阶段（详情见《资本主义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就会导致斗争策略的僵化和群众基础的流失，最终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根基，也会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严重分裂。

理论的初衷——即继续下去即将被彻底腐化、摧毁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美好的。但是，这里不妨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革命中间要被“分段”进而“暂停”？革命应该是连续、彻底的；工人阶级的政权，应该属于工人阶级自己；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被专政。**不间断的革命，胜过实用主义式遇到问题“临时继续”的赶工。**

“第三世界”和国际主义

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在当代国际语境中被广泛引用。各类学者、政治实践、媒体和外交政策中皆可见其身影。

该理论并非原创自毛泽东，西方早就出现过一种“三个世界”的提法。1950年代，法国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在《观察家》杂志上首次使用“第三世界”概念，用以指称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阵营，也非社会主义阵营的新兴国家。当时的“三个世界模式”是以意识形态、阵营归属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划分：第一世界指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第二世界指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东欧各国、南斯拉夫、中国等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算在内）；第三世界指非对抗的“中立”或“不结盟”的国家。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其雏形源于194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1946年他首次提出“中间地带”概念；1964年又提出“两中间地带”划分：亚洲、非洲、拉美为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洲、大洋洲、日本为第二中间地带。

1973至1974年间，毛泽东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1973年6月提到“第三世界”；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表达：“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非拉是第三世界”。要注意，东欧各国由于直接被苏联控制，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直接参与到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中，在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中算“第二世界”国家。

在毛的框架中，“第三世界”主要着眼于政治力量与经济分工，涵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强调它们反对“第一世界”的霸权，具有联合意识，在理论上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国际主义的部分色彩，使得当时的中国对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然而，该理论逻辑上过于机械和平面。第一，按国家归类掩盖阶级关系及国家内部矛盾，使得不同阶层、社会结构被整体化。第二世界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中的极右独裁政权被同列，**掩盖“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这违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忽略了不同国家内部的主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世界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民主主义论中错误成分的影响。

我们应当回归以无产阶级阶级关系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世界应按帝国主义与被压迫国家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各国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力量的联合状态进行分析。不以国家为整体强扭出虚拟的一致性，而按阶级利益、阶级矛盾、革命潜力对不同国家在国际秩序中起到的作用作出准确的分析。**通过辨别不同国家内部阶级基础和政权性质，分清哪些是革命力量，哪些是反动力量。重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阶级联盟为策略的国际分析模型。**

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是帝国主义秩序的受害者，但不代表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们和被统治的劳苦大众有“反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甚至很多时候，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会与帝国主义势力同流合污，共同压迫境内的工人阶级。这点必须清楚！

结语

批判、再审视并不等于否定。恰恰相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历史地分析中区分“个人贡献”与“整体路线”，把理论方法和斗争经验从特定领导人的政治局限、阶级立场偏移中剥离出来。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再审视甚至批判，是为了防止把毛泽东思想神圣化为不可触碰的信条，从而使整个左翼陷入宗派化与历史循环。

换言之，这种批判是为了让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更强的生命力，而不是在偶像崇拜中逐渐失去它，将它变成毛泽东逝世后已死的理论。显而易见的是，客观的批判与纠错并非情绪化的否定，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政治立场。革命从来不需要神坛上的偶像，而需要脚踏实地的阶级斗争和清醒的政治判断。

今天，很多左翼同志出于对毛泽东历史贡献的敬佩，倾向于把他的思想当作完整的、永恒正确的指南。这种态度，虽然出发点是热情，但很容易让我们在现实斗争中失去批判精神，被过去的框架所束缚。我们提出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其现实意义，不是为了否定中国革命的成果，而是为了让无产阶级的斗争摆脱官僚集中制的桎梏，把目光重新投向工人民主和国际主义。希望大家在继承一切革命遗产时，都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辨精华与糟粕，让革命传统在今天焕发新的生命力。

对“粉红”诡辩术的揭露：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

面对共产主义的揭露，统治阶级的诡辩家们最喜欢用拼凑起来的文字和武断的逻辑，颠倒黑白、歪曲现实。他们要么用暴力堵住别人的嘴，要么就用这样的诡辩拉低讨论的水平。近来被广泛讨论的“麦片是只金毛”的一期视频，就是所谓“粉红”群体诡辩术的代表，它将正的说成反的，高的说成矮的，长的说成短的——总之，是举着革命的旗帜，正当化反动的暴行。

什么决定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中国社会存在的极端不平等、分配不均和阶级差异是毋庸置疑的。诡辩家们很精明地避开了实际上判断“社会主义”的要求，转而说：

“即使树和电线杆一个棕色一个黑色，一个活的一个死的，一个木制一个混凝土，但他们都是杆子啊。”只要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就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是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占据主导地位的吗？现在的贫富差距不过是暂时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罢了，毕竟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嘛。

但是，要清楚，社会主义不是依靠某个自称社会主义的政党来执政就能够成立的。苏联也是共产党执政，最后却堕落成官僚专制的国家；越南也是共产党执政，可是大量的越南工人却在血汗工厂里燃烧生命，只是为了满足资本家们对外出口以赚取超额利润的欲望。中共与它们比较起来，难道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吗？既然中共自己都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就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看，中共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

从经济角度来看，不是多成立几个国有企业就是社会主义了。朴正熙时期的韩国以及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的西欧各国，这些国家曾经大量的国有企业，国家经济计划对经济的影响也很显著，按照小粉红的划分方式它们也算社会主义吗？中共现在所实行的经济体制，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为了掩盖这个明显的资本主义因素，诡辩家们便又开始说胡话：决定社会性质的是所有制结构；至于是不是市场经济，也就是社会如何分配、如何交换产品，那似乎就完全不需要考虑了，因为这是一个“次要的因素”。

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歪曲。既然要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就必须要从总体上去考察这个社会，而不是仅仅撷取某个因素，那是明显的以偏概全。是的，中共

有很多国有企业，其中不少规模庞大的，其资本量跻身世界前列。然而，一方面，许多国有企业被各种方式廉价出售给私人，特别是在上个世纪这种活动十分频繁；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都是被中共控制的，劳苦大众却完全无法通过某种民主机制对其进行规划与监督。比如今年的东北大学6人溺亡事件，所参观的就是一家国企。这个安全事故的原因，明显在于成本控制的原则导致维护不足，而成本控制的原则又出于价值规律的制约。此外，众所周知，烟草、石油、国家电网等国有公司，已经成为不少体制内的占有高位的人“享清福”的金饭碗。是的，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可是，国家是谁的国家？这个问题在下文自会阐明。

市场经济体系下，国有企业从来不是什么公有制经济，不过是少数人追求利润的工具罢了，而非注重社会效益、造福无产阶级的生产机构。中共虽然自诩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实则国有经济正在逐渐萎缩，中共不仅一直在缩减国有企业预算，甚至四大银行也开始了上市。经济计划也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罗斯福和后世的资产阶级政客都曾制定过短期经济计划来服务于市场经济，但是这些经济计划都是建立在承认资本家的私有权的基础上的。中共虽然说自己实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却依然无法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无法调节生产大于需求，无法改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因为只要真正了解过马克思有关市场经济的科学论述，就会知道，市场经济必须基于商品生产；只要商品生产还存在一天，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就是无法消除的。市场经济其以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为前提，又以工人受到严重的剥削压迫为必然结果。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要从各个方面限制、扭曲价值规律发生的作用，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消灭商品生产，消灭生产者之间相互对立、独立的现实，而不是像中共所做的坚持市场经济，这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加强资产阶级的富有与无产阶级的贫穷，从而加强资本主义的因素。市场经济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代名词，难道还可以辩驳吗？

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国家的性质是由在社会生产中的生产关系以及哪个阶级占据主导地位决定的，阶级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注定是较为强势的那个阶级。如今的中国生产资料和财富被少数人牢牢掌握了，无产阶级为了生活不得不去富人提供的岗位工作，任由他们剥削剩余价值，无产阶级却只能看着步步紧逼的负债与物价上涨唉声叹气，却毫无办法。难道我们还能说这是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吗？

中国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特殊性是，它们是在中共的默许乃至政策鼓励下慢慢生长出来的，中共为稳固自己的政权选择了拥抱资本主义。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席卷全国，成为任何一个私人企业、国有企业都无法抗拒的规律后，中共发现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极大地增长。为了延续统治，中共官僚凭借着军警等暴力机关踩在资产阶级头上，如同寄生虫般寄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上，牢牢地把持着政治权力。但是如果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受损，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镇压无产阶级。佳士工人和富士康工人等血腥惨案已经告诉了我们，中共从来不是什么公平的仲裁者，它彻底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只不过是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保卫者资产阶级整体的利益，它们打压马云等人不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使自己永远压住资产阶级一头，而不是什么捍卫人民利益。

如果这样的社会也算社会主义，那我们不要也罢！

“潜艇论”是经典的帝国主义绑架

有一张图片，常常被用来讽刺统治阶级“大家都在一条船上”的虚伪言论：甲板上的豪华大堂里，是酒醉金迷、大腹便便的资本家；锅炉旁的煤堆边，是灰头土脸、瘦骨嶙峋的劳动者。当劳动者们质疑时，资本家们便会说：你们是在破坏这艘舰艇，是一些用心险恶的人在煽动，如果这艘船破了，那我们不都要沉到水底吗？你们不仅不感谢我们提供了这么安全的潜艇，竟然还想要破坏它！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喜欢用民族主义叙事或所谓爱国精神来转移矛盾稳固统治，中共也不例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口号也是中共维系自身统治基本盘的重要精神支柱，“爱国”成为了一种虚伪的共识，成为了所有事物发展的核心标准，谁要敢质疑就是汉奸、卖国贼，只要为了国家资产阶级的剥削、官僚的贪污腐败就都可以忍受，甚至衍生出了“某某产品是民族脊梁，批评它就等于不爱国”这种荒诞的政治正确。这些资本家总是习惯用一些宏大叙事来掩盖自己的罪行，一旦自己丑陋的嘴脸被揭穿时，便歇斯底里般镇压人民。



在阶级利益面前，民族感情不过是个笑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范围超过了700万平方公里，而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一降再降，甚至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去前线当炮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少数人的利益，就算战争胜利，日本老百姓也不可能做到衣食无忧，天皇可不愿见到自己的子民衣食丰足，不然哪来的剩余价值可以供他们剥削？美国是独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却有大量的流浪汉，很多劳动者往往一天打两三份工才能糊口，即使有川普的所谓MAGA运动，也不会改变基本的现状。

统治阶级高喊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自己却把子女和资产全部转移到海外去。当人民努力奋斗却无法换来幸福生活时，资产阶级就以民族利益、大局为重搪塞过去；自己的负重前行不会使国家更好也不会改善底层人民生活，只会让富人的生活更加滋润。这个国家根本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而是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工具，高昂的遗产继承税和严格的外汇限制无法缓解阶级矛盾，只不过是希望这些剩余价值不要被外国的资本家夺走。

有人会说，中共不是进行了“扶贫攻坚”吗？不是消除了贫困吗？这几十年来，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是提高了吗？难道这还不能证明，中共本质上是站在人民这边的吗？我们倒要反问：难道整个社会所有的财富，不是劳动群众辛苦劳动创造的吗？如果说劳动群众从中共那里获得了财富，事实上不就是中共把劳动群众创造的财富以某种方式拿走，然后又把其中一部分还给劳动群众吗？这种拙劣的把戏连三岁小孩都不能骗得过。或者说，你们的意思是，没有中共，劳动群众就没有一个安稳的生活生产的环境？资本主义创造出系统性的贫穷、失业与各种安全上的悲剧，穷凶极恶地压榨引起无产阶级不断地反抗。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群体性事件总数年年攀升，直到“不再公布相关数据”；相应地，中共的维稳经费也年年攀升。结果就是，资本主义自己引起了社会动荡（而所谓的“社会动荡”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家的正义斗争），又花了大资源暂时地压制了这些“动荡”，建立了用于剥削的秩序，然后便自夸说：“你看这个秩序多好”！是的，社会运行需要一个秩序。但是，无产阶级自己就能够建立这样的秩序，不需要资产阶级如此曲折地建立极其不稳定的秩序。

是的，我们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有共同的肤色、语言与生活习惯，我们的祖先也长期以来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可是，这不是你们资本家压榨劳动者的理由。是的，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很可怕。但是，我们要问，无产阶级被本国资本家剥削与被外国资本家剥削，这之间难道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吗？归根到底，你们所担心的，不过是你们究竟能不能继续榨取我们的剩余价值。为了保卫资本剥削的条件，你们甚至不惜不断发展军工企业、积极准备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让无产阶级承受严格的管制、饥荒与死亡。这“盛世”，究竟如谁所愿？

因此，根本上来说，潜艇论是完全的偷换概念。倒不如说，住在潜艇里的，是全世界的人民；各个国家不过是在潜艇中的不同船舱里。各国之间的互相排斥、冲突乃至战争，才有可能导致潜艇倾覆；只有整个潜艇中的所有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管理潜艇上的一切事务，它才能真正安全地行驶下去。

东拼西凑的实用主义大锅烩

如今很多同志喜欢称作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共产党为修正主义政党，这种叫法其实是不准确的。19世纪末，以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爱德华·伯恩斯坦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很多理论已经过时了，以此为借口，他们反对剩余价值论，主张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议会斗争等改良手段建立，赞成阶级调和。这是最早被直接称作修正主义的思想。因此，修正主义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一种特殊的、错误的变种。

如今的中国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中共

的利益也彻底捆绑在了捆在资产阶级身上，对于渐次过渡到共产主义，他们完全不感兴趣，他们更在意的是党领导一切。必须清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问题，不仅仅是思想上背离了共产主义，投靠了社会改良的修正主义阵营；这样的称呼只会减轻它们所做的恶的认识，并且还提供了一种幻想，好像中共目前的性质只是由一种特殊的、偶然的、“被奸人蒙蔽”的情况决定的，好似中共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只不过“走了历史的弯路”。我们在前面已经证明了，当下的中国社会性质，就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上，它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特殊形态：波拿巴主义（详见我们组织的《论中国国家性质》）。中共官僚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资产阶级，但它们无疑与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因此，与其说中共是“修正主义”政党（这种说法的唯一用处不过是说明中共在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不如说中共是一个实用主义政党。就像邓小平的那句话：“不论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是用最实用主义的方法，它采用的一切办法与手段，不过是为了“发展经济”，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无论这种手段是新自由主义式的自由贸易，还是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计划，抑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甚至是强盗式的从农民手中夺取土地，只要能“发展经济”，那中共就会笑纳。中共的官方指导思想也在融合古今中外一切可能服务于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搭建历史上的桥梁制作出的“大锅烩”。但是，当中共官僚的无能使得他们运行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行将崩溃时，他们就和昔日自己的敌人合作，资本家也摇身一变，成为“人民企业家”。实用主义的目的是所谓“发展经济”，而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的全部要义不过就在于如何更好地榨取剩余价值。

因此，“小粉红”，或者说建制派口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句完全的空话，事实上就等于资本主义。劳动人民不会相信统治阶级的鬼话，他们终将用最暴烈的革命行动告诉官僚和资产阶级，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

现代犬儒主义批判

要批判现在的犬儒主义，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现代犬儒主义，以及它和古希腊犬儒主义有什么不同。可以确认的是，现代犬儒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不同是性质上的——古希腊犬儒主义是一种哲学，而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政治倾向，在大多数使用场景中都不会上升到哲学层面。

在通常的语境中，古希腊犬儒主义是这样的一种哲学：“对于犬儒来说，生活的目的是活在中德中并符合自然。犬儒认为人是理性动物，可以通过严格训练并按照自然来幸福地生活，同时应该摒弃财富、权力、名利等传统欲望，甚至可以在公共场合公然蔑视传统规范，转而追求一种没有任何财产的简单生活。”可以看到，古希腊犬儒主义其实更类似于现代的“极简主义”，强调通过严格的自律达成精神层面的高尚。后来这种倾向进一步衍生出斯多葛主义，进而融入近代的理性主义，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所以认为古希腊犬儒主义反对参与政治是没有根据的（追求自身品德的完美不必然导致非政治）**

现代犬儒主义的来源在于十七十八世纪，这个时代的一部分“哲学家”抛弃了古希腊犬儒主义的禁欲主义和理性主义原则，将它变成一种“不信任任何人”的思想。到这一步，现代犬儒主义和古希腊犬儒主义仅有的共同点可能也就是“不在乎社会的眼光”了。从这一点看，现代犬儒主义和古希腊犬儒主义的关系就像费边社和费边的关系一样，现代犬儒主义将古希腊犬儒主义视作自己的理论来源，尽管它在事实上歪曲了古希腊犬儒主义，并把它作为将自己生活方式的合法性来源——是的，事实就是——先有现代犬儒的生活方式，然后才有现代犬儒主义。这也是现代犬儒主义和哲学最大的区别：它仅仅是对现实世界的描述，而不是一张改造世界（精神或物质）的蓝图。

现代犬儒主义被定义为一种对伦理及社会风俗采取不信任的态度，犬儒主义者被称之为拒绝被收编的愤世嫉俗者，以“不相信”来获取他们社会存在的“合理性”。现代犬儒最大的特点就是非政治，尽管它在实质上恰恰是政治的，也就是否定一切宏观叙事，否定政治行动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将自己和现实社会相对地隔离开。资产阶级学者将犬儒主义和极权政治论结合，认为犬儒主义是极权政治在“狂热”、“恐怖”这两个阶段结束后的最终产物，是“极权国家”中“知识分子阶层”的一般状态”。这种论调无疑是错误的，事实上犬儒主义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都广泛存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犬儒主义的成因是原先价值观的崩塌，继而将现代犬儒主义和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同盟的破裂联系起来，认为现代犬儒主义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经济神话的破裂，但这一观点是不全面

的，因为这无法解释国内左派中同样常见的犬儒化倾向，所以我们要扩大范围，进一步考察现代犬儒主义受众的共同条件。

不论是不是政治性的，没有哪一种思潮是凭空诞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社会形态下的人类劳动，会通过他们的具体实践构建出属于这个生产形态的精神世界，因而每一种思潮，都是和它所属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互相作用。本文探讨的现代犬儒主义便是如此，不会存在有这样一个抽象的群体生来就对政治冷感，因此势必是这样的或者那样的社会生产构建出了这么一种思潮。而结论只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专政下，它们不仅垄断了物质生产资料，同时也垄断了精神生产资料，最重要的是——实际内容上它们把工人阶级排斥在政治中心决策圈之外。虽然事实上，某些资产阶级专政乐于在形式上提供议会政治麻痹工人阶级，像这样的资产阶级专政尚且还会做做样子，而像中共这种波拿巴主义的专政更是连形式上的议会政治都不给予工人阶级。而被排除在政治运转结构之外的工人阶级，实际内容上不具备政治主导权（犬儒主义在高级官僚和大资产阶级中极其少见）。**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口口声声讲“非政治”的现代犬儒主义恰恰是政治的产物。正如宗教是无反抗世界的反抗，是无活力制度的活力，而现代犬儒主义就是无政治者的政治，现代犬儒主义就是被排斥在现实政治之外的人用来掩饰痛苦的，虚假的政治信仰，通过批评，敌视一切政治理念，现代犬儒主义者达成了一种虚假的政治参与。**



现代犬儒主义不是哲学，而是一种政治信仰，是因为它事实上是一种被专政阶级的应激反应。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出现全社会级别的现代犬儒主义者？就是在这些人意

识到现行政治体制不能满足自己的诉求，又由于被专政地位而基本无法改变现行体制的情况下。阶级斗争中的失败者被剥夺专政权力（有时候是暂时的），失去了按照本阶级意愿改造社会的能力和权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事实上造成了某种寻求支持的“酸葡萄心理”，放弃继续斗争的人群选择用“我不该参与政治”掩盖“我不能参与政治”以求自我保护。

现代犬儒主义从来都不是所谓知识分子阶层的专利，事实上，任何一个被专政阶级都会产生犬儒主义思想——中国古代的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地主，工业革命时代的贵族，还有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信徒都是现代犬儒主义的大客户。**资产阶级学者误以为只有知识分子会产生现代犬儒主义思想，是因为知识分子收到的教育决定了他们更容易提出诉求，在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早期，远高于本阶级内一般群众的知识水平使得他们更容易看到这些由于被专政而无法达成的阶级诉求。但是在像中国这样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无产阶级也有比较高的认识水平，也相对的扩大了现代犬儒主义的易感人群。**所以，并不是现代犬儒主义像病毒一样“扩散”到无产阶级中去了，而是无产阶级自身的发展使得他们进入了一个容易产生现代犬儒主义思想的阶段——一个能模糊地认识到自己的阶级诉求却不能有效实现阶级诉求的阶段。

那么，在目前阶段有没有可能消灭作为一整个思潮的现代犬儒主义，或至少是压制它呢？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非政治化情况在资产阶级专政下是长期存在的，并不断批量生产现代犬儒主义者，工人阶级群体之所以会产生“犬儒”的思潮，是工人阶级被排斥出政治活动的一种结果。因此要改变这种现状，共产主义革命者就必须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即使工人阶级会对自己的现状和能力感到消极，但这不是工人阶级的问题，工人阶级不仅有能力，而且也应该、也必须要参与到政治当中，社会的财富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创造的，因此他们理所应当要掌握国家政权，革命者们的工作就是与“犬儒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鼓励并带领工人参与大小程度的政治事务，让工人们意识到他们组织起来是具备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的，而这并非是资产阶级精英的专利。因而，随着阶级矛盾的愈发不可调和，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掩盖的时候，即工人阶级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正式对资产阶级政权发起挑战的时候，此时革命就是工人阶级最主要的政治工作，因而为了夺回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工人便会自然地抛弃“犬儒”，尝试脱离政治对于工人来说此时就变得不切实际了，现代犬儒便只能作为一种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潮蜷缩在极少数人群里。

这样我们就明确了对待现代犬儒主义的总战略，具体到态度层面，共产主义革命者应对现代犬儒主义者时应该采取“同情而非敌对”的态度，资产阶级通过垄断精神生产，并通过它们主导的社会生产关系塑造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工人阶级在其统治之下普遍缺乏勇气与剥削阶级作持久而血腥的斗争，在面临本阶级受到压制的现实时采取一种自我保护的态度。**而可耻的绝不是工人阶级，只要工人阶级能够意识到自己阶级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反抗的思潮会被点燃得比“犬儒”更加迅速无比。**因此，共产主义革命者在与现代犬儒主义者接触时切忌一上来就从理论层面批判犬儒主义思想——那只会让你看上去像个夸夸其谈的自大狂，而是要通过一切组织力量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使他们团结起来，鼓励并带领工人阶级践行现实的政治运动：罢工、集会、宣传等，使工人阶级意识到政治并不

是远在天边的幻想，而是切实的、近在眼前的反抗武器。犬儒不是完全没有政治理念，恰恰相反，很多现代犬儒的确怀有或朴素或完善的政治思想，只是在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实践它之后被迫放弃了而已，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们就要耐心地接触他们，一点点地帮助他们参与一些小规模的政治活动，以求全部或部分地恢复他们的参政兴趣。

如果说单纯进行理论的斗争，而从不组织工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是否可行呢？现代犬儒主义和其他政治理念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没有哲学依据，正因如此，现代犬儒主义者也没有改造世界或维护世界的欲望，换言之就是中立态度。而现代犬儒主义非自愿的形成条件注定了我们不可能在实现无产阶级民主之前广泛压制它的影响，也不可能通过指责抽象的现代犬儒主义来说服现代犬儒主义者回归政治或避免一般群众由于非政治化的事实而变成现代犬儒主义者。所以，采取攻击性的用语来指责现代犬儒主义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可能让一个现代犬儒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甚至有可能起到反向作用，让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排斥。而这恰恰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结局——本来是要说服他们加入无产阶级革命，结果说着说着把他们弄到革命阵营的反面去了。恢复现代犬儒主义者的政治兴趣和参政意向，这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带领他们参与一些现实的政治活动，让他们恢复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心。

在任何时候都要清楚，现代犬儒主义者不是因为敌视政治而远离政治，**而是因为远离政治而被迫敌视政治**，要想让他们恢复自己的革命性，革命者就得给他们参与政治的空间，并且不断地压制党内的失败主义情绪。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严格的区分对左翼阵营内部不同意见同志，对中立者，和对各种反动派的态度，要怎么依靠前者，团结中者，打击后者。这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要严肃思考的问题，如果一下子把打击面拉的太大，最后损害的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新疆问题及当代共产主义者的态度

新疆，作为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单位，同时作为世界上专制程度最强的地方之一，其广袤的面积丰沛的自然资源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得新疆问题作为一个复杂的的政治问题摆在当今的共产主义者面前，我们新疆的同志们在此文中将解释新疆的现状并阐明共产主义者的立场。

新疆地区的经济状况常年居于全国平均线以下，且其相较于第三产业，更依赖第一（棉花、林果、畜牧）、二（矿能开采）产业来为当地居民创收、为当地政府提供财政收入。同时新疆地区人口稀少、人口密度低、城镇化率低、生态环境恶劣，这使得新疆难以成为资本所青睐的“风水宝地”，同时客观上使得当地人民的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那么作为“人民政府”的中国政府是如何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不得不先谈到同中共作对的常年活跃于新疆的动荡和分离主义分子。

新疆当地低迷的经济状况给了宗教与恐怖分子以可趁之机。“东突厥伊斯兰”在中共官方的定义是恐怖活动，但无论是通过何种暴力手段进行恐怖袭击也好、暴乱也罢，共产主义者要对这场运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它之所以能够暴发，一方面有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但根本上在一切社会矛盾中，最深刻、最广泛的矛盾是阶级矛盾。正是中共资产阶级当局长期以来对新疆进行残无人道的“经济内殖民”（即通过引入资本、引入工业化造成当地个体从事农业、畜牧业的居民迅速失业，并在一方面不会也不能同当地居民共享地区资本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无法保障失业人群的生活水平，这就造成了当地居民不仅要适应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还要忍受拮据的生活）造成了新疆的阶级矛盾的激化，它不是单纯的“伊斯兰教与中国汉文化的冲突”。同时由于埃及、土耳其等国错误的煽动，再加之前苏联上世纪所策动的新疆“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影响，新疆的斗争不可避免的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东伊运”运动的矛头始终是指向汉族人民。他们简单的将自身的苦难来源简单的看作是“汉人”带来的，而没有认识到苦难真正的根源是中国政府错误的民族政策和中国资本主义必然带来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民族不平等，引发了日后一系列悲剧的发生。在2008年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及南疆地区的喀什事件、拜城事件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恐袭事件中，无数无辜的人民群众丧失了生命，这还不是“东伊运”最恶劣的影响。

这场运动同时被用反动的总结口号所裹挟，并没有任何实际的进步意义。在政教合一的专制政权下，新疆维吾尔人的苦难不会解除，不过是更加赤裸裸的由维族统治

阶级压迫。这种反动派**“狗咬狗”**的对抗给中共落下镇压的口实，进一步加紧对新疆的剥削，也促使一套中国最为高压的专制机器得以建立起来，一座座集中营拔地而起，无数无辜的维吾尔族群众仅仅是因为做了一些让中共认为“不正确”的事情便被送去集中营。在这里我们附上我们同志进行的一份真实的采访记录来直观的向诸位同志展示南疆高压的政策：

受访者：前些日子在**（出于安全考虑将实际地点匿去）有一个汉族的娶了一个维族老婆，当时视频发网上了，就有一个维族的在下面来评论就抓进去了，三年！

我们的同志：他当时说了什么？

受访者：就说那个汉族男的胖啊什么的。

我们的同志：这确实有人身攻击的成分，但不至于三年啊

受访者：反正那个评论是说的意思是怎么不嫁给维族啊，维族就应该嫁维族。

我们的同志：他评论里说的涉及通婚的事情了？

受访者：那个人没有，全是他们以为的，那个人只说那个汉族的胖。

我们的同志：谁认为的？

受访者：政府啊、社区啊、让后就给评论的那个人送进去了三年！

我们的同志：是判刑了吗？

受访者：没有，是送到大学新疆本地人对南疆“一体化”集中营的称呼那里去了。

我们的同志：这属于是特例，千分之一啊还是……？

受访者：这是普遍现象，好多人因为说这句话就进去了（一体化），汉族也有但主要维族，那个一体化就是针对维族的。

不难看出新疆管控力度相比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差异。在新疆这个全中国人口最少的省份之一却有着全中国最为庞大的警察编制。它的设立而并非像中共当局宣传的那样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而是为其高压政策的执行提供人力条件。也正是因为“东伊运”这一场荒诞的、可笑的伊斯兰教所谓的“圣战”运动让中共这些高压政策得以顺理成章的推行下去，为其经济政策保驾护航——“圣战”让新疆的部分群众对新疆的这一套警察制度表示欢迎，这种程度上，他们（发动“东伊运”的群体）并非专制政权的敌人，反而是有来有回打闹的“朋友”。



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必须指出，中共在新疆的一整套高压管理和警察制度并非是为了其所宣扬的目的，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自身对新疆的“经济内殖民”保驾护航。共产主义者必须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披着外衣的恐怖主义行动，只有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政党，健全完整的基层组织工作，发展进步的共产主义者，团结各个民族的无产者，用科学取代愚昧，对向造成全国人民苦难的根源的中国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建立起从平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取得真正的解放。

资本主义框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平等。而且，无论是民族压迫中的压迫民族还是被压迫民族，工人阶级都处于同等低劣的地位：在这里必须以阶级为界限塑造统一，而不是资本主义内“大一统”和“分离主义”的两条死路！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看： “人性贪婪论”站得住脚吗？

在历史上，“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的争论绵延数千年，它们都试图用一种先天的、抽象的本质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与社会现象。然而，马克思主义并不接受这种脱离历史与社会条件的本质主义设定。它认为，人并不是带着某种固定不变的“善”或“恶”进入社会的，而是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中形成自身的利益诉求与行为模式。同样，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将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观点简单化为一种抽象的“集体主义”，把个人利益完全压抑在所谓“集体”之下，这同样背离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

有意思的是，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指出，“人性本恶”的命题本身相较于“人性本善”的天真设定，是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写道：“人性本恶这一基督教的教义，比其他教义说人性本善要高明些。”这里的“高明”在于“人性本恶”承认了人的欲望、激情与特殊利益的现实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同样强调：“人并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蜷缩在世界之外。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就是社会。”（《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意味着，**承认所谓“恶”的现实性，正是走向实践唯物主义的必要一步，因为它迫使我们从抽象的道德本质转向具体的社会关系与生产条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揭示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置于生产方式、阶级结构和历史发展的总体脉络中加以分析。他们强调，人的本质并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体性，而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利益并非自外于社会而存在，而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形成、发展并受到制约的。换言之，个人利益总是嵌入在一定的集体利益之中，而集体利益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成员共同生存与发展的总体要求的体现。

在阶级社会中，集体利益首先表现为阶级利益。阶级利益的形成，并不是由某种先验的道德共识或抽象的理念所决定，而是由物质生产条件（例如自然环境）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人类在面对自然威胁、追求整体存续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协同劳动来修建水利、储备粮食、抵御灾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协同劳动逐渐能够创造出超出个体即时生存所需的剩余产品，而剩余的存在又提出了储存、分配和管理的问题。为了有效地组织和调配这些剩余，公共权力不得不从社会整体中分离出来，形成专门的管理者和相应的制度。这种“公共权力”必然逐步和劳动者的日常生产脱节，因为它所承担的职能已经超出了个体或小群体的直接经验：它必须统筹跨地

域的水利系统、调配跨季节的粮食储备、协调不同工种和区域之间的分工。这些任务要求长期的、制度化的管理，而不是临时性的、基于血缘或邻里的自发合作。

正因如此，公共权力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机构和人员，他们不再直接参与日常生产，而是以监督、调度、征收、分配的形式来维持社会整体的运行。对劳动者而言，这种权力显得“异己”，因为它不再是他们日常劳动的直接延伸，而是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组织力量。然而，**这种脱节并不是偶然的“腐化”，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人类社会从以小规模、松散协作为基础的原始共同体，过渡到能够进行大规模、跨区域协同的复杂社会。这种脱节本身是一种进步，是人类社会在面对自然环境巨大压力时的必要选择。**如果没有这种独立的公共权力，就无法在洪水来临前统一调动数万人的劳力修筑堤坝，无法在歉收之年将余粮从丰收地区转运到灾区，无法维持跨季节、跨区域的生产与分配秩序。换句话说，没有这种权力，人类社会就会在自然灾害和资源短缺面前四分五裂，陷入饥荒、动荡乃至灭绝的风险。

在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级后，每个阶级在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在生产与分配中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都有着相对一致的物质利益诉求。这种一致性，使得阶级成员在维护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形成某种共同的利益方向，这就是阶级利益的基础。需要强调的是，阶级社会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所谓“人性自私”或“人性恶”，即便所有人都极其善良，也无法避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剥削结构，因为它是由生产力发展、剩余产品分配与社会协同的制度性必然所决定的。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于维护和扩大资本的占有与增值条件，这要求他们维持雇佣劳动制度、保护私有产权、扩大市场；而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则在于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水平、争取社会保障、确保就业稳定，乃至最终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

个人利益与阶级利益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个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位置来实现的。在阶级社会，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中，这种关系决定了他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也决定了他在社会中的权利与义务。个人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与自己处境相同的其他人。于是，**个人利益在追求过程中，往往与同一阶级的其他成员的利益趋于一致，并在和其他阶级的斗争中被上升为阶级利益。反过来，阶级利益的实现，也为阶级成员的个人利益提供了条件和保障。**

然而，这种一致性并不可能是绝对的。个人利益与阶级利益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尤其是在阶级内部存在分化的情况下。**阶级内部由于技能、行业、地域、收入、雇佣形式等差异，短期内常会出现利益冲突**，例如不同工种的工人因岗位稀缺而竞争，或资产阶级内部因市场份额和资本规模不同而相互排挤。然而这些矛盾并不改变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根本位置，一旦外部力量威胁到阶级整体地位，原本分化的成员往往会重新凝聚在共同的阶级利益之下。更为复杂的是阶级跨越及其愿望所带来的冲突。出身工人阶级的个体在通过教育、创业或仕途进入中产阶层乃至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可能会主动调整甚至牺牲与原有阶级一致的利益诉求，以换取个人晋升机会；而这种策略在短期内往往与原阶级的整体利益相抵触。相反，原本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个体在经济破产后沦为雇佣劳动者，虽然客观上已与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一致，但在意识上可能仍保留旧有阶层的消费习惯和政治立场，从而与新所属阶级的

整体利益发生摩擦。还有一种情况是个人尚未实现阶级跨越，但怀有强烈的上升愿望，这种预期会促使他们在制度选择上支持有利于资本方的规则，以换取潜在的上升机会，即便当下自身利益受损。

在政治判断中，人们也存在将个别国家领导人的社会出身、生活方式或个人立场直接等同于国家的阶级性质，因此会导致一种“我们只要有个‘明君’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的错觉。国家的阶级属性从来都不取决于某个领导人的个人标签或道德品质，而是由占主导的生产关系 / 所有制结构的总体逻辑所塑造。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的社会力量：有些事物可以被理解为“工具”，而另一些则是制度化的权力关系本身。

科学技术就是前者的典型例子。它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本身并不预设价值取向，可以被用于改善生产条件、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也可能被用于战争、剥削和压迫。它的性质是中性的，其价值取决于使用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制约。然而，**阶级、父权制、私有制和国家的权力结构则完全不同，它们不是外在的工具，它们一旦形成，就必然以压迫和不平等的方式运作，无法因“被特定的人利用”而变得好或坏。**

我们假设在阶级社会中，存在一些愿意与劳动者共同劳作，并给予劳动者较好待遇的奴隶、封建主、资本家。然而，他们的行为也无法改变制度的根本逻辑。奴隶依然是被占有的财产，农民依然必须缴纳地租和承担徭役。换句话说，这些“善良”的统治者在日常生活中或许表现出仁慈，但在制度的总体框架下，他们仍然必须履行作为奴隶主或领主的角色。奴隶制要求奴隶的无偿劳动来维持社会运转，封建制要求农民的剩余产品来支撑封建主阶级的存在。**如果统治者完全放弃这种剥削关系，他们就不再是统治者，而是退出了制度本身，也就无法通过作为统治者的身份来给予劳动者“好的待遇”；而只要他们仍然处于统治阶级的位置，就必然要按照制度的逻辑剥削压迫劳动者。**

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阶级往往需要承担军事义务，也要通过资助竞技、修建公共设施、缴纳贡赋来维持其政治声望，若奴隶主长期减少剥削，让奴隶保留更多劳动成果，他所能积累的财富就会停滞甚至下降，无法扩张庄园、购买更多奴隶，也难以供养军队或履行政治义务，军事地位和政治影响力随之削弱，也会逐渐丧失在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中的地位。

封建制社会同样如此。封建主如果长期减轻农民缴纳的地租和减少农民的徭役，就无法继续维持军队、维持庄园和其政治影响力。在封建领主之间的竞争中，这样的“仁慈领主”会迅速丧失地位，甚至被强大的封建主吞并。历史上，欧洲中世纪的许多小领主在减轻农奴负担后，因财政空虚而被迫将土地出让给更强大的封建主，最终失去作为封建主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则以另一种形式重演这一逻辑。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增值，资本家必须不断压低成本、提高剩余价值率。如果某个资本家真心希望改善工人生活，长期将利润大规模让渡给工人，他的企业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失去积累能力，甚至可能连维护机器和购买原料的本钱都赚不回来，从而被市场淘汰。

可见，在剥削制度下，权力结构一旦形成，就会以自身的逻辑强制一切个体服从。社会结构并不是个体意志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具有自我再生产能力的整体。它通过法律、制度、生产关系和竞争机制，把个体纳入其中，迫使他们按照整体逻辑行事。个体的道德选择或许能在局部产生缓和作用，但无法改变整体的运行轨迹。

因此在理解上述情形时，**应当以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客观位置和再生产逻辑为判据，而不是以短期利益波动、情感认同或表面身份为依据。个人利益可能因分化、跨越或意识形态偏转而与阶级利益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的性质和走向，最终取决于其生计方式、权力关系以及制度结构对其位置的最终走向。**

所以，人在阶级社会中所表现出的极端个人主义与种种“恶行”，例如在职场中彼此倾轧、在公共资源分配中争夺不休、在消费中盲目攀比，甚至在危机中出现的囤积居奇与冷漠旁观，**并非源于生理意义上的智力缺陷，而是长期处于统治阶级文化领导权之下的结果。**



在资本主义下，教育体系强调对上级的服从与个人之间的竞争，媒体与娱乐不断灌输即时满足与个人成功的叙事，消费模式则塑造出以占有和炫耀为核心的价值观。这些文化霸权机制不断重塑人们的“常识”，使他们的思维更多围绕个人生存与即时感受，而非结构性矛盾与长远集体利益。美国大城市的贫民窟便是这种逻辑的集中体现，底特律、巴尔的摩或东圣路易等地，长期失业、治安恶化与公共服务崩溃交织在一起，居民被迫在暴力与贫困中挣扎，他们的处境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因为**社会结构剥夺了他们获取体面生活的条件**。在拉美国家，基层治理的失效同样

显而易见，许多社区长期被黑帮或贩毒集团控制，国家机器无法提供基本安全与公共服务，居民的日常生活被迫依赖暴力秩序与灰色网络，这种局面进一步加深了对制度性不平等的麻木与顺从。而在另一端，阿拉伯世界的部分富豪则通过奢靡荒诞的派对展示权力与财富的极端集中，金钱被挥霍在猎奇与变态的享乐上，与底层劳动者的困境形成了刺目的对照。

这些文化霸权机制的作用，使劳动者不仅在物质上被剥夺，也在精神与实践经验上被削弱。**社会分工剥夺了劳动者的一些基本技能，让许多人只能掌握单一、局部的技能，缺乏独立获取生活资料甚至保障自己安全的能力；城市化和商品化生活进一步剥夺了他们在食物生产、住房建造、社区互助等方面的实践经验。**正因如此，当他们面对社会问题时，往往只能依赖零散的媒体信息或流行叙事来判断是非，缺乏通过实践验证和集体讨论形成的理性认识，更容易接受统治阶级灌输的片面“常识”，甚至在不知不觉中为维护现有秩序而行动。与此同时，在阶级社会中，即便假设所有人都具备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能力，社会的物质再生产依然要求大多数人从事劳动。粮食必须有人耕种，工具必须有人制造，运输必须有人完成。劳动者的存在是结构性必然，而不是因为他们“懒惰”“不努力”或“能力差”。

这种逻辑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从事服务业或互联网产业的人，对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的使用、维修、安装往往不如专门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熟悉；而在同一件家电的生产过程中，软件开发人员和硬件开发人员对彼此的领域也可能极不擅长甚至完全不会。更有趣的是，负责管理他们收入的人事部门，往往对他们的具体工作缺乏深入了解。由于工作侵占了他们大部分时间，他们几乎没有可能跨行业去学习其他领域的技能。然而，在电子产品乃至家用电器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的今天，如何使用、维修、安装本应是人人都需要掌握的基本能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使人与人的联系被削弱，**人们不得不依赖“花钱请专人来帮忙”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被请来的工人也在无意间被简化为一个“上门工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压缩为金钱链接的雇佣关系。消费因此不断增加，而社会联系却因这种“便捷性”而被进一步削弱。**

所以，底层社会中频发的暴力犯罪，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所谓“人性恶”。在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制约下，资源匮乏、社会流动受阻、劳动尊严被剥夺，使得部分个体将竞争性与排他性行为视为获取生存空间的唯一途径。例如，在城市治理、征地拆迁、信访等领域，底层群体在长期被忽视、缺乏制度性申诉渠道的情况下，可能采取极端暴力手段与政府或其他群体对抗；在街头经济中，流动摊贩因生计被取缔，与执法人员发生肢体冲突的事件屡见不鲜。这些行为在直接效果上可能损害他人利益甚至破坏社会秩序，但在更深层次上，它们是被压迫阶层在既有制度框架内被迫采取的适应性策略，是特定生产方式下社会运行逻辑的畸形反映。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论证了工厂生产扩大、生活无保障和家庭道德教育缺失如何导致工人阶级的堕落与犯罪。他指出**犯罪常是个人对压迫的无效反抗，工人最终转向集体阶级斗争，但阶级仇恨仍会催生个体犯罪。**恩格斯还将犯罪归咎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驱使贫穷工人犯罪，也滋生资产阶级的欺诈。马克思引用犯罪统计说明犯罪更是“一般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环境”即“资本的惩罚”的产物，而非特定政治制度的直接结果。

从这一犯罪因果观出发，镇压性治安措施只能抑制犯罪表象，无法根除犯罪根源。要真正消除犯罪，必须彻底改变产生犯罪的社会条件。所以，即使在历史或文学作品中（如《汉尼拔》描述的极端个案），**那些看似“难以理解”的、超越直接物质需求的犯罪形式（如某些变态心理驱动的犯罪），其深层土壤仍是阶级社会对人的普遍扭曲、异化以及社会压迫所制造的普遍痛苦与精神危机。**虽然文明进程减少了暴力犯罪的程度与数量（却增加了财产犯罪），但马克思主义坚信，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彻底铲除犯罪的根源”，因为它将满足人的合理需求、消灭阶级不平等、化解个人与社会的根本矛盾。历史的实践也提供了佐证，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在短暂执政期间就显著消除了犯罪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8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4—385页）

这种现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劳动者整体生活环境的恶化、社会支持网络的瓦解密切相关。在被高度商品化的城市生活中，许多人从小缺乏与自然、生产和社区的直接接触，成长过程中主要接受的是碎片化、应试化的教育与消费化的娱乐，缺少在真实社会情境中锻炼判断力和合作能力的机会。结果，他们在面对复杂局面时，往往只能依赖零散的媒体叙事或即时情绪作出反应，而不是基于长期经验和集体讨论形成的理性判断。这种由生存条件异化、技能缺失和意识形态塑造共同造成的状态，使得部分人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做出荒唐甚至危险的行为，也在社会冲突中更可能采取非理性、破坏性的应对方式，为理解底层社会中暴力犯罪的成因提供了重要背景。

从更宏观的“全人类”的视角来看，**任何人类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持和再生产社会生活本身。**即便是剥削阶级的行为，也必须在维持自身统治的同时，保障被剥削阶级的基本生存条件，否则生产过程无法持续，剥削阶级的统治也会跟着崩溃。这意味着，即便是看似“利己”的剥削、压迫行为，也在客观上服从于人类整体存续的要求。只是这种存续是以特定的阶级结构和利益分配方式为条件的。在这一意义上，“利己”与“利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道德范畴，而是不同社会条件下实现集体利益或阶级利益的不同路径和表现形式。**

所谓“利己”基础上的“损害他人”利益，可以理解为个体在特定社会结构中，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采取的竞争性或排他性行为。这种行为在直接效果上可能损害他人的利益，但在更深层次上，它依然是社会总体运行机制的一部分。比如，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一个企业为了生存可能会挤垮竞争对手，这对被淘汰的企业和其工人来说是利益受损，但这种竞争机制本身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维持活力和扩张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这种“损害”并不是对人类整体存续的否定，而是特定生产方式下整体存续逻辑的体现。

在讨论个人与集体利益的统一性时，还需要警惕一种常见的思想偏差——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误解为人类中心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承认，**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时，必然是从“人的立场”出发，因为我们所能把握的世界，总是通过人的实践和语言构建的概念世界来呈现的。**这个概念世界离不开人类的存在与社会活动，没有人类，概念世界也就不存在。在它之外，还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类意识的客观实在世界——自然界及其规律。人类的“概念世界”、社会制度、利益关系，都是在与这个客观

世界的互动中形成的。

正因如此，生态保护、资源利用等看似“超越人类”的议题，实际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考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其生存条件受制于自然系统的稳定与再生能力。无数事实表明人类远未“征服”动物，更谈不上“征服”自然：光是微小的细菌和病毒就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人口结构和经济体系；现代的粮食生产也非常依赖土壤肥力与气候稳定，城市运行依赖水循环与能源供给，一旦这些条件遭到严重破坏，人类社会的基础就会动摇。

因此，“人的视角”并不是把人拔高到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位置，而是**承认人类只能通过实践和概念体系去理解和表达这个世界，同时必须意识到这种理解的局限性**。真正的实践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承认概念世界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的同时，尊重客观实在世界的规律，因为人类利益的实现最终离不开对这种依存关系的自觉把握。

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并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不断变化的。所谓根据“人性本恶”并断言“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的观点，恰恰忽视了人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诉求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而不是由某种先天不变的本质所预设。在原始社会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高度一致，因为个体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于集体的直接合作，这并非因为“人性本善”，而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结构要求如此；在阶级社会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被阶级分化所打破，出现了不同阶级之间利益的对立与冲突，这种对立也不是“人性本恶”的必然产物，而是特定生产关系的结果；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随着阶级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社会条件将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重新趋于一致，因为每个人的发展将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可见，用抽象的“人性”来否定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是用本质主义的假设取代对现实历史条件的分析，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可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是历史的、具体的、由物质生产条件所决定的。阶级利益的形成，是个人利益在特定生产关系中趋同并上升为集体诉求的过程；而个人利益的实现，又离不开集体利益的保障。即便在看似对立的“利己”与“利他”之间，也存在着深层的统一性——它们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人类社会整体存续而采取的不同形式的实践活动。

针对没有翻墙渠道的读者们

推荐 VPN：魔戒

国内直连官网（任选其一）：

- <https://mojie.app>
- <http://mojie.host>
- <https://mojie.co>

打开官网注册账号（邮箱注册，常用邮箱即可），登录后台，购买套餐（支持微信、支付宝）

邮箱推荐使用 Proton，其家的 VPN 也有安全保障：<https://proton.me/mail>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寰宇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华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寰宇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华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中国和华人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寰宇内的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
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以双手开拓的、属于新世界未来的晨曦！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Telegram (电报) 频道:

<https://t.me/revcommunist0cn>

电台 Youtube 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Instagram 账号:

<https://www.instagram.com/revcommunist0cn/>